

# 北行漫記

譯 岱 陶      著 曼 爾 福

版 出 社 趙 燕

MG  
I712.41  
3

北  
行  
漫  
記

福爾曼著  
陶金譯

# 目錄

第一章	重慶的低語	(一)
第二章	集中營	(二)
第三章	到克難坡去的路	(三)
第四章	克難坡	(三)
第五章	踏進紅色的中國	(三)
第六章	延安	(四)
第七章	這是共產主義麼	(五)
第八章	一種混合的經濟	(五)
第九章	生產的努力	(六)
第十章	醫藥與巫術	(六)
第十一章	鄉村民主	(七)



第十二章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	(九六)
第十三章	反日根據地	(一〇三)
第十四章	軍事紀錄	(一〇六)
第十五章	晉察冀	(一一四)
第十六章	地下戰爭	(一二二)
第十七章	大丘地之戰	(一四〇)
第十八章	河北的女英雄	(一四九)
第十九章	新四軍	(一五五)
第二十章	內戰	(一六三)
第二十一章	他們是共產黨麼	(一七一)
第二十二章	國民黨對共產黨	(一七七)
第二十三章	到前線去	(一八三)
第二十四章	華北的子弟兵	(一九二)
第二十五章	在日軍陣線後方	(二〇五)

第二十六章	爆竹的鄉村	(二三)
第二十七章	高山上	(二三)
第二十八章	汾陽之戰	(三五)
第二十九章	進攻冀煩	(三五)
附錄		(三五)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綱領草案		(三五)

## 第一章 重慶的低語

這是一樁稀奇的事情。中國正在作着生死的抗戰，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鎖。然而中國最精銳的五十萬軍隊，却據說正用以封鎖他們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國共產黨。——這種封鎖隨時有爆發為浴血內戰的危險。

自然，我們都知道這點的。這是一件公開的祕密——對於住在重慶的外國記者們，這是中國最大的不許聲張的故事。我們固然不大知道封鎖線內部事情的真相。我們更絕不被允許在任何電報裏說到共產黨一個字——除非是引用委員長和別的大官咒詛共產黨「強佔國土」「襲擊國軍」或「破壞抗戰」的話。

這種攻訐當然只有刺激了我們對於共產黨的興趣。我們新聞記者多半是既非共產黨，也不是共產黨的同情者。共產黨聲言擁有着華北和華中的約莫九千萬的人民——差不多等於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三。僅僅這一點就成爲新聞了。可是在過去五年當中，政府不許有一個新聞記者到那面去。我們都好幾次遞了申請書，請求允許參觀共產黨的區域。結果總是並不乾脆拒絕的。我們中的一個所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個是「現在未便」。還有一個是「情況未定」。

究竟封鎖線的後面發生了什麼？這些共產黨果真像政府當局所形容的那樣壞麼？他們是不是背叛



了中央軍？他們可曾拒絕打日本？他們是不是跟南京的漢奸相勾結？他們是不是壓迫着人民？他們跟俄國的共產黨究竟有什麼關係，如果有，莫斯科究竟給他們怎樣的影響和指示？他們在雙重封鎖的後面，怎樣地維持下去——一面是日本而另一面是中央軍的封鎖？國共兩黨基本的區別之點是什麼？怎樣纔能有和平解決的可能？在抗日戰爭中，他們曾經或能夠盡怎樣的貢獻？

從新聞報道的觀點說，這些以及許多其他相當的問題是需要回答的——根據客觀事實觀察的回答，不過，如其封鎖一直繼續下去，我們似乎是很難得到這樣的回答的。

去年春的一天，政府發言人在我們每周新聞例會中回答一個問題時，正式否認對共產黨區域封鎖的存在。我們新聞記者立刻抓住了這開放的機會。我們直接向委員長提出了聯合請求書。這是由駐居當地的幾乎是全世界的通信記者簽名的。在下次新聞會議中，我們又把這請求正式公開地向政府發言人提出，請他轉呈委員長。

出於我們的意料之外，委員長同意讓我們去——作爲政府的客人——雖然後來我們動身還在好幾個月之後。

從重慶坐貨車或汽車到寶鷄，只要一星期左右的時間就夠了——除非是「拋了錨」。不過在中國內地，汽車總要隨時「拋錨」的，時間是數分鐘乃至數天不等。飛行到寶鷄却只消兩小時。我們是特許飛行的。一架巨型的DC-3道格拉斯機，由美國人駕駛，把我們六個外國記者和十五個中國記者一行帶上了旅程。我們的正式名義是訪問西北記者團。

寶鷄的石城正是比國人所建的隴海鐵路的終點。這是一個具有邊疆氣氛的熱鬧的小市鎮，從高原

上的飛行場俯瞰全城，那被一片黃色麥野環繞着的寶雞，方方切切地坐落在廣漠而肥沃的山谷中，呈現着一幅美麗的圖畫。汽車把我們帶下峻削的山道，經過一列列嵌在崖邊的窑洞，又通過了圍立着許多素樸的鄉民的市街，然後抵達一節等候着我們的特備的火車。這是一輛現代歐洲大陸式的臥車，附屬的講究的餐車，是用綢布架成的，有着十分整潔的檯布，噴銀的餐具，還有漂白的食巾插在閃爍的玻璃杯裏。每一桌上都放着一瓶吹大的紅玫瑰花。

當我們等着開車時，一列貨車從東面開來。其中一節有蓋貨車的車廂裏，——跟我們華麗的花車恰成了顯著的對照——擠滿着從河南前線向東逃的教士難民。他們一共有五十四個，其中十六個是兒童，包括着三個襁褓中的嬰兒。那車子中幾乎堆滿了床、傢具、童床、踏腳車以及各種行李。嬰兒啼泣着，小孩叫喊着，父母叱罵着，其餘的成人們則擠着圍繞我們，大家爭先恐後的說着，每一個人都想把他自己從前進的日本兵手裏脫險的經過告訴我們。我們傾聽着，直到我們的司機者響起了汽笛，這纔跳上了火車，駛向附近的阜新棉織廠去作一次順道的旅行。

阜新棉織廠是自由中國最大的紡織廠之一，當一九三八年日軍佔領漢口時，它就撤退到寶雞，在巨大的窑洞裏裝置機器，那從小崖掘出的窑洞是這樣的深：雖然經了不斷的轟炸，却連一枝紡錘也沒有受損。有四千個人在這些窑洞裏工作，裏面光線充足，空氣流通，看起來像是塗了白色的地下道。我們專車到達西安時，幾乎已是午夜了。從車站燈光的光耀中，我們在神殿似的車站上，受着當地百姓把個名人的歡迎。經了介紹和照例的交換致候名片以後，我們就被駛送到華麗的西安迎賓館。

西安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它在傳統和歷史上的地位很高，它是中國文化的搖籃，也是數世紀

來帝皇御幸的首都。它那數世紀以前所造的它的鐮齒形的城牆，是全中國所保持最爲完整的了。它用十五呎高的巨石築成大矩形，每隔相當地位是雄壯的雉堞。

我們在西安消磨了很有趣味的四天。我們雖然是委員長的客人，地方政府的官吏却不大知道怎樣應付我們。作爲正式的賓客，我們應受一切優待和協助。作爲觀察銳利的新聞記者，我們也許會看到不良的事情或得到壞的印象。因此，我們的正式關係儘管什麼都是笑嘻嘻和客客氣氣，西安官吏却嚴密監視着並且記錄着我們的一言一動。後來我們知道連人力車夫也是特派到迎賓館的，他們總堅執着要求我們雇用。當我們拒絕坐車時，你走到那裏他們就跟蹤你到那裏。我們婉辭抗議了，人力車夫立即不見，繼之以便衣的人們，在迎賓館的門外閒蕩，如果我們在街上雇了一輛車，他們就騎了腳踏車跟隨着。我們多少耐性地應付着這個，跟這些人們笑着或講着笑話，他們對於我們的關切倒並不使我們怎樣苦惱。但我們可無法確定，一切這樣的做法，究竟是受命於重慶，抑或是出於西安政府的命令，不過西安與重慶當局的無甚差別，原是大家知道的。

第二天，當我正走進迎賓館，信差遞給我一個信封。裏面的信是用拙劣的英文寫的，我在這裏一字不易的把它轉載過來，不過具名是給刪去了，因爲那簽名正好是這個人的真姓名。

親愛的福爾曼先生：

我深深地感謝你，你的朋友，和你的國家，因爲你們援助而且同情我們的自衛戰爭。現在，你懷着瞭解「中國西北內幕」的願望，到了這裏了。

當你請求訪問延安這個特殊而奇異的地方時，在重慶當局中間曾經引起了從來未有的惱恨。爲

了這個不幸的事情，政府官吏，從重慶到西安，從委員長到何應欽、張治中、戴笠（軍事委員會秘密警察首領）和徐恩曾（國民黨特務機關——調查統計部長），是全體動員了。在陝西，胡宗南、祝紹周（陝西省府主席）和其他重要的政府官吏也都忙碌地神經過敏地動員着。他們準備着討論着怎樣欺騙你，封鎖你以及監視你。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些這種準備的情形以及他們「歡迎」你的妙策：當蔣委員長答應你這次訪問時，戴笠就於二月十四日攜帶蔣的訓令飛到陝西來。他立刻與胡宗南舉行會議，並且指示怎樣秘密的準備和佈置。

蔣委員長指撥了五百萬元作爲你們訪問的「不幸事件」的經費，其中五分之三用於秘密特務——「特別佈置費」，即封鎖、欺騙、監視和「嚮導」。胡宗南將軍接獲委員長的訓令後，立即召集「特別會議」，以討論「監視方法」、隱匿、封鎖、孤立、煙幕、偽裝、翻譯以及當你到西安時跟蹤和嚮導的各種問題。許多秘密警察都準備冒充譯員、招待員、僕役和聽差。爲了確保完成這些佈置，「西安臨時總部」成立了。它的組織和任務如下：

#### 指揮部

總指揮（胡宗南的參謀長）

副指揮 谷正鼎（陝西省黨部主任委員，所謂「特別會議」秘書長，西安特務聯合行動的領袖。他負責起草「談話大綱」，並訓練特務人員冒充人民代表，控訴共產黨的罪惡。這些「人民代表」都是特務組織的官員或高級職員，凡是久住西安的外國人，大概都「耳熟能詳」。）

### 工作的分配

a. 在賣雞（當你下機的時候），在賣雞與西安之間的鐵路上，以及在西安，所有特務工作小組的活動，都聯合受總部支配。每一小組必須完成指定的工作。在西安，及其部屬是主要負責者。

b. 第二戰區（閻錫山爲長官）。從宜川至克難坡西安國民黨特務受命活動歸陳繼承指揮，他是調查統計部特派的。

c. 從宜川至紅區，以及當你整天在延安逗留時，由譯員和嚮導者負責，他們都是高級特務人員，由胡宗南總部選派的。他們是你到延安去的旅伴，與重慶駐延安的機關聯絡活動。他們也跟在延安的特務份子密切聯繫。他們的任務是監視你——特別當你與共產黨接觸的時候。他們將注意傾聽你講的什麼，以及共產黨供給你的攻擊國民黨的材料，他們還將搜集共產黨過失的資料供給你，以造成你不良的印象。

d. 從延安返回西安的路上，將由胡宗南的部隊負責。

各小組的人選及人數

a. 戴笠的。動員的人數爲三百六十二。

b. 兩陳的（c. c.）。人數爲四百十三。

c. 胡宗南的。總數爲四百。

對記者團防止各要點

- a. 嚴格限制訪問的程序和在西安停留的時期。
  - b. 無行動的自由——限制並阻止你作「自由訪問」，用規定的程序佔據了你整天的時間。任何人向你訪問或接近，如未獲許可，必須尾隨和監視。
  - c. 使一切住居當地的外國醫生，牧師或別的外國人與你隔開。他們的住宅由秘密警察及便衣人士守着。
  - d. 嚴禁任何能說英文的僑民充當譯員或嚮導。事前概須經臨時總部的審查和訓練。
  - e. 凡預定參觀的各公會，行政機關，學校以及其他各地的指引者，事前須經甄選和審查。
  - f. 凡指定與記者團談話的官員必須根據「談話大綱」，並必須在用語措辭方面歷數共產黨的過失。
  - g. 任何秘密警察探員，如有洩漏秘密者處死。
  - h. 北方路上的佈置與前同。
  - i. 洛川一帶地方封鎖紅區之堡壘及哨崗應暫時加以掩蔽，勿使暴露於外。
- 親愛的福爾曼先生，我是一個居住西安的公民，愛國家，愛世界，愛自由，也愛所謂民主。但我是異常的失望，因為我發現西安在政府當局暴虐和腐敗的統治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更沒有愛國的熱情。我不同意我們政府所做的事情，尤其是此次「歡迎」你們的佈置。所以我必須把所知的情形陳述如上。我深信除了人民自己和民主以外，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不能統治中國。任何人或黨，如想握得政權，從而剝奪了別人的權利和自由，必將遭遇潰敗。我們神聖的任務，是在造成一個人人都

能自由的世界。自由的權利決不能被蹂躪，世界進步的潮流也決不能被罪惡的獨裁者們所扭轉的。請你給我以同情，聽了中國人民的聲音。最後，請你原諒我拙劣的英文。我是

你忠實的，——（簽名）

初看起來，雖然這封信似乎是什麼誇大狂者的手筆，但這樣詳盡的情報却又不能不顧的。自然，我要盡可能的來加以證實。還沒有經過詳細的研究，我就可以這樣說：從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從西安某些消息靈通人士告訴我的一切看來，我確乎相信這位先生是瞭解他所講的一切的。

我們依照重要性的次序，作了四次正式的官方拜訪：首先是胡宗南軍部；其次是省主席府邸；西安國民黨部，最後是臨時人民參政會。這些地方及其設備的漂亮或舒適程度，是依照官員的重要性而不同的，有拳匪時代西太后駐蹕的富麗的皇宮，也有石板地、紙窗和陳設平凡的十五呎周方的小室——在那裏，我們會見了三位長鬚的臨時人民參政會的老代表。他們看來似乎非常之侷縮——惟恐一不留意，說出了他們不應該說的什麼。

在軍部中，我們由胡宗南的參謀長接待，他是代胡正式發言的。穿着長統靴，一身漂亮合式的衣服，他會隨從蔣委員長出席開羅會議。雖然他款待我們是夠熱烈的，但我們却立即意味到一種潛在的敵視性，他似乎憤然於奉命優待這些好管閒事的外國人。

使我驚奇的是他坦白承認了對共產黨封鎖的存在，不過他把封鎖稱做了「保護線」。他提出好幾個這種行動的正當理由。第一，據他說，是因爲共產黨不服從軍令。他們的部隊，名義上雖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統轄，但却拒絕局限於指定的地區。他們違反了閻錫山命令，渡過黃河的東岸，並

非法擴展他們的佔領區。而且，他們的足跡所至，就把政府和國民黨的政府驅逐，而代之以他們自己的蘇維埃制度。至就對作戰的努力說，將軍繼續指出，他們的既定政策是「不打硬仗，敵進我退。」政策，他說已經在河北省和山東省證實了，那兒的共產黨不慌不忙地退出讓日本人進來。

「過去六年，共產黨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一次仗」，他攻擊，「而且，希望他們和日本人打仗，那就想得太過了，那「封鎖線」，你就說它封鎖線好了，你知道並不是對付共產黨的，而是對付日本人的。共產黨不抵抗，日本人就一定從共產區打下來，進攻西安，進攻中國的後門了」。

這的確是一個新奇的說明，而且一個不相信我們有什麼智慧的說明。

祝紹周在主席府邸承認有封鎖線存在。他離奇地把這封鎖線形容做一道「大壕溝」，布置在一些有「幾十」人在戍守着的「小屋」的間隔的地方，他說這「保護線」使得共產黨不能非法地擴展領土，是需要的，他們已經把佔領區的面積擴展到戰事剛剛爆發之前三倍，現在他們還在堅決地把佔領區擴展。我知道這不是真確的，因為一九三七年戰事開始之前我曾經到共產區訪問了幾個月，那時共產黨的佔領區實在比現在的還大——政府軍已經在那個時候堅決地壓迫他們後退了。

這位主席譴責共產黨謀殺非共產黨的人，譴責他們好詐地攻擊正在對日軍作戰的中央軍，譴責他們販賣鴉片——他說邊區三分之一的最好土地都種植罌粟了。這些話都是嚴重的攻擊。前兩點是真是假我不能斷定，可是我却敢說這句話：我在共產區游歷了五個月找不到一點點任何形式的鴉片的痕跡。

祝主席把那種情況概括地說了之後，就指出共產黨在別的國雖然允許存在，可是他們在性質上全

然是政治的。他們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法律系統，沒有特別爲黨徵收的賦稅，他們並不頒佈自己的命令，不發行自己的鈔票，也不認爲自己是國家之中的獨立國家。這些議論最少表面上是有理由的。可是我覺得問題不能拿來縮爲這麼簡單的名詞；而且不久觀察和經歷就會驅使我去瞭解事情的真相如何，那是在祝主席的武斷以外的。

## 第二章 集中營！

我們曾經聽到西安一個特別的營，一種給那些從共產區出來的人設備的政治監獄。這是集中營麼？一定不變的答案就是：這不過一個給那些預備過新的生活的人們自願地來重新改造他們的意識的地方。

我們要求去參觀。西安的官員囁嚅支吾了兩天才答應下來。

在我們去觀光的頭一天晚上，我們預備在第二天用的印好的程序表上增加了一項「備考」。寫着：勞動訓練營（這個地方的官名）乃軍事委員會於一九三九年冬季所設立，用以收容從共產區逃亡至西安之無家可歸之青年，給與短期之訓練。經此勞動服務，彼輩青年即可獲得生產技術或商業知識，俾便參加國家戰時之工作。訓練營計有數部，包括事務管理班，化學工業班，政治班，以及工場。營中的訓練，管理，供應，膳食暨其他各項，均與政府所舉辦之各種訓練所相同。

一個晴明的下午，我們就坐了特別華麗的汽車，駛出西門，駛到飛機場附近一個有圍牆有戍兵的場地。他們預備我們來的。紅色的和黑色的大張標語貼在牆上，結在樹上，一串串地從一座房子掛到另一座房子。標語用英文寫着：「歡迎西北參觀記者團！」「我們爲和平正義民主而戰」。『打倒法

西斯」！說英國話的翻譯員各各緊跟着我們記者團裏的每一個外國人，跟的好像水蛭一樣。營裏都打掃過，整理過，好幾處新粉刷的地方還沒有乾。

在應接室裏，我們又發見了一張大張的壁報，爲了某種難以說明的理由，用英文寫的。我們問學生能不能讀英文，他們回答是的，其中有些能讀。壁報——編製和普通的報紙一樣，但是用工細的字體繕寫，并非用鉛字印的——刊載着一篇美軍新近在所羅門羣島登陸的故事，一篇邱吉爾的演講辭，一篇關於美國戰時生產的概況，一篇題目叫做「一個應予改正的見解」的「社論」，我把它逐字地引載下來。

西北青年勞動營是非常時期中一個非常的集團。在這個城市中，甚至在這一省中，每一個人都是害怕西北青年勞動營的。在這勞動營裏的任何人都被認爲危險份子。可是實際上并非真正這樣。勞動營共有五個大隊和一個女子組：男生一千二百人，女生二十五人。他們每天的課程是軍事，政治，和技術訓練。技術訓練有工業化學班，調查班，青年班等。總之，勞動營真正是一個訓練的團體，髣髴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和中央工人訓練團，并非是一個危險的會社。

我們開始在營中巡遊，住所雖然擁擠，却并不太惡劣。各樣東西都是嶄新的。毡毯，被單，和毛巾是全新。制服也是全新。他們的頭都剃的光光，在太陽晒黑了的臉上發亮。我們偷眼望進教室去。學生們都坐的背脊挺硬，一點也不注意我們——他們入迷地聽着講師講古代史，聽的我們奇異的出現也都不夠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引了一下。

我們被帶到操場去看學生運動。一羣男生正在打排球。那一邊，幾個女生正圍成一圈玩着兒童的

遊戲。我們高興找幾個學生談談麼？我們高興的。他們就帶把我們向那幾個男學生走去。我却毫不願意地朝着那些女生走——幾個翻譯員跟在我的後面，勸我回去加入集體的訪問。我反對，他們只好跟着走，替我『翻譯』。

那些女生看見我走來，自然只裝做不理會。我站在那兒看她們玩，站了一會，我就問女學監我可以不可以和她們談談。她笑着答應了。我隨便挑了幾個，首先問她們一些簡單的問題。是的，她們每一個人都堅決地說她們自願地住在那裏。一個甚至於說她是看了當地的報上的招生廣告而來的。她們能夠隨時要走就走麼？我想她們的回答真不容易捉摸。一個說，『我的身體還沒有養好』。另好一個說，『我要受完訓練的課程』。第三個說，『我不敢以爲我已經完全把長期受共產黨所污染的思想洗乾淨』。

那幾個翻譯員和女學監聽到這些可懷疑的回答，都溫和地微笑了。我又問了一些私人的問題。二十四歲的羅清修小姐說，她從一九四一年離開共產區之後就到這個訓練營。她當初爲什麼到延安去呢？她并非自己願意去的，只是硬被帶去罷了。一九三五年，她跟着富有的父母在四川過着恬靜平和的生活，這時正是紅軍展開著名的八千哩長征的時候。紅軍殺死她的父母，叔父，兄弟，把頭扔到井裏，并且把她帶到延安。她到了延安之後，立刻就進了新成立的共產大學。幾年後，因爲憎惡說謊欺騙青年的教師，她就逃亡了。

二十三歲的符秀英說她也是四川一家有錢人的女兒。紅軍也是砍掉她的父母的頭，拖她到延安去的。是的，她看見她的父母被殺害的。可是在長征期間，她並沒有企圖逃亡。抵達延安之後不到一

年，她得到一個機會就逃亡了，并且就直接來這訓練營。符秀英小姐顯然把日子弄顛倒了。一九三八年（在訓練營成立之前），她逃出延安，一九四一年才到了訓練營。最後，她說她因為沒有家，希望在訓練營至少再住三年。

何柔蓉小姐說她自從去年逃出共產黨，就在河南替游擊隊服務。她覺得自己對於三民主義沒有充分的基礎，不能替游擊隊做有效果的工作，所以就到這訓練營來。她希望在這裏完成了她的研究就回到游擊隊去，但是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走。

我要求她們中間年齡最小的人來談談。一個又矮又胖年紀二十歲的站了出來。她從一九四二年就在那兒了，她逃出共產區自願地逃到這訓練營來。她承認在一九三九年曾受到共產黨宣傳的影響，到延安去進師範學院。在那兒，她憂愁地感覺幻滅了。我問她要不要我替她帶信給她的老師或者故友。不；他們在那兒的都是壞東西。還有，她把他們的名字都忘了。

翻譯員拉拉我的袖子說話了，他們說大家在等我們去吃茶點。我就和他們走回去。走過一個教室——那一個有學生聽古代史聽到入迷的教室——我想這一班現在一定下課休息了，因為講師已經走了，學生們正在談天，也許就在談我們。我忽然走進去。他們慌張起來，一會兒就筆挺了，好像受過訓練的好學生一樣。我坐下去，打算和他們攀談。他們帶着猶豫的神氣望着翻譯員和我，然後答出含糊的不可捉摸的回答，我只好聳聳肩走開。

吃茶點的時候，訓練營的主任和十二個青年招待我們。這十二個青年據說是學生代表。主任致辭，簡單地說了幾句話。他說大多數的學生是自願的，有些却是「犯了軍法」而受監禁的。

這些代表都非常客氣，對於回答問題完全不關心。真的，他們似乎怕受到訪問。趙清小姐在一九三八年跟一羣同學到延安去。這位小姑娘在她的家鄉鄭州受了共產黨的宣傳，聽到延安已經完成了很多好的事業。她就到延安去，費了四年的工夫在醫院裏學習看護。可是她所希望的事情一點事找不到。共產黨的宣傳教她相信延安是一個有崇高的理想和目的的地方；然而她在四年中却毫無所得。看到共產黨對待病人怎樣的冷酷無情漠不關心，她傷心了。他們強迫她加入共產黨，她不肯。終於，她爬山過嶺大膽地逃亡了。逃到邊界，政府軍非常優待她，告訴她許多關於西安訓練營的話，所以她就要求入營。她在營裏已經費了兩年的工夫了。她爲了新的生活而受訓還需要多少時候呢？她不知道，只希望不會再有多久。她說了這一句話就朝着主任微笑。那位主任坐在對面，很有興味地聽她的故事，好像從來沒有聽見她說過一樣。

邢樂分樣子好像活潑的青年。他是無線電報生。他在香港受了共產黨的宣傳所影響，自己花了旅費去延安，這一來他就可以投軍抗日了。在延安，他們派他到王震將軍的旅部，無線電台工作。他說：『我在那兒待了三年，和他們混得膩了。有一天，我問王震可以不可以離開。王震說如果我把手錶和金別針給他就可以走』。邢堅決地說，他就是這樣才離開了共產區的。他直接地到這訓練營來，關於訓練營的話他已經間接地聽到了不少了。

『你不要我到延安高級軍事當局報告王震拿了你的手錶和金別針作爲賄賂才放你逃走的』：

『不。說了也沒有什麼好處』。

一個學生，周文正，說他是賀龍將軍部下的少校參謀，服務了五年。

『有一次，我們離開日軍很近』，周文正接下去說，『石友三部下的中央軍希望和我們配合起來向日軍突擊。那一天是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在河北一個名字叫做威縣的小地方。可是我們大吃一驚，賀龍下令攻擊的不是日軍而是中央軍。我們殺死了四五百人，石友三的殘部就敗退了』。

『爲什麼賀龍要下這個命令呢？』我問。

『因爲他要擴充他自己的地盤，共產黨都是這樣的』，他對答如流地說。

後來我把這件事問賀龍，他大笑地回答：『從來沒有聽過這個人。而且我和我的部隊都沒有到過那個地方』。

我想在這裏把這些話放在我的主要的敘述之前完全是適當的，現在我來報告一次有趣的談話，這是幾個月後兩個青年在延安拜訪我的時候所談的話。這兩個人就是王爾明和羅卓盈，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我們訪問西安勞動營的時候，他們也都在營裏。關於他們逃亡的話，他們不願談，恐怕牽累到幫他們逃亡的人。可是關於營裏各種真實的情況，特別關於我們的訪問，他們倒有一篇使人深信的故事說出來。

首先，他們敘述怎樣被送入訓練營。一九四一年的春天，王爾明在西安防空學校當無線電報生，他寫了一封信給朋友，信裏提及蘇聯的新憲法。這是無關重要的事——只不過他在西安的書店裏看到一本書而引起輕淡的興趣罷了。這封信給郵局扣留起來送到軍部。這時王爾明正有特別任務奉派到陝甘邊境的天水。

一個深夜裏，兩個拿着手槍的陌生人到他的寓所，強迫他跟他們走。他們把他單獨地關了兩個

月。沒有一個人審問他，沒有一個人想告訴他或者能告訴他爲什麼把他扣留起來。後來他們給他扣上鍊銬，帶到蘭州，關入『政治監獄』。兩個星期後，他們把他提到一個姓費的上校面前。費上校粗鄙地問他爲什麼要研究蘇聯新憲法。這才第一次地給他暗示了他所以被扣留的原因。他自然否認他負有共產黨的諜報任務的；他從沒有到過共產區，他對於蘇聯的憲法發生興趣者無非是想研究一點憲法的道理，因爲在這國民黨認爲『訓政時期』應該結束的時候已經有不少的人讀中國的憲法了。

他們鞭撻他，拷打他，努力逼使他供認。這樣斷斷續續地延到一九四四年三月。於是他戴上手銬，帶到西安，送入勞動營。監禁的期限一點也沒有消息。他並沒有請求擄掠他的人告訴他，因爲他怕他又被單獨地監禁起來。

羅卓盈，在延安拜訪我的另一位客人，十五歲起就在滿洲軍隊裏。一九三七年戰事爆發，他逃出滿洲軍加入林彪指揮的共產軍。一九四〇年，他跟着林彪的參謀長陳將軍奉令到新疆去。陳將軍在新疆進醫院治病，他也跟着。那年十月裏他們從新疆歸來，兩個人都被西安當局逮捕了。當局不承認他們的委任狀，却以他們穿的新制服的布料爲理由指他們做某種間諜。他們解釋這是在新疆得到的俄國布料，可是徒費唇舌，沒有人相信他們。他和陳將軍單獨地被關了將近三年。他們斷斷續續地捱受拷打，捱受各式各樣的官員的審問，要他招認一切罪狀。陳將軍終於發了狂，失了理智，死在牢裏。年青的羅卓盈給一個法官審訊，判決無限期地送入勞動營。

在營裏，王羅兩人都必須做手工藝，雖然并不過多。訓練是嚴格的，犯規就要受體刑。他們上課讀三民主義，委員長的演講辭，中國歷史，『逆黨』和『叛軍』——他們一直不變地給共產黨及其武

力定的名詞——的罪狀。從訓練營釋放出來是可以的，只要他同意爲反「叛逆」共產黨而工作。雖然共產黨總被指爲「叛逆」，可是當我們訪問訓練營的時候，那些學生却受到警告不得用這個形容詞。

「爲了你們來參觀，我們就得到發下來的新制服」，王帶笑地說，「我們當然是歡喜的呀。我們真需要極了。他們叫我們留下來；可是新的毡毯和別的東西是從中央軍校借來應付這次的參觀的，所以你們走了之後，他們就立刻收了去，歸還軍校」。

我們到訓練營的頭一天，他們把可能提出的問題油印在一張紙上，叫學生領袖召集學生一組一組地開會，花了好些時候研究適當的答案。我們提出了那一些問題而得到了已經準備好的回答。因爲學生們都受了警告，如果有不適當的回答就有嚴重的後果。

我在延安和王羅兩個人在一起坐談的時候，我就把筆記簿翻到前面去。你認得羅清修麼？

「她大概是說她的有錢的父親母親都給共產黨殺掉了吧。她是不是這樣告訴你？」

我微笑了。「她是這樣說的」。

「好，真是一片謊話」，羅說。「她說她在四川生長的，她從來就沒有到過四川；她說人家在長征的時候把她拖去，她從來就沒有到過共產區。她不過是一個在西安和一班有問題的人勾搭的風騷女人罷了。他們指她和共產黨有關係——這可能是不確實的——并且把她送進訓練營。她告訴了你這個故事，人家並沒有允許她得到較好的待遇或者別的酬報，可是她却不敢拒絕不說」。

「趙清呢？」王說。「啊，她不是好東西。我猜她告訴你她在延安感覺到幻滅而爬山過嶺勇敢地逃亡的悲慘的故事？」我點點頭。「哼！從共產區逃出去是對的——可是她跟上人家的丈夫逃走的。」

她們兩個人在穿過邊境的時候給逮住了，並且送到訓練營去。她的愛人還在那邊，可是對她已經不發生興趣了。現在她看上了營裏一位官員，希望能夠由他幫助而得到釋放」。

那樂分呢？不，他們不認得他。周文正上校呢？『是的，當然的』，他們同聲地說。『告訴你他是賀龍將軍的參謀那個傢伙麼？好，要是他當過共產軍或者別的軍的少校，那麼我們是將軍了』。

他們給我許多別的情報，我不想在這兒寫下來。那時候他們和我們相隔不過一點點距離。他們這一隊有一個學生預備把真相傾吐出來，不管結果如何；却爲了保衛自己，他只好遠遠地站着。僅有那些靠得住，能夠撤當局給他們編造的謊的人才擺在前面給記者們看。其餘的都小心地留在後頭。

## 第三章 到克難坡去的路

第二天中午，我們乘了二輛華麗的道奇汽車向臨潼出發。臨潼在西安東面十七哩左右，有著名的溫泉，是一個可愛的地方，環繞着葱籠的白楊和燦爛的花園，坐落在羣山之間的大路後面。十七個世紀之前，唐明皇在這兒給楊貴妃，中國歷史上最美麗的女人，建了一座精緻的皇宮。他給她的豔冶的姿色迷住了，迷到他從此君王不早朝，迷到他對她百依百順。後來他的武臣領兵造起亂來了，叛軍要求拿她的性命作爲和平的代價，於是楊貴妃就給絞死。

一九三六年的聖誕節，張學良『少帥』和楊虎城主席領導政變的日子，委員長就在這兒休息。叛軍來迎接他那個時候，他所住的陳設簡單的房子牆上和窗上的槍洞仍舊可以看見。

汽車把我們送到隴海鐵路的臨潼車站，給我預備的專車正在那兒等着。兩部大汽車載在敞車上，掛在我們的臥車後面，我們向潼關出發了。潼關在西安東面九十哩，是一座堡壘，是整個中國的西北的鎖鑰。潼關坐落在黃河岸，是戰略的要塞，我們訪問的時候，正面對着在北岸挖掘戰壕的日軍。日本人自從六年前到達這個地方之後，氣餒已經萎靡下去了。

還繞着牆垣的城幾年來天天受着對岸的砲擊，已經完全毀滅了。真的，我們到來的頭幾天，日軍方又運來幾尊巨砲，開始轟出砲彈，其中有幾些不能爆炸。我們勘查了好幾個。

蔣緯國上校，委員長的小兒子，來迎接我們，而且做我們的嚮導和譯員，帶我們遊覽潼關的防禦工事。年青的緯國說着一口流利的英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他隸屬於德克賽斯州的航空訓練學校。這之前，他在德國軍中當一名小兵，不久又當一名下士。德軍奉令開進捷克的時候，他也在隊伍裏面。他在駐紮在捷克的德國駐屯軍中待了一個短短的時期，就奉了委員長的命令歸國從軍。

緯國是一個細長的端整的熱情的青年。他穿着一件簡樸的黃褐色的軍服，比較他的同階級的軍官所穿的并無不同。他對他們似乎非常和好。比他階級高的軍官和他講話了，他就立刻筆直地立正。他腰間掛着一支美國軍用的自動手槍。他解釋說：「這是父親給我的」。

我們給領到下面去，穿過一道照着燭光的曲折的地下交通壕，經過戴着煤炭箕的鐵皮做的鐵盔的漂亮的步兵面前。他們向我們歡呼：「各位先生好」。我們視察了機關槍陣地，又從槍眼或者潛望鏡探視那些過了河不到二百碼的日軍陣地。幾個月前，日軍在這個根據點作了九次渡河的重大企圖，可是每次都被潼關防禦工事的強烈的交叉砲火打退。

「最後一次的企圖，我相信我一個人就打死三個日本人」，緯國驕傲地說。

他們請我們吃中菜西吃的飯。吃飯的時候，胡宗南將軍突然出現了。他的模樣就像穿着戎裝的小拿破崙。靈寶正有劇烈的戰事，可是他離開了火線，給我們作一次短暫的拜訪。

我們的路線從潼關起沿着黃河的兩岸。有好幾處的道路恰在佔據東岸的日軍砲火的射程之內。到延安去的直接路線是從西安朝着正北走去——距離大約可以縮短二百哩——經過恰好在洛川上的封鎖線。他們帶我們走着迂迴的路線，據解釋是，這樣我們就可以到克難坡的閻錫山的總司令部去訪問。

我們并不反對，因為許可我們兜大圈子走的路線實在是有興趣的。

在古代陝西是天朝的中心。樹木繁茂，出產豐饒。多少龐垣高大的城在互相爭鬥，并且給與人民和平及富足。可是歲月流逝，氣候變遷，天災人禍接連不斷。因此家庭破滅或遷徙，人口就逐漸減少。目前的陝北是整個中國最窮困的地方。

我們的汽車從潼關向北駛去，不久就開始在沙丘的四野駛行，非常像印第安那州的小隊人馬面對密歇根湖。立刻之間兩部汽車陷在沙裏了，我們就在曠野搜尋人和牲畜來拉汽車。這樣拖了好幾哩，拖到相當堅實的路床，車子才能夠再開足馬力駛行。

沿着大路相隔幾百碼就立着一座軍用的石砌營壘。這許多營壘教我們記起了附近有敵人或者共產黨。當我們走過的時候，那些戍兵就走出來舉槍向我們致敬。

我們到風景如畫的大荔城外就有蔣堅忍率領的士紳代表團來迎接。蔣堅忍是委員長的堂兄弟，是大荔一帶的專員。在縣衙門，穿着軍服的侍從替我們打去肩上和皮靴上的灰塵，熱水和真正的棕櫚香皂也端來給我們盥洗。然後我們給帶到操場向一個約有五百人的羣衆演講。

那天夜裏在宴請我們的酒席上，蔣專員敘述十年前共產黨佔據大荔的那個短短的時期的情形。『他們毫無理性地擄掠，放火，殺人。可是終於給憤怒的民衆和人民團體趕掉了』。

我們繼續在塵土揚空車轍留跡的路上向北走了。道路漸漸崎嶇。穿過了被削崖危崖深溝絕壑所割截挖鑿的峽谷和山地，道路立刻就交織纏繞起來。有時聳立的黃土岩圍成了一個美麗的山谷就把風景點綴了一下。

抵達邵陽的時候，城裏大多數的居民似乎都在歡迎我們，他們排立在路上，從城門起排了一哩多長。當我們好像戰勝的英雄一樣走過這個行列的時候，他們就搖着英美蘇中四國的國旗，呼着口號，朝着我們喝采。於是我們正式受了城裏的閩人款待，并且留在一座年代有十七個世紀的古寺住宿。

第二天我們駛過更多的山地，有時掠過黃河，相離不過一哩，對岸的日軍的大砲可以完全看見，也可以輕易地被轟。我們在韓城所受的款待比較以前任何一次都要盛大。從城門起沿途有萬千的男婦老幼在歡呼喝采。指揮歡呼的人每隔二十碼就站着一個，他們呼喊可以說是跳起來的。我們許是久被圍攻的危城的解救者。

城裏打掃好的街道掛着聯合國國旗，站着更多的人。寫着英文標語的紅的，青的，黃的旗幟掛在牆上，樹上，和電線桿上。顯然地這天官方宣佈放假一天來歡迎我們，全城的事務都停頓一下了。那些標語到處都顯得千篇一律，可以懷疑，好像我們前面有一個公開的代理人預備下來的一樣。我們的住所，一路來算是這兒最好，有飯菜供應。

到宜川去的驛路帶了我們度過黃龍山。這山高達二哩，山坡陡立，景色壯。宜川距離共產黨控制的區域只有十哩，縣長告訴我們，那邊有正規的貿易。然而貿易只以共產黨運來的食鹽和汽油為限，從宜川運去的則為棉布和染料。我們從宜川轉向正東到黃河岸就抵達閻錫山將軍的領地。我們的汽車走到無路可走了，我們就騎上馬，走一條在尖削的山嶺上蜿蜒的羊腸小徑。最後，我們差不多沒有提防就走到一個山岬，望下去，黃河在深遠平曠的峽谷中迂迴盤旋着。這個教人放開襟懷的景色，其壯麗可以和美國的大峽谷一比。

過了正午好久，我們騎着膽怯的小馬度過一條東歪西斜的架着木板的吊橋。這吊橋似乎是由唯一的希望和漠視命運的白眼合力支持的。它掃興地搖來擺去，就像隨時都可倒塌，都可把我們拋入下面奔騰洶湧的急流。日軍在離開這裏不到十哩的河的下游紮營，這是大家知道的，可是事情並沒有因此而改善了一些。

我們又再騎着馬在別一處的河岸溯着黃河走。走了半哩光景，我們就走上一條峻峭曲折的小徑。這小徑只有山羊一樣的中國的小馬才敢馱着人在鞍上走。我們越爬越高，它們越走越快。看見站着不動的哨兵越來越多，我們知道快到克難坡了。那些哨兵遠遠地面對着小徑，不像是向我們致敬的戍兵，而像是給我們守衛的守卒。蹲踞的井然的營壘點綴着周圍的風景，使我們感覺得真是接近日軍了。奇怪的是這些哨兵不是武裝着普通的來復槍，而是武裝着中國製造的舊式槍，槍尖插上顯明的刺刀。

立刻我們繞過一個突出的棱堡的肩角，就頭一眼看見克難坡。克難坡矗立在陡峭的危崖上，鬚髮封建的堡壘，雄壯地半面浴在燦爛的午後的陽光裏。雪白的雲明顯地在深藍的天空中飛着。深藍的天燦爛地在那畔的明亮的黃土上照着。千百個拱形的窰洞層次間隔地在廣闊的山坡上嵌着。窰洞門前有土坪多至六七層，一層一層地疊着——光景就像在小孩子的故事書上，幾乎難以置信的。

## 第四章 克難坡

克難坡的居民一萬人鬚髮都到市中心入口的坑道來歡迎我們了。我們走過的時候，他們就歡呼喝采。所有的男婦老幼都穿着綠色布的制服——一套簡樸無華的衫褲；看不到一條裙子。熱望的，微笑的，健康的臉好奇地朝我們看，因為到這中國的窮鄉僻壤來的外國人很少。

我們在窖洞歇下來了。洞裏比外面最少要涼快十五度，在燠熱的太陽底下騎馬趕着長路之後，最可以教人心神一爽。窖洞的模樣好像地道的一段，灰頂是彎拱的，牆壁是粉白的，地板是磚砌的。我們的住所還有電燈，電流是由一具有十五基羅瓦特的發電機供給的。發電機則由一九三一年式的別克載重汽車的引擎推動，用木炭燃燒。

克難坡是閻錫山將軍的山西省的戰時的省城。我們來訪問的時候，這城只有三年的歷史，城是臨時築成的，築在這兒的主要原因就是地勢有燒瘠的亂山掩護，足資防守。

閻錫山是統治山西省三十二年的『模範主席』（從他二十九歲的時候起）。在日本受過訓練的閻主席實行了許多進步的改革，獲得了人們的信仰。這些改革包括禁絕鴉片，設立醫院，解放婦女，提倡民衆教育，植棉，畜牧，儲水，灌地，造林，以及開辦新式工廠，鋼鐵廠，電力廠，研究所和戰前中國的最大的兵工廠。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閻錫山和「基督」將軍馮玉祥聯合起來向蔣委員長作戰。失敗之後，閻錫山就逃往大連，日本人在東北的港口。日本人侵佔東北之前六個月，關東軍的參謀長，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把日本侵佔東北的計劃祕密地告訴他。假裝同情，等到籌謀好的滿洲傀儡國要他做頭腦的時候，他就逃回中國，報告委員長，恢復了他的山西主席的職位。

閻錫山在大連寄寓的時候，想出了他的革命的「新經濟制度」。以後幾年他就用功夫完成他的理論，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離開我們的訪問未滿一年）他才能夠實地試驗。我們坐在簡樸的窑洞裏的小條凳上，飲着甜的溫的酒，抽着上海偷運來的英國香煙，聽着年紀老邁聲條溫和的將軍解釋他的「新經濟制度」。這制度支配了留下在閻錫山的統治下的山西人民的生活方法。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的經濟制度底下」，老閻開始說，「勞動力並不專為生產而用，分配也不依照勞動力的多寡而定。結果人與人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就發生了罪惡。這種罪惡的原因可以歸為兩點：第一：以金銀為基礎的錢。第二：資本的私有。

「在以金銀為基礎的錢的制度底下，商品必須首先拿金銀來量度之後才可以和別的商品交換。結果，人們不必為商品而勞動，只為金銀而勞動；因為金銀是容易囤積的，可以用來投機的，這樣就擾亂了商品的價值的平衡，否則商品的價值是穩定的，並且阻礙了商品的依照正常的需要的自由交換。」「資本的私有強迫了那些沒有資本的勞工為了生產只好依靠別人的資本。這就是剝削勞動力而引起憤激和騷動」。

閻錫山制定「合作證券」來替代以金銀為基礎的錢。這給他的整個「新經濟制度」造成了一條血

路。他說『合作證券』是省政府發行而由重慶的中央政府認可的。表面上『合作證券』和法幣相同，可是這并非通貨，而是收據。生產者把生產品交給閻錫山的省營合作社同盟之後就換到這些收據。這些證券照樣可以由購買或交換而獲得別的生产者拿出來的東西。所以可以認為這是以政府統制的合作事業爲媒介的物物交換。閻錫山說省政府發行證券只照着人民生產的實際總數——比率是證券幣十元換一個男人全日的勞動生產力，不管生產蔬菜，小麥，鞋子，或傘——并且有一個人爲的交換價值，在一九四四年證券幣一元值國幣六元。

『證券幣沒有發行過度的危險』，他堅持地說，『因爲發行的數額是根據未被消費的實際商品的；并且當證券拿出來掉換可消費的物品的時候，當局立即把它燬去，另發新的證券給予交進新生產品的生產者』。

因爲證券只對着當地生產的實際商品而發行，閻錫山指說在他統治的區域之外那種通貨膨脹對於區域內的生活費用就不會也不會發生影響。這祇少是理論。

『這區域之內的商品最後全部被統制了，而自足自給完成了的時候，那就不必有一種交換價值來對國幣或者對任何以金屬爲基礎的錢了。將來會這樣的，因爲內部的經濟將來會全部被統制的。這是由以生產所需的勞動力爲基礎的平衡的商品交換所統制，而不是給投機也不是給隨着供求而起的漲跌支配的人爲價值所統制』。

『你的「合作證券」制度能夠全世界都適用麼？我問。

『當然的。這是全世界能夠採用，也應該採用。因爲沒有了以金銀爲基礎的錢可以囤積利用做把

持全世界的經濟的韁繩，各國就只得以前勞動力的單位爲基礎拿商品交換商品了，這樣就可以去掉經濟鬥爭的罪惡，去掉戰爭的主要原因」。

他給資本私有的對答是一種依照勞動力的分配制度。在這個制度底下，運用在生產的資本是由政府或某種公共團體享有和供給，勞動者所生產的物品在完糧納稅之後就給他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城市和鄉村是經濟行政的單位。土地分配由鄉村統制，而分給農民耕種是依照各人的生產能力。工廠和商店由地方或省政府經營，那麼農民和工人就都得到依照實際需要而工作的保證。他們依照每人所用的勞動力的總數而享受他們的生產品。資產階級或商人階級完全被消滅了，自由貿易和個人的商業也都不許存在了。

我覺得這比較他們所說的中國共產黨在閩錫山的領土附近的封鎖區中實行的共產主義制度更加類似共產主義。我把這觀念告訴閩將軍。他坦白地回答說，他的制度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類同的政治目標。實際上，他宣稱已經把馬克思改良了。

『馬克思的頭腦等於一隻戴上顯微鏡的眼睛』，閩錫山挖空心思地說，『因爲馬克思能夠看到別的人看不到的東西。可是馬克思實行他的理論就大大地弄錯了。照馬克思的意思，除了工人所需要指定給他一部份之外，其餘他所生產的東西必須交給國家。結果沒有一個工人願意有效率有能力地工作。我的方法恰好相反，除了工人必須拿一部份交給國家之外，其餘他所生產的東西全歸他自己。這就可以鼓勵工人盡心盡力。簡單的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建築在以需要爲依據的分配上；我的制度是建築在以勞動力的爲依據的分配上。每一個人可以享有他自己的東西，不可以享有別人的東西』。

這完全是烏托邦的說法。當然，閩錫山的『新經濟制度』實行還不到一年，說他成功或者失敗真是太早了。可是我所能夠看到的閩將軍的二十世紀的『勝利啦』，事情都進行的很好，如果拿我在更安舖看見的那些穿的好，吃的好，儼然是滿足的人民作爲標準。真的，我花了五天的工夫和閩錫山盤桓，看到的更安舖真是無以復加的城市了。和農村這個制度是否進行得好，更安舖以外的人民是否接受這個制度，不加反抗，那我就沒有辦法知道。

更安舖的人民住的房子比較我所看到的中國別的許多地方的人民住的房子好些。他們住的窑洞似乎是原始的，可是在那殘廢荒涼的鄉野却是最實用的。建築用的木料和石塊那裏很少，倒是窑洞可以從鬆軟的黃土岩壁容易地挖鑿進去作爲舒適的住處，冬暖夏涼，不怕水也不怕炸彈。

典型的窑洞有兩個以上的相連的房間，模樣像隧道，深約十五至二十呎，廣和高約十至十五呎。窑洞的灰頂是彎拱的，門也是彎拱的。拱門的一邊也許有一個壁龕安着泥灶，另外一邊也許有十幾個壁龕養着咯咯叫的母雞。一隻哺乳的山羊縛在牆角茫然的向你望。在隧道裏面，一邊有一個當作眠床用的長的土炕。傢具是幾隻土凳，一隻桌子，以及一些普通零碎的小物件。我隨便揀了幾個窑洞去訪問，看見他們是出奇的精緻，清潔，伙食房滿滿地堆着穀，香葷，蒜頭，煤炭和木柴。豎着耳朵的驢子在交錯的煙塵的上下下的小徑上遲滯地跋涉着。給外國人希奇的長鼻子和古怪的衣服吸引了的小孩都丟開他們玩着的毬子圍攏起來。他們跟着我站在那兒看一隊哼着歌的苦力在一條山徑上揀上去。這些人正從那條在河邊盡頭的路抬來一輛拆散的載重汽車。這是要抬到更安舖東面的大路上去重新裝起來用的。

我去參觀幾家合作商店看他們拿棉花或羊毛交換布。價格是規定好的，多少棉紗就換多少布，所以他們并不常常爲『合作證券』而麻煩。更安舖有幾個工廠是不大的，可是似乎經營的很好。這些工廠乾淨而通空氣，工作情形大體上似乎比我在中國別處所看到的還好些。

閻錫山的像到處可以看見，可是委員長的像甚至孫逸仙的像却看不到。國民黨的旗也看不到；聽到幾個官吏的談話，我猜測閻錫山承認國民黨的統轄只是權宜之計罷了。一個高級官員告訴我閻錫山的軍隊常常和胡宗南的中央軍發生衝突。也不斷的和共產軍接觸，彼此互相指責對方是侵略者。騎驢觀望。閻錫山抵禦日軍，中央軍，共產軍三方面的壓力，終於把自己保住了，日軍似乎并不逼得太厲害。他們把他看做蔣介石委員長敗北之後可能的繼承人。他們以爲無須把他看做傀儡，寧可把他看做介乎南京的叛逆和重慶的抗戰政府之間的折衷者。這不只是一種嫌疑。

支持這種嫌疑的是閻錫山對我們承認他前後兩次曾經私自直接和敵人接觸商討和平的建議。當然這位將軍說明這次的會議是沒有結果的，因爲他認爲日本的建難以接受。然而事實是存在了，他——一個中國國軍的長官，一個做人民公僕的省政府主席——曾經和敵人接觸，沒有得到他所承認的上級長官所授予的權力或訓令。

我問他：『日本人曾經打算和你講和或者招你合作麼？如果有，有幾次，在什麼地方？』這是一個大膽的幾乎是譴責的詢問。這個詢問暗示了他是好逆。如果他對這暗示發怒，你也不去罵他了，可是他竟非常坦白地回答。

『是的。兩次。第一次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半。日軍司令，我在東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從臨汾派

一個我的學生帶一封信來。信上說：「亞洲人民自相殘殺，我人實感不幸。足下對於恢復和平，重訂友好，有無充分辦法？」我答覆：「日本純爲本身所需而戰，其他亞洲人民自不寄與同情。苟日本爲亞洲人民全體所需而戰，則恢復和平，重訂友好，實屬容易」。第二次的接觸是在一九四二年四月。『日軍司令 Iwamatsu 到吉縣的一個小村莊，安平，來和我作私人的談話。我把上面話告訴他。結果是不歡而散』。

這位相信中國資源足夠作持久戰的將軍向中央政府大大地出賣他的忠心。他說，『我們在這兒做的是中央政府的社會政策的一個預告。這是完全符合孫逸仙的民生主義的。不同的是我把它擴充起來，更具體更應用罷了』。

他繼續下去說，商品的生產已經在計劃了，那是按日照需要而生產的。并且生產的進行情分配是受統制的』。

『我的新經濟制度是有戰鬥性的』，將軍加重語氣說，『強迫勞動就是這制度的基礎。一個人如果不工作就不得吃。這是我們的口號。對於游蕩的人我們要嚴厲地懲罰。只有生產的人才可以消費』。

他這樣說也這樣做了。在他統轄的區域之內所有私人的企業都已經被清理了。私有的資本和私有的產業已經被吸進公共合作社了。商人手上的物品准許他按照規定價格賣出；於是商人便被登記起來變成工人了。他們可以獨立地去找職業，或者經由省政府而獲得職業。目前一共有四千個商人在製造紙張，毛巾，毡毯，刷子，籃子，墨水的生產企業裏，而這些生產品却是一年前他們自己從附近

的日軍佔領區輸入來的。別的商人則依據各人的特殊資格雇用做金屬工匠，鞋匠，或者熟練的工人。還有別的就變成了農民。

在他的『新經濟制度』底下，強迫勞動以十二小時為根據。工作分為二類：第一，國防工作，諸如挖掘壕溝，修補道路，建築堡壘，搬運傷兵軍火等等。第二，民生工作，包括私人所必需的耕田和工廠的勞動。因為人民的行業不同，需要人民工作的時候就大有分別。勞動公民每天必須為自己所需工作八小時，為國防事務工作四小時。公務員，教師和兵士每天必須為自己所需工作四小時；譬如用舊式木製的紡車紡紗，在一小塊菜園種菜——閻將軍自己就種蕃茄。此外，這些人在本身的職業上為國防事務工作八小時。最後，大學生每天最少必須為自己所需從事生產兩小時；而中學生則須四小時。

『所有壯丁都要強迫來出力參加生產勞動』，閻錫山說：『反對的就受懲罰。他們必須集體地工作，必須一個監視一個來完成他們集體的工作』。他的制度顯然成爲一個組織人民的重大要素。

可是閻錫山的『新經濟制度』的中心是他那革命的『兵農同盟』。照他的說法，兵農同盟的目的在增加農民的人數，同時也增加兵士的人數，於是人力和食糧的供給，這個戰時的緊急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實際上這個同盟是這樣工作的：每個年齡在十七歲至四十八歲之間的壯丁必須加入兵農互助會。兵農互助會分爲三組，各組輪流服一個時期的兵役。一組服兵役的時候，其餘兩組就留在鄉村共同耕種田地，而田地是分派給三組全體的。這樣，兵士的家人和靠他養活的人就可以得到支持。

『在我的兵農互助會底下，凡是壯丁的人都願意服兵役，他們很放心，因為得了維持一家生活的

保證』，閣將軍肯定地說。『而且，在這制度底下不只逃避兵役的罪惡去掉了，軍隊的風紀也就真的提高了。這在較為堅強的國防上得到反映』。

每年十一月十一日，徵兵紀念日，所有的田地依照成人、男丁各人的耕種能力重新拿來分配。閣將軍堅決地說，省政府并非真正把地主的田地充公，只是要求他們把自己不能自耕自種的田地按照規定的比率賣出來罷了。地主拒絕出賣的地方，政府就把他多餘的田地分給佃戶，佃戶耕種收成了後就把百分之五納給地主作為出租。這樣，地主仍然保留他名下的田地，而田地的處分和統制却在省政府的手上了。更妥當的行政當局可以否決把田地給與拒絕工作的人，或者犯了吸鴉片賭博盜竊欺騙這四大罪之一的人。兵士開小差或被開除也要褫奪他的土地。人民的行為就這樣機械地被統制起來，因為對社會犯罪是要受懲罰的，懲罰就是褫奪他的工作權利，因此也就褫奪了他的生計了。

同時閣將軍也預備採取嚴峻的必要方法來對付遊惰和抗拒的人。那『不工作就不得喫』的口號意思也就是說，『我要他做的都是為他好的，如果不照我做的，我就要嚴厲重辦的』。所以，對這位將軍的烏托邦的實驗所下的最溫和的批評就是慈善的獨裁。

最後一個特點值得提一提。閣將軍曾經給他的官員設立一個所謂『人民革命聯盟』。他自己是聯盟的總裁。聯盟的會員一九四四年共有一一〇，七八三人。在組織上，它自以為是國民黨的衛星——『雖然它的道德誠條更加嚴厲』，我聽說。『忠實是最高的德性，每一個公務員必須在他供職的機關作莊嚴的宣誓，如果發現了吸食鴉片，賭博，詐取，或欺騙長官，就要服毒或懸樑自殺』。代理司令楊愛源將軍說，已經有十幾個不順從的公務員在聯盟的會員面前自殺了。

## 第五章 踏進紅色的中國

我們從亂石嶮峨的山徑走下渡頭已經是將近黃昏了，有的人走的人馬兩乏落在後面，我們就在那兒等他們，差不多等了一個鐘頭，然後上了平底無蓬的船衝過黃河的急流。我們在炙人的太陽底下騎了整天的馬真是累了，累的連踏進了中國共產區也幾乎不知道。我們一路經過了過分的慶祝和歡迎，現在從邊門踏進了中國共產區是有點反極的。三個沉默不響的職員從渡頭的小村莊良水庵走來迎接我們，把我們接到一個農舍的天井。我們就跟煩擾的雞，豬，牛，以及哀鳴的驢子在一起。

清晨帶來了一個長官和三個衛兵。他們是正式來歡迎我們的，我們并不知道。他們從延安來，在山上繼續不停走了兩天兩夜，可是他們精神穿穿就像昨晚在附近的農舍過夜一樣。他們都穿着同樣的藍色軍服，戴着軟的軍帽，除了領上有一小塊紅色之外，沒有階級的標識。衛兵模樣好像好萊塢的強盜，臂上擺動着大的毛瑟槍，肩上是來復槍，背上大意地吊着日本 *Samuraï* 的劍。看來他們很崇拜他們的長官，可是他們從沒有向他行過敬禮，很自在的跟着他。

第一次見面，這位長官似乎沒有很可驚人的特徵。他沒有什麼話，也沒有顯明的裝飾。不多久我們就知道這位年紀三十七歲的王震是共產軍中一位最著名的將軍，一位經歷十七年內戰和抗戰的老將，短小精悍的身上帶了七個傷疤。王震雖然首先似乎灰色而中立，可是一路朝西向延安去的時候就

漸漸地教我們欽佩了。當我們大家都把初時的隔閡去掉的時候，我們也發覺他的爲人不拘束，孩子氣，對於我的照相機，打字機，和靈巧的機件好奇。他拿着一隻打壞了的外國式的煙斗不斷地吹着笑着，這隻紫着布的破煙斗就像他的穿着草鞋的赤足上的大姆指。他肩上掛着一架很好的日本雙眼望遠鏡。『這是打一次小仗的時候從日本軍官得來的』，他隨便地說。不久我才知道那一仗真是一次小仗，他帶了一千五百人埋伏在內蒙古的一條大路等候一隊日軍輸送隊。一千名日軍跟着五輛坦克車四十五輛載重汽車的隊伍開到了，中了埋在路上的地雷，王震就帶着他的部隊衝上去。日本人受了無線電求救，十五架轟炸機飛來了并且扔下催淚彈。王震和他的部隊都沒有防毒面具，只好被迫撤退，可是敵人殺的和受傷的已經有七百多名了，他們自己的死傷也有三百六十名。

這次的戰鬥俘虜了一個日本軍官，雙眼望遠鏡就是這軍官送給他的。共產軍的政策并不是把那些要求回到本來的隊伍去的俘虜關起來的。這位軍官被釋放了，他就拿雙眼望遠鏡送給王震將軍作爲臨別的禮物。回去之後，他給他的上級長官槍斃，因爲甘心被俘實在把日軍污辱了。

『有一次我們俘虜到一個日軍的少將』，王震接下去說。『他不願意回去被處死，所以我們就把他帶着。日本人知道了，就派幾架飛機來轟炸。最後他們發見我們在一個小村裏，撤下炸彈，終於把他炸死了』。

我們騎着馬向西走，地面越來越崎嶇。可是風景却把人民的勤勞和決心說出來了。這風景好像一幅織錦，織滿了緊貼着崇山峻嶺的種着小麥小米棉花玉蜀黍的農田。

『這些地土多數是荒廢了好幾百年的，』王將軍揮着手說。『兩三年前才拿來耕種——多數是我

這一旅的弟兄種的，』他半辯護地加上一句。我們聳起耳朵聽。這好像在說一個故事。我們要求他把這件事告訴我們。

三年前王震從華北的年長日久的戰陣回來，就接到命令把他一旅久經抗戰的戰鬥員一萬名改爲農民。他們要給自己備糧食，供給衣服，完成自給自給，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人民。爲了這個目的，他就分到南泥灣一塊荒山荒谷的荒地，同時也還得到一點點的口糧。

『首先我們就把黃土岩鑿開來做房子』，王將軍繼續下去說，『因爲冬天已經來了，我們得趕快做。於是我們堆起槍，砍下樹木，製造出粗劣的工具，燒掉樹樁，把地弄乾淨了就耕種起來。在附近那些沒有人的古廟裏，我們找到寺鐘，缸，和偶像，就拿來鑄鑄做犁頭。

『因爲我不懂種田，我就找我的部下自願地拿出他的經驗和知識。我們共同做一個生產計劃，種穀種菜養雞養豬做食物，餵羊取羊毛，植棉花織布。開頭我們就要購買必需的種籽和家畜，於是就在山上去砍松樹柏樹，砍成木頭，拿到延安去賣。我們曾經在日本人手上奪到一本關於飲食的書，爲了某種原因我留下來做紀念品，現在就有價值了。這本書給我介紹了卡路里，維他命，蛋白質的神祕——這是一種對於我的弟兄的健康有特別重要的知識。自從一九三九年國民黨在邊區周圍築了一道軍事和經濟的封鎖線，我們得不到外面的醫藥品，爲了教我的弟兄們可以打得仗，我就只得把營養改善了。』他停了一會，用力吹着絲絲響的煙斗。『這個故事你聽的討厭麼？』他有幾分不自信地問。

『不。不。說下去，』我要求他。

『好，頭一年的奮鬥真是教人傷心。我們碰到許多沒有預料到的阻礙，忍了好些時候的灰心。可

是毛澤東告訴我們說，我們應該自足自給，逃不了的——整個被封鎖了的邊區生死存亡的事情。每一個男人，女人，孩子，戰鬥員，學生，公務員都必須參加生產。我把這些話都說給弟兄們聽了。我告訴他們這是對他們好的。他們一定不教我們的領袖失望，一定不教他們自己失望。

「頭一年是費力的年。我們做的苦，吃的少，我們的軍服穿的都幾乎認不出是軍服了。可是弟兄們的熱情比我所能夠希望的還要高。去年我們需要的食物已經可以夠了。而且我們收成了棉花，收得了羊毛，足夠我這一旅的人穿舒適的衣服了。」

「你把紡織裁縫的費用都包括在內麼？」我問。

「費用麼？啊，不！我的弟兄會自己製造紡織機，會紡織。他們也會用縫紉機縫軍服，縫紉機是從日本人奪來的。你到了南泥灣就可看見了，」他保證說。

南泥灣距離這條直到延安去的路沒有多遠。聽了王震告訴我們的話，我們就打算繞路走。

我們走近南泥灣區的時候，看見十幾個人一羣的許多兵士在田裏工作。他們一面揮舞着鋤，耙和鏟，一面唱歌。他們的搭起來的來復槍，機關槍，手榴彈和迫擊砲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軍操方式。這些軍械幾乎是日本製造和在戰場虜獲的。它們緘默不語地證明這些勞動者澈頭澈尾是戰鬥員，而不是農民。

岩壁點綴着排列整齊的窑洞，每個窑洞深約二十五呎，廣約十五呎。窑洞裏的傢具都是兵士做的，粗劣然而實用。每個窑洞住八人。在旅部，我們參觀一架壓榨菜油的原始式壓榨機，一架用草造紙的小工場。我們也看見久經戰陣的兵士在紡紗，織布，縫軍服。

那天晚上我們就住在王將軍的迎賓館，一座日本式的精緻平房。

『爲什麼你們的建築的格式要挑日本式呢？』我問。

『哦，是日式麼？』王震有些驚異地回答。『我可不知道，我請 Okada 給我蓋一座外國式的房子。剛剛才完工的。』

『Okada，是誰呢？』

『Okada 以前是一個俘虜。他是一個工程師，三年前在同蒲鐵路上建築碉堡，後來給我們捉來了。捉來之後他加入了日本人民解放協會，現在在我這一旅。你想問他，你就自己問他罷。』

Toshio Okada 年紀三十一歲，是一個漂亮聰明的人。他穿着八路軍的軍服，似乎穿的非常舒適。我和他談話的時候，周圍擠滿了兵士，顯然他們是很喜歡他的。Okada 先生的模樣還沒有那位替我們兩個人翻譯話的中國人來得像日本人。他把他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黑漆的夜裏，他怎樣的在奇襲的時候被俘虜了，怎樣的思想必須受拷打受殺戮了；可是俘獲他的人待他極好，甚至要放他回去，這就他很驚異。因爲他知道別人回去之後就被密兵秘密地槍斃，所以他就拒絕。他到延安進日本工農學校，受了一年的訓練就在一九四二年加入八路軍。

『他現在是我們的勞動英雄了』，王震加一句說。Okada 先生窘而笑了。他發明了一架原則上很像美國農場用的抽水機，他們就推選他做勞動英雄。

吃了晚飯，我們就在月亮底下到一個圓形的戲場參加一個集會，一隊兵士和他們的妻子將表演現代化的土風舞，誇耀他們在南泥灣的成就。一塊布幕隨風搖曳着。布幕上掛着羅斯福，邱吉爾，斯太

林和蔣委員長長的畫像，布幕前面蹲着一個樂隊拿着希奇混合的古今樂器奏着輕軟和諧的音樂。那些跳舞的人則聲音清晰而自信地唱着歌。

「邊區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樂園。沒有地痞和遊民。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喜歡工作；人人都有地耕種，甚至兵士也都不再成爲他們的負擔，反而給他幫助了。」

一個流氓——一個剛到邊區來的遊民——出場了。他唱着，「我沒有吃的東西，沒有地，沒有家庭。」這個流氓從假想的舞台上的一邊望着一羣抬鋤耨的兵士出場。他們剛是從田裏回來的。一個女人從另外一邊出場。她說，「到我的家裏去，我燒飯給你們吃。」兵士們向她道謝，然而拒絕了。這女人惱了。「我的鄰居聽見你們經過這裏，我不請你們吃飯，他們看得起我麼？」兵士們笑起來。「多謝多謝，可是我們自己有東西吃，我們不吃老百姓的東西。」

他們走出去，看見遊民。「你是外鄉人麼？吃過沒有？要是沒有吃過，來，跟我們去」。那遊民露着驚愕的模樣。「這就是八路軍」；他說着就跟着他們走了。

這當然是宣傳——好的宣傳，我們自然疑心他們有意做給我們看。可是要記住這些演員所扮演的實在是他們所過的真正的生活。

這時候王震坐不住地走過來走過去。他和他的部隊坐在一起的時候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他們看他們的戲，一點也不理會他。當我看他的時候，一個傳令兵走上在他的耳朵邊說了些話。他突然抬起頭就大聲地笑起來，然後跳在桌子上高聲地喊立正。延安打來了一個電話報告法國登陸的消息。這是等得好久的。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了啊！一聲歡呼自然而然地發出來了，觀眾雄壯地大喊：「盟軍成功」

萬歲！『聯合國勝利萬歲』！『打倒法西斯侵略者』！

早上我們去訪問王震三五九旅的七一八營。營長何麟，年三十三歲，是一個矮胖善戰的人。『三年前我帶了四百四十三人到這兒的時候，這山谷是什麼也沒有。』他開始說。『第一年我們闢了些地，種了些糧食夠我們三分之一左右的需要。去年我們的生產增加了，全部的需要事實上都夠了。今年我們希望有多多的盈餘，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就是用兩年的勤力生產一年的餘糧』。

何麟誇張他那一營人的牲畜。他們每十人就有一隻牛，每三人有一隻豬，每人有一隻羊或山羊。每一連有一百多隻雞，又有一個養兔場。他已經能夠增加他的部隊的食肉口糧，從每月兩磅的最低限度增加到六磅。此外他還能夠供給我們各種青菜，差不多不限數量。

他的部隊排起來受檢閱了。我在中國住了很久，中國軍隊也看了很多。這算是我所看到的軍隊當中營養最好的軍隊了。何麟的部隊並沒有忘記他們是兵士，不是農民。在冬天，在播種和收成中間的夏天，這些軍隊都受嚴格的軍事訓練。連長顧震舟把他的隊伍的活動給我們一個概括的敘述，作為其餘的隊伍的模範。去年冬天他們學習短距離的攻擊戰。隊伍在一個佈置着壕溝，短牆，假人，以及各種障礙物的假戰場上緊張地學着刺刀戰，手榴槍的扔擲，和初步的野工事，此外，在一切可能的情形之下，他們學來復槍的用法。他誇耀他那一連人的來復槍射擊的記錄：以一米突大小的物體作為槍靶，往一百米突的距離射擊，三百七十二發子彈，只有三發沒有中的。扔擲兩磅重的手榴彈的平均距離為四十米突。除此以外，他的部隊也學讀書，學寫字，聽國內外時事的演講。他們自己又組織劇團作為娛樂消遣。

在七一九團圍都我們聽到同樣的農業和教育的成就的故事。他們設法空出時間搬運巨石，搬運搬哩外的山上的巨樑巨木來建一座大講堂。這講堂可容一千四百人，是一隊自告奮勇的兵士在二十七天中建成的。

團長張宗漢是一個高大能幹沉靜的人，一個河北省的富有地主的兒子。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到了河北，張就拿錢出來組織一個抗敵游擊隊。到了八路軍的正規軍開入河北省的時候，他的游擊隊人數已經有四千多人了。他要求八路軍訓練他的部隊，後來經過選舉，他們就參加八路軍。

我們去訪問旅部的醫院。這醫院的病房是一連串鑿進岩壁的窖洞。那兒有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雖然醫生和看護盡力照顧生病的兵士，可是他們沒有辦法拿藥品給病人治療，藥劑室整齊地排列了許多貼着拉丁文的標籤裝着西藥的瓶子，可是瓶子却是空的。外科醫生的器具用鋼鐵的碎片製成，多半是日本炸彈的碎片。器具是粗劣的，然而算是最好的，另外他們就得不到了。

我正和病房中一個傷兵談話，聽見外面有一陣騷擾。我不曉得誰開頭或者爲什麼事情開頭，只看見王震向我們團體一位中國記者發火：

『國民黨封鎖我們，不讓外國朋友送給我們醫院的藥品運進來，我們是對大家共同的敵人打仗的，這是殘忍是對天犯罪。要是上帝，或者菩薩，他們一定知道，一定吃驚，這種完全不要臉的樣子。』

辭鋒犀利的陳嘉康，周恩來的足智多謀的祕書，響應起來了。『我要罵國民黨。英國紅十字會裝了四大卡車的藥品送給我們，國民黨不讓它開出西安，開到直通延安去的路，不慌不忙地把它扣留起

來，把它沒收起來了。」

中國的新聞記者們冷淡而緘默地站着。

激昂的馬漢牛，王震的祕書，插進來說。「我要問，我們是誰打仗的？是日本人麼？我的最好朋友打仗的時候，手上受了一點輕傷——一點輕傷呀，可是缺少防腐劑，他變成血中毒，死了。那裝滿四輛卡車的寶貴的藥品是送給我們的，倒教國民黨在西安把它沒收了。我說他們是謀殺犯呀！他們謀殺我的朋友啊。」

他們團裏的愛爾蘭美國山南漢神父打算把情勢立即穩定起來。他說中國的軍隊到處都是缺少醫藥品的。他不知道是否因為忽略——要不然就是從容——或者是否因為東西不夠分配。可是他擔保盡我們的能力把在這醫院看到的悲慘的實情報告重慶當局，請當局注意。其餘的人，連中國記者在內，也欣然地同意了。終於這動亂的波浪平靜下去。

我們離開南泥灣之前，王震把他的工作總括了一下。教育部門所成就的結果，他特別地覺得驕傲。軍事訓練所佔的時間的百分之三十用為文化工作和政治工作。讀書寫字是每日的功課，上課的結果是百分之八十的兵士能夠閱讀通常的報紙，其餘百分之二十，差不多是新補充的兵士，最少認得一百至五百個字，足以閱讀特別簡易化的前線的日報。

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有密切的連繫。兵士們讀日本略侵中國的簡史，從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起到目前為止。侵略的歷史有許多是拿戲劇做媒介。這種有意識的努力是用來啓發對日本人的根深蒂固的憎恨。

「因此弟兄們就可以確實地明瞭日本人的獸行，我們把他們帶到七零八碎的鄉村，讓他們和那些受過敵人摧殘的老百姓談話。晉察邊區的一個鄉村，一羣人放火的日本人裝去一卡車一卡車的女人，無聲無息地把她們强奸了。許多抵抗的就被殺死；其餘的嚇人地殘廢了。有幾個永遠地瘋狂了。那些漂流回到村裏的，許多是自殺了。我們讓兵士們和那些丈夫，兄弟，父親談話，和那些害羞的女人談話。」

有技術的和有才能的挑選出來，鼓勵起來，給與特別的榮譽，給與物質的褒獎，以報答他們的成就。所以，勞動英雄或受到推選，受到讚美，得到酬報，得到榮譽，又鼓勵了別人起來和他們競爭。這給與兵士一個刺激，把兵士的單調的生活轉變改進為豐富而良好的生活。而且這又給與兵士一種覺悟和社會意識。

「我們給兵士們講社會保險，講了好幾年」，王震接下去說。「到了去年，我們才成立了兵士合作社，才使得我的弟兄們能夠把盈餘的錢投資進可以賺錢的企業。他們盈餘的錢是從田裏工作賺來的，將來在企業上再賺的錢就可以給與他們在財政上有某種程度的保險，保險他們年紀老了或者戰後復員當老百姓的時候的生活」。

有一句古老的話，「兵就是營和尙」，對於王震的部隊是不適用的。毛澤東和朱德都告訴他去鼓勵弟兄們結婚，幫助他們建立家庭，建立未來。他的部隊有四百多人結婚，每年大約生育一百個孩子。王震自己在一九三七年結婚。他的妻子是東北人，一個北平大學化學系的畢業生。她生育了三個茁壯的兒子。對於這一點，他覺得很得意。

## 第六章 延安

可以防禦轟炸的延安的窑洞城市今日正是邊區人民底韌性與決、底非常的象徵。這個城市本身已有三千年之悠久。古時候，這城市是一個禦防北方野蠻遊牧部落侵襲的重要的稜堡。延安一直繁榮了多少的世紀，到差不多一百年前回的叛亂，結果才把廣大的地域淪為荒蕪，把整個西北千千萬萬的人民大肆殺戮。延安的巨大的城牆依舊完好，可是延安城却是重新建立的。它穩定地生長着，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日本人拿不斷的轟炸來粉碎這個城市。濫施轟炸之後，古老的延安城就化為一片瓦礫。

然而這個城市建築物的毀壞，既驅逐不了共產黨政府，也驅逐不了人民。他們不過僅避到城外，在延安山谷的側面，千尺懸崖的山壁下深深地鑿了無數的壕洞，所以如今延安真的成了窑洞的城市，可以抵禦飛機的轟炸。這些窰屋排成一行行用拱柱隔開來的彎拱的牆洞，層層疊疊地攀着山坡。曲折的小徑從一層通到一層，把山上山下都連通起來。在每個窰洞前面，把山壁鑿出一塊平坦的空地，作為雞欄，豬圈，菜園，或者孩子們的運動場，也許還有一繩子洗淨的衣服飄揚在燥熱的陽光下。在下面的山谷裏，時常可見婦女們在混濁的延水岸边洗衣裳。馬、騾子和叫着的豬以及重載的大車輪的貨車捲起黃色的煙塵。徒步的和騎馬的人都戴上紗做的面罩遮住空中的灰土。

我們被引至延安招待所了。每人有一間指定的舒適的客房。這住所比我們在重慶的記者招待所還好。我們最初所碰到的是兩個外國人——林德賽和馬海德。林德賽是一位高大的，禿頂的，戴眼鏡的英國人，年紀有三十幾歲。一九三一年畢業於牛津大學。他到中國來當北平燕京大學的教授。一九四〇年有一個短時期他在重慶任英國新聞隨員。這工作對他不相宜，因此他又回到燕京。在珍珠港事變那一天他逃出北平，逃到正在鄰近山中作戰的共產黨的游擊隊中。他雖然是燕京大學的歷史和英文教授，可是他的好辯却早就在無線電方面。於是共產黨就勸他留下來幫助他們製造及修理他們的設備。同時訓練工作人員及技術人員。他逗留在前線約兩年半，與日寇玩着捉迷藏的把戲。日本人他們特別歡喜俘虜他或者殺戮他。在我們到達之前一星期他已經來了。

馬海德十足是個美國人就像林德賽是英國人一樣。他生在白福魯。在北卡洛林那和瑞士受了教育。（他在瑞士獲得醫學的學位）馬海德與共產黨相處已經有七年了。他用中文名「馬海德」（他拒絕宣傳他的美國名字），這樣他就更可以完全投入共產黨軍隊做醫學的工作。他也是三十幾歲，有一種頑皮的高興和熱情。並且毫不猶疑地丟開一切的事情來作譯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熱烈的支持者。

「對於這地方，有一樁事情我最喜歡的，」馬海德說「就是這兒絕對沒有職業上的嫉忌。這都是由于沒有金錢的刺激，沒有特別光榮恩惠的競爭的緣故。我們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就像一個大家庭中的人，滿意與失望彼此都有分。這使得醫學回復了本來的任務，醫學原就是爲人類服務的一種科學。」馬海德告訴我一種新的疾病。他以及他的中國同事都感到困擾。爲了缺少一個較好的名稱，他們

就叫它爲「跛腳病」。這種疾病有一定的標準化的病情，但是在醫學史上却不能尋出任何的記錄。這是在延安東面跨越黃河約有三千六百方哩的區域中一種土產的疾病。

「患者大都相像，」他說明「主要的顯著的破相就是因爲僵骨的圓端腫脹和膝蓋關節特硬而造成特徵的顛破。這疾病對於某些從青春發動期起到骨骼停止生長的廿一二歲爲止的骨骼的生長是一種妨礙。骨的組織顯示出過份的生長，尤其是環繞着那受着壓力的關節周圍。關節的表面上生成了唇形的東西，而手腕手指和腳趾的骨却縮短了——有時候只有正常的長度一半或者二分之一。」

這種疾病影響了一切年齡正在漸長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只當地的居民如此，移住境內的人也如此。雖然這疾病並不會完全使患者變跛，可是却能大大地減弱體力和工作能力：患者不能負重或行遠路；同時他們短而硬的手指需要特殊的細柄的農具。

「我們不能斷定這疾病的根本原因，因爲缺少必須的化學及生化分析的設備以及愛克斯光，用以研究在變化時期中的骨骼。又因爲缺乏與骨骼生長有樹的有用的鈣劑和維他命，以致我們的研究工作受了很大的阻礙。我們疑心水，」他繼續說，「在那個區域的樹木含有大量的磷質，夜裏木頭在水底下發光。農民們所用水流遍這區域，我們認爲這是擾亂血液中鈣磷含量的均衡的原因，也就是骨骼的破相的原因。」

這是有悠久的地方性的歷史，並非戰時的災患。同時患了這毛病，就毫無辦法可想。他們要澈底解決這問題，祇能勸告本地人在他們的孩子們到了這可疑的年齡漸長期的時期，就把他們送走。農民們對這辦法多少總表示反對，因爲他們不願與孩子長久分離。

「可是，那些我們已經設法送出這個區域的少年們並沒有怎樣顯出這種病象——這證明了不是由于遺傳，而確是由于某種當地的原因，」他總結着說。

當我將這神祕的新疾病的故事打了電報回去之後，沒有多久，就有一連串的電報從美國各種機關打來，訊問關於這新跛腳病的其他詳細情形。馬海德和他的同事只能夠把剛才告訴我的話加入他的故事。他們需要——而且非常地需要——一架愛克斯光機器，却也有幾個機關，包括美國紅十字會，預備把這種設備供給八路軍，但國民黨對這區域的封鎖却阻礙了這種設備運往延安。然而，幾個月後，這問題解決了。美國空軍在延安設立了一個臨時站，經常有飛機與重慶來往。於是美國紅十字會得以空運一架愛克斯光機器到延安，還有幾噸藥品供給八路軍。當我離開延安的時候，全部的設備還沒有到齊。所以要再多獲得些關於跛腳病的知識還嫌過早。

馬海德被派到位于延安郊外的白修恩國際和平醫院工作。這醫院設在一排窑洞之中，是爲了紀念諾曼白修恩醫生而建立的。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加拿大皇家飛行隊中的軍醫，一九三九年，在爲中國共產黨軍隊服務期間逝世。這醫院由孫逸仙夫人贊助，一部分是由國外的捐款維持。白修恩國際和平醫院可說是獨一無雙的——不僅爲了它的成就而且爲了它的無中生有的成就。因爲日本人及中央政府軍的封鎖，在過去三年之中，除了我們從重慶隨身帶去極少量的藥品之外，他們從沒有得到國外醫藥品。

醫院中的工作人員都是一羣目光炯炯，智力充沛的人。適宜的設備及必需品的短缺並沒有挫折了他們——實際上反而刺激他們完成了臨時的創造品和勉強的代替品。

中國藥草，藥物及化學藥品都被用科學的方法試驗着。他們發現了許多東西不僅可以替代西藥，而且在質地方面的確還要優良。他們用剩的西藥存量逐漸減少，貯藏在一個小抽屜裏，惟有在極端緊急的時候，才由全體醫生會商同意，施給幾粒寶貴的藥片。

穿着草鞋受過西式訓練的中國醫生與護士們在峒洞的試驗中工作。用破碎的窗玻璃給醫院中唯一的非常古老的顯微鏡製成玻璃片。

*Eye-needles* 用小茶壺製成，壺口放着燈心。滴眼器用一根末端塞住的橡皮管製成。微菌的培養放在爐竈煙囪旁邊的一個架子上。小玻璃管裝以外國製的腸線就成為試管。打碎的玻璃注射器插針那一部分是從日本人手中俘獲來的。甚者在陳設簡單的手術室中的那個將壞的金屬手術床也是。他們在架上放了兩個普通的玻璃管來做血液沉澱的試驗，而在近旁貼着一張平常的印花紙邊上畫了以耗為單位的比例尺。土製的石膏粉貯藏在嚴封的瓦器中。藥水棉花用當地的熟棉製成，紗布則由醫生護士們在古老的木製紡紗機上紡成的棉線製成。醫院工作人員也要種植和照料他們自己的菜園，從下面很遠的山谷的河裏把水挑上來，並且要自己洗衣洗物。

爲了缺乏麻醉藥和葡萄糖之類的重要物品，他們不得不屢次施行輸血。這些血液的供給者又常常是他們的工作人員。全醫院沒有一個錶或鐘，他們燒香來報時候，一支香剛好燒一小時。或者用水一滴滴地滴到一個瓶裏，旁邊有看守的人搖鈴來報時候。

『我們這兒最缺少的是新近的醫藥雜誌或關於戰時外科新發展的論文，這些文章使得我們可以跟

着醫藥的進步而進步，」曹培齊醫生說。曹醫生曾在廣西陸軍病院受德國醫生的教育。他簡單的鑿洞試驗室的白粉牆上懸着巴斯德、科和以及其他從舊醫藥雜誌中剪下來的醫藥名人的照片。

從這醫院度過山谷，就是延安醫學院，教務長王平是一個優秀的、智慧的、嚴肅的人。我們去訪問那醫學院的時候，那兒有二百一十個醫學生，其中五十四人是女生。教科書全是抄寫的譯本，從日文、英文、德文和美國著作翻譯而成。牆壁上有醫學圖畫，大多數是學生自己所畫，雖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專門石印的樣本。眼科臨診教授班有很好的驗眼器械，從日本人那裏奪得。缺乏外科與其他必需品也同樣妨礙了醫學院。那兒的工作人員祇會診斷却不能開方；甚至連診病用的觀察器也得不着。他們用普通修指甲的剪刀來施行手術，而光學燈却用一個標準火油公司的油燈製成，上面裝置了以德國打印罐製成的洋鐵皮的罩，裏層貼着從日本香煙盒內收集的錫紙。因為缺少防腐消毒的福莫林，以致等待着解剖課使用的屍首，祇得浸在強烈的中國酒白乾中。

從正月到六月，所有的學生每天必須紡三小時的紗，或者做其他的生產工作。男女學生全一樣，他們一行行很有次序地坐在一間大講堂中的紡紗機前面。在我參觀之後，王平和他的同事們就詢問我的批評和建議（在邊區每一個人都詢問，幾乎是請求，你隨時提供批評和建議的）。我坦白地告訴他們我覺得教這些學生每天花三個小時紡紗是浪費時間的。不論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樹立好榜樣，時間和腦力實在嫌太少，太寶貴了，不應該浪費在這種工作上。

『倘若每天利用這三小時作進一步的研究，或者至少在你們貧乏的圖書館中閱讀的話，對你們的論題和問題比較為那般懶惰的農民們以紡紗來做榜樣，一定更有價值』，我說，『那完全是浪費而沒

有效率的。」不久就證明他們嚴肅地接受了這批評，因為這問題在延安舉行的一次醫學會議上被提出討論。事後就下令取消每天三小時的生產工作。

## 第七章 這是共產主義麼

在這一點，最好是簡略地四顧陝甘甯邊區還沒有達到現階段的發展以前的許多事件。

在一九一一年中國的辛亥革命到一九三五年紅軍的到達，這中間的二十幾年，陝北是國內最受壓迫的區域。那裏的礦瘠不毛，崗槽起伏，居民稀少的地區就是盜匪出沒的地帶。那裏是鴉片的產地，也是受盡虐政，受盡當地的軍閥殘酷的苛捐雜稅的剝削的地方。

當地的軍閥最可惡的就是秦毓秀，著名的『土皇帝』，他有十一個小老婆，有大部份最肥沃的田地。替他種出的人事質上就是奴隸。他向可憐的人民徵收四十幾種不同的捐稅。而且，人民不只一定要供應他的軍隊，也一定要供應那些受大地主雇用的兵卒。

老遠就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共產黨的工人已經開始在陝北建立共產黨祕密的細胞。這些細胞是北平大學的畢業生所組織的。他們到榆林、綏德，和延安當教員。後來他們就和孫逸仙博士領導的，正在發展的，革命的國民黨合作。他們幫助國民黨組織農民協會及工會。他們致力於減租減息，以及武裝人民以反抗無恥壓迫的軍閥。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和共產黨決裂，陝北的共產黨員就被搜捕屠殺，和全國各地的同志一同殉難。在陝北被殺的有一萬人以上。

然而兩個本地的青年，高崗和劉志丹，就開始把各處留存下來的羣龍無首的共產黨員組織起來，

并且藉了農民和鄉民的助力把國民黨軍隊困在大的城市。到第二年，一九二八年，他們覺得本身的力量已夠強大，足以開始軍事行動，把國民黨軍隊驅逐出陝西全省。他們企圖以一派武裝的農民，工人和學生組成的軍隊佔領蘭州和西安中間的兩個城市，渭南和華陰。國民黨調到四營正規軍和他們交戰，這支遠征軍慘敗了。共產黨軍隊不只配備不足，又缺乏軍事經驗，而且他們打算和正規軍作陣地戰，這時鑄下大錯，結果是敗北而解體了。

兩年後，國民黨的守備隊在延安叛變，共產黨重新聚集起來和他們聯合，因此獲得了不安定的羣衆的有力擁護。他們組織遊擊隊，對國民黨當局作遊擊戰，規模漸漸地大了。那時候，他們的口號是：『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打倒苛捐雜稅，』『打倒貪官污吏，』『人民有權選舉自己的政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當日本人侵入東三省，第二年侵入華北的時候，他們就決定把民主遊擊隊的名義改爲西北抗日聯軍。他們宣言，并且堅稱以後他們只打日本人，不打國民黨，雖然國民黨正對着節節侵入的日本人採取綏靖政策。

共產黨就這樣的把陝北預備做抗日根據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軍的先鋒隊抵達陝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朱德和其餘的紅軍也到了。他們都是從江西出發，經過了八千哩難以相信的長征而來的。於是陝西的共產黨員就合併進去，而高崗則就任共產黨西北局的主席。現在西北局除陝甘甯邊區之外，還包括了晉綏抗日根據地。合併之後從此共產黨就住下來，整理新的家。

同時，他們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組織抵抗日本侵略的統一戰線。幾個月後，在一

九三六年聖誕節前，蔣委員長在西安被政府的叛軍扣留的時候，共產黨就把他們的誠意表白了。不管他們過去和蔣介石是怎樣地長期苦戰，不記住他們千千萬萬的同志已經給國民黨處決，共產黨這時迅速地出來請求叛軍釋放蔣介石，爲了向侵略者作更廣大的鬥爭。事實是顯明的，共產黨的巨大的影響，使得蔣介石恢復自由了。不久之後，國共雙方都同意密切合作，成立了統一戰線。共產黨提出了至今聞名的『五項建議』和『四項保證』。

七月，對日的抗戰爆發，這些『建議』和『保證』被接受了，並且被列入國共雙方所簽訂的協定，協定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簽子的。於是共產黨自願更改陝北蘇維埃區的名稱爲陝甘甯邊區，停止沒收土地，建立普選出來的民主政權等。他們也同意更改紅軍的名稱爲國民革命軍，在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踴躍地配合起來作持久之戰。

行政院舉行第三百三十三次會議的時候，對於邊區的名稱和區域共產黨堅持着委員長必須承認雙方所訂的協定。邊區的面積約共十三萬平方公里。邊區的居民據稱約共二百萬人。不幸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發生誤解，所以在對日抗戰爆發後兩年，邊區就給幾十萬政府最好的軍隊包圍了。共產黨斷然地說，一道築有一萬座以上的碉堡的封鎖線已經構成了，而且現在也還存在着。這越來越緊的封鎖使得邊區的面積縮小到九萬平方公里，居民減少到一百五十萬人，外加駐屯軍及政府全體人員八萬人。

邊區政治的進化，從內戰時代的共產主義到代議的民主制度，也許是邊區的歷史最重要的特色。一九三八年，邊區政府開始用直接的祕密的投票舉行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信仰，財產，性別或種族。一九三九年邊區人民政治會議第一屆大會開會了。一九四一年，選舉方法修改爲新的『三三制』。

——其方法就是共產黨限制自己黨員被選人數只能佔三分之一，餘下三分之二的政府職位，留給非共產黨的各階級及各民族（即蒙族回族等）『抗日而民主的』人。如果選舉的結果，被選的共產黨員在三分之一以上，那麼他們就自動放棄。自從那個時期起，這個原則就經嚴密地遵守。舉一個例，現在遼區 府共有委員十八人，共產黨員只有六人。非共產黨員在政府應有地位和權力，共產黨員在政府則應服從多數，這是共產黨的一個原則。

一九四一年冬天，人民政治會議第二屆大會舉行了。共產黨候選人提出一個綱領。這是黨的遼區政治局建立的，他們宣稱這個綱領是他們要求選舉的基礎，是以三民主義和孫逸仙的遺囑為根據的。因為這個綱領表示出共產黨的精神和意志，因為後來國民參政會以議案的方式把它採用了，我認為這選舉政綱幾個要點極有援引的價值。

## 第八章 一種混合的經濟

現在邊區並沒有集體主義，一種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只除了變工隊和合作社這種修正過的民主的體制。合作事業以私人財產為基礎，自願同意為原則，用着許多方式用來組織散漫的，個別的，落後的農村經濟。有十萬以上的農民（約佔農村勞工四分之一）已經組成變工隊和扎工隊。有二十萬人已經加入消費，運輸，生產，和信用合作社。有婦女十三萬七千人以上已經組成紡織合作社。

變工隊制度在增加生產上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一方面，這變工制度類似蘇聯底集體農場，雖然在邊區每個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權。這制度或者更近似美國農民底收穫團。事實上這制度是這樣的：八個，十個，或者十二個鄉鄰聯合起來交換他們的勞動力，今天大家在這個人的田地上工作，明天又在第二個人的田地上工作，如此類推，直到全部田地耕種完畢。一切耕犁播種收割，收穫都是合作完成的。如果一個人田地比別人多，那麼他就要多派一個人工或者給大家捐一分額外的食糧，以求公平。參加變工隊的人沒有一個是受強迫的，而自從這辦法證明了是有利的之後，反對的人也就很少。妻子們也參加變工隊，她們輪流備辦大家的飯食。同時別的妻子們也同樣的從事紡織的合作。

首創變工隊而且證明了它的價值的是吳滿有。一九三九年當他和一羣鄉鄰們顯示了集團努力比較

舊制度更有效率的時候，整個邊區猶豫不決的鄉民立刻就都採取了這個信念。現在變工隊的口號，就是『和吳滿有比賽。』吳滿有現在已經是邊區第一名勞動英雄了。這種勞動英雄在農業，工業，軍事文化以及運輸各部門都有，一共有一百八十名。吳滿有却是獲得這尊榮則第一人，他在一九四二年就得到邊區政府的嘉獎。他的肖像顯著地掛在陳列室，家庭，公共場所，和毛澤東、朱德、以及其他政治軍事領袖的肖像在一起。

吳滿有年紀大約六十歲，身體結實，面龐紅潤，眼色和悅，露着客氣的微笑，嘴唇上有一撮白的鬚鬚，頭上有靈亮的禿頂。他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可是對於耕田的方法他却有非凡的知識，而且極有隨機應變的能力，因為他比較普通的人能夠耕種三倍的田地收穫三倍的穀物，所以大家都尊他爲勞動英雄。吳滿有，以及別的和他一樣的人，成爲勞動英雄，不只給人們尊重，并且都被邀請參與一切公共的和政府的機構，他們和最高的行政長官，軍事長官一起佔有榮譽席。

『毛澤東來找我幾次，請我到他家裏吃飯，』他驕傲地說：『并且的確確和我握手，』他伸出起繭的手掌給我，又再加上一句。在並沒有多少年之前在紅軍到來之前，吳滿有從一處饑荒的地方作爲一箇貧困的災民，逃難到延安來。

『我只得賣掉三歲的女兒，換來六斤苞米養活一家人，後來我能夠到山上的砍下足量的木柴去購買較多的食物和農具耕種一塊租來的確瘠的田地，』他接下去說：後來他還不起租了，他的田主便把他關到牢裏，他的妻子餓死了。不久共產黨到來，把這田主的地分了，吳滿有分了『一個小山』（現在邊區對於逃難的災民都補助田地，農具和食物，一直到他能夠自給爲止。）

吳滿有用這薄產開始，經過了八個年頭，已經建立了一個擁有六十五畝地的農場，這全都是從沒有開墾過的荒地開出來的。而且，他還有四十隻羊，四條牛，一匹馬，四個蜂房，臨完他又說一句，『我不知道我有多少雞。』他把儲蓄起來的錢幾千元投資在一個農民零售合作社。在舉行自給自足運動的軍隊時來訪問他，請他把技術指教戰士們。

應了他的邀請，我就去拜訪他的農場。這農場坐落在離延安不遠的層層疊疊的山上，他一定忘記了他曾經邀我來，或者他以為我不會認真地應他的邀請。無論如何，當我到的時候，他正在山坡上砍柴。很顯明的他看見我的時候，那種驚喜和愉快。我也是這樣，並且我寧願如此，這麼我才可以見到那種并非專為我來而特別預備的光榮。

他把一大捆薪柴，措到肩膀上。於是我們朝着他的家走去。他的家是在懸崖邊開鑿進去的窖洞，一連有三個大的幾個小的，俯瞰着山麓的田野。這片已被開墾的土地伴着頑皮的小孩，叫的豬，吠的狗，明晰的小雞，顯得生氣盎然。一羣碩壯的牛遲鈍地看着這景緻。小孩子都穿着很好的布鞋——一個表示真正繁榮的標記，中國各處都是如此——並且看出是快樂、活潑、和營養充足。女孩們戴着小手鐲和耳環，也許是銀的。

婦女們——他的女兒和媳婦——很怕羞，當我不期而到，她們都奔進窖洞裏去了。她們是農民，可是穿著質地優良的的棉布，穿的非常考究，極其乾淨。

窖洞照例是那副模樣，很寬敞屋頂是彎拱的，牆壁是粉白的。房間裏，一端設着炕，這種大的土台，就是中國農村的家庭的眠床。炕上鋪着很好的棉被褥和手工織的羊毛毯。牆上掛着半打紅綢的

旗，上面寫着黑字，這是人家送給他表示尊敬的紀念物。靠着炕的牆上掛着三個鏡框，裝着毛澤東送給他的證書，這是他最寶貴的財物。

他是最客氣的人，簡樸而懇切，可是他不知道我對他有什麼屬望。我告訴他，我只想看看他如何過生活，會會他的家人談一談。男子們都到田裏做變工隊的工作去了，他帶我出去，指着一羣人給我，那些人正在高高的山上周圍耕種。婦女們爲了好奇，已經不害羞了，就放下紡織，走過來攀談。

這個家庭有十一人，加上四個傭工。這些傭工是河南逃荒來的災民。他大約有七百畝地，然而他耕種依照明年的偉大生產計劃充其量也只能五百畝，所以他就把其餘二百畝分給這幾個災民，讓他們能夠自立。

變工隊的人都來喫中飯了。他們坐下來喫肉、蔬菜、雞蛋、蜂蜜，都是吳滿有的農場的出品。他的蜂房是王震酬謝他的，因他把效率高的耕種方法教給王震的部隊。

他看着我到處拍照，十分高興。後來我要走了，他就要替他拍一張和他的一條牛照在一起的照片。原來這條牛是勞動英雄大會新近贈給他的。他得了這條牛，非常得意。

爲了預防荒年，他給全家儲藏了足夠一年半的糧食。他說，『如果今年的收成達到了我的希望，我就可以多儲藏三年的糧食。』每一個邊區的人都接到勸告爲自己一家人立下生產計劃，吳滿有的計劃已經預備好了。他一定要開闢另外的一百二十畝荒地，把一年八十擔穀的產額增加到一百二十擔。至於他家裏勞動力的分配：『三個大人和我要參加變工隊，我的十二歲的孫子要牧羊。女的三人，兩

個燒飯和餵豬，一個全力紡織。除了種小麥的地之外，種小麥和種別的地最少要翻兩次。每畝地要施四包肥料。荒地要拔兩次草。我自己呢，一部份的時間要領導變工隊，另一部份時間則要訓練地方自衛團的幹部，同時也要依照政府的意思辦理本區的戶口調查。對於到我們村裏來的難民我要拿出五擔穀來給他們，我也要拿多些的錢投資到農民零售合作社。我要把一匹騾子投資給合作社運輸食鹽。」

勞動英雄的口號是『和吳滿有比賽』，那麼還有什麼不可思議麼？當政府立下一個目標——三年

的勞動儲存一年的糧食——給人民去完成的時候，吳滿有和那些勞動英雄們就給自己立下最低的目標，只用一年的勞動取得兩年的收成。

使得邊區自給自給的生產運動開始於一九三九至四〇年，是對於實施邊區封鎖的一種反抗。到一九四二年生產運動的規模已經很大，現在却發展到整個共產黨所領導的別個抗日根據地的華北。每一個人，從最低的農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員，都立下生產計劃，製定一年中在農業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綱。（毛澤東在他的一塊小小的地種下洋蔥。朱德則種高荳和白菜。）

人們用着狂熱來參與生產運動。這種狂熱就是最樂觀的提倡者也都意想不到的。他們歡喜告訴你關於李來增一家人的努力的故事。

李來增和他的三個兒子，三個媳婦，一個孫子，住在山西太行山的襄垣縣。因爲日寇不斷的掃蕩戰，田地歉收，以及因此而起的無信，李家越來越窮。他們大家都沒有東西喫了，沒有衣裳穿了，所以他們就互相詬誶。最後，兒媳們都要求父親把田分給他們，使得他們可以賣了田，各走各的路。可是在中國，家庭的束縛仍然是可貴的；所以李老頭子就召集一次家庭會議，研究他們的問題，籌謀對

付環境的方法。

第一、他們就舉行選舉，推選李老頭子做家長——這個地位是傳統指定給他的。——推選大兒子做男子小組的領袖，他的妻子做婦女小組的領袖。他們定期開會。開會的時候鼓勵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每一個人指出別人的缺點，也要指出自己的缺點，坦白地討論糾正和改進的方法。李老頭子提出來的生產計劃整整地辯論了一個月，經過了大家同意修正之後，這才一致的通過。

三個兒子中，大兒子最強健，就派他用一半時間到田裏去，一半時間去當傭工，掙下錢來購買他們田裏所沒有出產的東西。李老頭子和第二個兒子估計只有一半的力量，就用全部的時間耕種。第三個兒子指定看管牲畜。這是預備給合作社運輸用的——又可以多賺一點錢。

婦女們也安排分工。老母親看護孫子，同時也紡織。三個媳婦有時理家務，有時從事紡織的合作事業。

這一家嚴密地編定一個預算。每一個人對於生產計劃都有特別的貢獻。他們共有的三十二畝田只能希望出三十擔穀，所以大兒子（他只拿一半的時間耕種）必須掙來一筆現款，和二擔八的穀價值相等。小兒子（他不在田裏耕種）擔保從合作運輸掙來和十擔穀的價值相等的錢。三個媳婦擔保每人每月紡織兩斤布。（每斤等於一又三分之一磅。）他們立下了分配利潤和報帳制度。把盈餘分做十份——八份屬於全家，二份作為個人的獎金，給那些對於生產計劃的貢獻超過限定的人。一個節儉的份子省下來的錢也嚴格地照這個辦法劃分。那些在實現了自己所計劃的貢獻之外再幫助別的人，依照家庭會議提出通過的辦法給與相當的酬報。



毛澤東在毛澤東東  
毛澤東東毛澤東

李家的生產計劃成功了，於是村裏別的家庭立即仿效他們，放棄了封建的家長制，而採取了李家的民主方法。這運動擴展了，不久李來增就被選為勞動英雄。

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參加生產運動。學生，公務員，工廠工人——每人都有一架紡紗機或者一小塊土地，但顯紡了幾兩棉花或者種出幾磅蔬菜。就是派在我的審洞一樣的寓所照管房間那個孩子也用他的空餘的時間紡紗或者看顧門外那小小菜園。

各種部門都有勞動英雄。我在訪問紡織廠的時候就和鐵工勞動英雄李之華談話。他是一個高大的，沉靜的，聰明的人。人家推他做勞動英雄是因為他在同一個時候管理兩個鑄鐵爐，這邊把鐵燒紅拿來錘鍊之後，再把那邊燒紅的鐵拿來錘鍊，如此輪流，避免了時間的浪費，加倍了製造的產額，當鐵拿去重新燒紅的時候，每個鑄爐旁邊站着一個學徒，而李之華却在兩個鑄爐中間走過來走過去，用他全副精力做打鐵的工作。有一點可以利用的空閒的時間，他就每天給他的學徒教三個中國字。他把字寫在一塊掛在兩個鑄鐵爐上面的小黑板上。當我和他談話的時候，他的三個學徒站在他背後，張開嘴在笑，並且伸出他們的大姆指，這就是說「他頂好！」

火夫的勞動英雄就是董又興。他在共產黨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工作。他是滿洲國的傀儡兵，一九三八年給八路軍捉來的。共產黨放他自由之後，他就決定留下來和他們在一起；現在他給報館五百個員工做燒火燒水的事務。他簡單地把灶門縮小，把煙囪的通氣改良，於是每天可以把燃煤三百二十五斤減少到二十五斤。因此他就當選為勞動英雄，並且得到大量報酬。

李偉，戰鬥員的勞動英雄，是王震部下小隊的領袖。他把他未加入軍隊之前的悲慘的故事告訴

我。他的父親是一個傭工，雇主苛待他，當李偉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就死了。他的母親想叫化度日，可是結果還是再嫁。李偉則交給一個很遠的親戚，做牧羊的工作，沒有工資，也喫不飽。當一九三九年八路軍來到山西他的家鄉，他立刻就加入他們的隊伍。他工作的很勤苦，他的行為可以作為模範，所以提升做小隊的領袖。當王震把部隊開到南泥灣的時候，李偉簽起了『一天耕田一畝』運動。他自己却給部下立下一個每天耕田大約兩畝的目標，并且常常從事協助落後的隊員藉以維持全隊的高的平均數。

李偉是真正的農民典型：說話慢，可是天生的客氣，待人週到。他很得意他和他的弟兄們所住的簇新的窑洞。『當他加入隊伍的時候，他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其中一個說，又再驕傲地加上一句，『現在他的文章登在我們的壁報上，是最好的，我們大家都要讀。』

婦女的勞動英雄也有，諸如郭鳳英，一個堅決的，鎮定的，年紀三十六歲的婦女。他十五歲結婚，一直過着很苦的生活，二十歲那年，他的丈夫死了，只給她留下九畝地，留下喫的一擔黑豆，和兩個需要照顧的小孩子，一個九歲，一個七歲。郭鳳英並沒有坐下來哭她的命運，也沒有去依靠別人。她解放了她的腳，把棉花塞入鞋頭做鞋襪，跑到她的小塊田地上盡力勤勞。因為她刻苦工作，她漸漸地富有了。去年當地收割了巨量的穀，她的鄰居們就召集了一個會議，推選她做出席。動英雄大會的代表，在會議中她就被選為國家勞動英雄。

他們最得意的勞動英雄是二流子的勞動英雄。現在邊區最壞的東西就是二流子——無賴的遊民。被封鎖的人民爲了自給自足而奮鬥，差不多是生死存亡的事情，所以對於二流子真是忍耐不住。無賴

遊民不只是寄生蟲。他們頑劣的習慣，他們的懶惰、賭博、欺騙、說謊、偷竊、敗壞了社會的風紀，他們在共產黨正在爭取的蓬勃有生氣的社會上沒有一點地位。

當共產黨在一九三五年來到邊區的時候，估計無賴遊民有七萬人，到了一九四三年初，棄邪改正的只有九千五百五十四人。這是特殊的困難的事件。然而邊區政府決定把這個問題完全解決。他們着手一個劇烈的改造運動。到了一九四四年初只有三千九百六十七人改造過來。他們抗禦一切的壓力，死都不肯悔過。當懇求買贖，甚至恫嚇都沒有效果的時候，人們便決定多多少少採取法律的手段：每一個無賴遊民必須佩帶一大塊白色的臂章，上面寫着『二流子』三個字。這樣給人家嘲笑，唾罵，并且受着不斷的屈辱，就可以教他覺得羞愧而改造過來。

同時政府則採取較為巧妙的方法。在一次勞動英雄開會的時候，政府選出了五個不肯悔過的無賴遊民，請他們到會。這五個人起初以為是要挨受到什麼處罰或者當眾的羞辱，所以都拒絕了，後來經不起鄰居們的堅持，這才從命了。當他們到了延安的時候，發覺了他們所受的感歎款待和那些勞動英雄們一樣，他們就驚奇起來。他們走進大禮堂，大家都拍掌歡迎，并且招待他和高貴的客人坐在一起。大家請他們喫酒，喫餅和糖菓，并且請他們參加一切的討論，把他們和勞動英雄們一律看待。會議將告結束的時候，這五個人全都宣言他決心改造——於是勞動英雄們都向他們喝采歡呼，并且給他們提出高貴的意見和協助，幫他們立下自己的生產計劃。政府也盡了政府的任務，把土地授給他們，把農具、種籽、和牲畜借給他們。這五個無賴的遊民就在這個時候說：『如果我們不肯改好，我們再不把自己當做人了！』

這時，延安縣政府也召集縣裏的無賴遊民六十三人開一個會。在五天的會期中，一直有官員，教育家以及黨部和政府的領袖向他們演講。那五個已經改好的遊民也邀來向他們相反的同流敘述他們目擊的事情，身受的待遇，以及他們立誓改造的決心，開會最後的一天，劉森海向他們演講。這是邊區最聞名的二流子，已經在兩年前改過自新，現在是勞動英雄了。他同會眾敘述他的故事，他的妻子和四個孩子看他懶惰，賭博，沒有出息，就離開他。他決定改造了。開始他用一隻驢子，辛勤地做運輸食鹽的工作。現在，他已經有六隻驢子，一隻騾子，三隻牛，八十一隻羊，一百五十畝在耕種的田。他的家人回來了，他們都喫的好，穿的好，而且快樂。他這個例子鼓勵了村裏另外兩個遊民也要改造，他就幫助他們從事自足自給。

劉森海對着無賴的遊民們演講，越說越熱烈，終於向吳滿有挑戰，要明年和他來一個生產的比賽。「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像這個改好的二流子也能夠得到人家給我這麼大的光榮，」他結論說。他說到他村裏推選他做地方的勞動英雄，而在這遊民會議之前舉行的全國大會中他又被選為國家勞動英雄。這次延安縣政府的處理改造了極多的死都不肯悔過的遊民，雖然六十三人中還有幾個仍舊很頑固。然而會議却非常的成功，因為會議在一般人心目中清晰地而且最後地確立了一種見解：延安是勞動者的社會。我想國民黨中提議封鎖的人心中難得有這個目的，可是他們無疑地已經使得延安當局能夠開放了更遠的與民更始的泉源。

## 第九章 生產的努力

生產運動不限於人民；軍隊也參加的。這或者是八路軍獨有的特色。像我所知，世界上沒有一支軍隊有這種規模，而且這對於軍隊與人民的合作無疑的是最重要的因子。觀光八路軍的人都不懷疑這種軍民的團結，使得八路軍就能夠保有不可思議的作戰的銳氣。他們必須臨陣奪武器來作戰。自從一九三九年經濟和軍事的封鎖實施之後，八路軍——有正規軍五十七萬人（就一九四四年十月而言）得不到重慶的中央政府一發的子彈，一文錢的軍餉，一絲一毫的口糧。被封鎖被戰禍的華北人民支持八路軍一定要受到可怕的重壓，所以八路軍就參加生產運動。一支軍隊能夠這樣自助的確就會獲得了人民的熱烈的維護，也就會建立了良好的軍風紀。

我寫過王震和他的第三百五十九旅的部隊。可是這只是衛戍邊區的五旅之一，這教我想起了一個希奇的問題。有一天晚上，我和一羣軍官談話，冒險一說我想假定，駐紮在國民黨區域鄰近的邊區的八路軍八萬人恐怕不夠對抗胡宗南的中央軍五十萬人，如果重慶再發動一次新的『圍剿』的話。他們毫不猶豫地同聲說：『夠了！夠了！』這并沒有一點誇張。這完全是事實。『你忘了，』他們又說，『我們有老百姓在一起的。』

在八路軍努力生產中，有許多事實和數字是很有趣的。一九三九年，邊區的駐屯軍開闢了二五、

一三六畝地，總共收穫了一、五九〇擔穀。到了一九四三年，他們開墾耕種的地有二一五、〇〇〇畝——這樣擴大了耕種的面積，相等於一九三六年紅軍到來陝北之後全部的耕地的三分之一。到了一九四三年年底收穫的穀物有三一、〇〇〇擔。一九四四年年底，耕種的地可以希望有八四二、〇三四畝，出產一二〇、三九三擔，約當一九四三年的收成四倍。

以前收成差不多只有小米，現在除小米之外，他們也種小麥、米、豆、苞米、黃豆、大麥、芝麻、燕麥、裸麥、棉花、和各種各類的蔬菜。想到陝西土地是著名的貧瘠，這分門別類的收穫，是可以注意的；所以這也是巨量的新的收穫。除開了穀物，可是包括了蔬菜，制服，紙張和別的軍隊所需的東西，邊區的駐屯軍，在一九四三年達到了自給自足九七、五%；餘下二〇、五%就由邊區政府供給。

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生活水準爲基準，（百分之一百）這支軍隊的生活程度到一九四〇年降到八八%一九四一年降到八四、二%——這完全是封鎖的一定結果。到了一九四二年，生產程序開始付諸實施的時候，他們的生活程度就升到九六、三%，到一九四三年却升到一二五、五%——或者是比一九三九年的水準高出二五%。一九四三年一個士兵的標準的配備是：兩套夏季的制服，一套冬季制服，四分之一的棉大衣（即是說一件大衣必須穿四年），和二分之一的棉被。至於腳穿的，一個士兵可以得到兩雙夏季的布鞋，一雙冬季的厚布鞋，一雙草鞋。此外的配備還包括二分之一的綁腿，三分之一的子彈帶，三分之一的糧袋，兩條毛巾，三斤羊毛——這羊毛在紡成毛線之後就可以拿來做圍巾或者額外的短襪。去年在王震的一旅，每一個人都拿到一套全毛的制服，這是旅部自己織造的毛製

品。這一切比較美國軍隊的配備，似乎是大短少——真是太短少了。然而這些東西大部份都是士兵在那種很可以把外國軍需官嚇倒的環境中親自製造的。

八路軍士兵每人每月可以得到四磅又九盎司的肉——這雖然比國民黨的軍隊得到的多些，可是比美國的工人階級在戰時所消費的食肉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而且美國的工人還可以從別的食物得到大量的蛋白質。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情形的嚴重，不只在邊區，也在全國各地。可是這比較雖然可以教人深思，却并非是一個絕對適當的比較。最重要的事實是，照中國的水準，八路軍士兵已經生活的很好，他們也知道。他們自己就是生產的主要份子，這對於他們更是一種鼓勵。肉的口糧配着四十八磅左右的蔬菜，和六十磅小米，這就是說，每天有穀物兩磅，蔬菜一磅半。油、調味品、和燃料也供給的，燃料是很好的白煤。很明顯，一年之中大半年的蔬菜是新鮮的，斟酌這個事實要維持這種規定的飲食的平衡却很困難。

把士兵限定的食物和延安一個小兵工廠的標準工人所得到的口糧，比較比較是很有趣的事情。我問過一個工人，他告訴我，他一個月得到的糧食（拿東西或者照東西的市價拿錢）就是四十磅小米，二十磅小麥，和四磅肉。那麼在穀物方面，他似乎比士兵佔優勢，可是在肉方面他就有些居劣勢，而在蔬菜方面却只有士兵的口糧四分之三多一點。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也有同等的配給。延安的小孩到了七歲就領到大人的口糧，這是值得注意的。而且必須記住，中飯一頓主要是蔬菜，小米，饅頭，却由工廠供給。兵工廠的工人也領工資和衣服。工資規定依照小米的市價計算，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受物價變動的影響。實際上，工人領穀物也好，領錢也好。自然，照這工廠的情形，資本家是沒有的；可是

工資也有不同的等級。職工，部長的工資和熟練工人，及學徒的工資比較，其比率大約是四——三——二。軍隊裏也成立合作社，士兵可以把參加生產計劃得來額外的錢向合作社投資。把投資的總數拿美國的金元來，做一個準確的比較大約是不可能的。

邊區有自己流通的貨幣，邊幣——重慶認為不合法，可是延安當局所統治的區域，那裏的人民却絕對信用。延安的邊幣可能被折作重慶的法幣八分之一，而法幣在一九四四年只有美金四十分之一。然而價值的尺度却不可能比較，因為在國民黨治下的中國，通貨和物價的膨脹，是很嚴重的，而對美元的交換比率却固定在人為的十分不合理的數字上。要記住邊區政府當局對於防止通貨物價的膨脹，已經成功得多，這樣就使得交易有正常的狀態。雖然這數字對於美國的讀者沒有什麼意義，可是對於最好的軍隊在合作事業上的投資那種金融狀況的研究却有價值。王震看到他的部隊在戰後的經濟獨立，就卓越地組織了軍隊合作社。其中百分之六十是他的一旅人經營的，每一個士兵最少要隸屬於一種企業。一九四三年，他這一旅平均每一個人的投資有邊幣四千一百五十八元，投資的總數約共邊幣五千萬元。他個人投資，個人收取進款。除了這個數目之外，旅部還有共同的投資邊幣二千九百萬元。

八路軍自己生產的物品和材料，從衣服到武器，從金屬器具到木料，各種都有。甚至勝家縫紉機（在邊區和在中國別的處一樣也非常重要的）的一部份機件也都由縫製制服的工人製出。汽缸的部份和附件以及活塞的環在鄉下很重要，因為在那裏時常要毀損。鋼的製品和軍械用『發工廠』的辦法製造：前線的軍隊在日寇的佔領區奪到鐵軌立即運送後方，在後方生產的軍隊就改製為軍械。可是這不

過是較爲有戲劇性的努力生產的例子罷了。看一看世界上任何軍需庫的軍需表，大量需用的物品就使你想起一個芝加哥函購的目錄。八路軍的需要比較美國軍隊少得多，可是這些需要大都是他們自己供給的。新的軍營或者工場一定要蓋起來麼？或者新聞紙私帶入日寇的佔領區麼？武裝的成兵并不常常製造建築用磚灰；黑水和紙張也是這樣。

對於一個慣於想到巨大的生產指數，使用工具是第二天性或者是較好的天性，并且創造力給產業文明的動力所鼓舞的美國人，八路軍的成就也許是有限的。但是中國不是美國，中國的文明只是農業文明，大部份還流行着古老的遲滯的節奏，中國的技匠是上等的勤勞的工人，特別是當他用傳統的舊式工具做世世相傳的工作的時候。甚至農村的技匠在他自己的行業也是一個熟練的可靠的工人。可是這些技藝和行業與現代戰爭所需要的物品的生產沒有什麼關連。所以八路軍和行政當局就面對着一個嚴重的問題，要把這個問題解決——知識是缺乏的——就必需絕、的熱情和無限的耐力。合攏的來復槍上的刺刀能夠即刻沒有聲音；拉出來裝在槍尖應用，對於一個美國的工廠經理似乎是無足輕重的創造；但是對於延安的農兵却是真實的成就。

所有這些物品——鈕扣、陶器、彈藥、電花栓、電池、電線、皮鞋、牙刷、和肥皂——都在那些不值得提名字的工廠中製造，而且，如果以美國的規模爲參考，製造的數量不值得注意，這一定也要承認的。然而當紅軍到陝北的時候，工業完全沒有。到了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正式開始，一個小兵工廠，一個制膠廠，一個印刷所已經成立了，共有工人二百七十人。到一九三九年底，就有產業工人七百人。現在邊區共計有工廠的工人一萬二千人，用全部的時間工作，未來的增產是可能的。就一個

區域而言，這未來的增產可以說是巨大的。這是共產黨努力的結果，使得現時代剛建在這區域作第一次的衝擊。

對於鼓勵工業發展，政府當然也和軍隊聯結起來。延安行政當局并不限定於設立國家企業，這是應該注意的。政府爲了鼓勵私人企業和合作事業，將定購巨量的貨足以擔保可以獲得很好的利潤；或者將把營業資金供給合作社，肥皂、火柴、紙張、化學藥品、玻璃、瓷器都是這樣生產的，一九四三年五月，第一鐵工廠開設了。這廠的生產力并不大，主要的原因是工人和理事對於鐵工廠不知道怎樣經營。他們坦白地承認這一點——可是他們并不因此而不要嘗試。鐵是主要的，雖然他們只能生產一些，却是極其重要。鐵工廠有兩個小的和三個比較大的熔爐，二百個輪流工作的工人。幾十個士兵則開掘鐵礦，那是在離開工廠約有十里地方。

在邊區軍隊也開越來越多的煤礦。一大隊騾子馱着堅硬，大塊，良好的白煤在路上移動。雖然適當的開礦設備和運輸便利兩者的缺乏限制了生產，可是產量還是穩定地增加。

我費了些時間去觀光延安一帶的工廠，兵工廠構築在山麓，一半掩藏起來。從延安去，騎五六個鐘頭的馬就可以到達。這兵工廠本來是爲製造農具而設立的；可是當封鎖邊區已經實施，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這工場立刻就改過來製造手榴彈，修理軍械。那時這工廠只有兩架車牀，一架鑄機，一個唯一的有經驗的鎗匠。別的機器添起來了，大部份是兵工廠的工人自己辛勤製造的。現在，這廠專門製造彈藥和手榴彈了，鐵料是從鋼軌，和戰利品得來，也從各種東西，諸如殘破的廟鐘、鍋鏟、甕斗、和舊彈殼之類得來。發動力則由蘇聯一九三三年式的吉斯戰重車的引擎和一九二九年式的雪佛羅

來載重車的馬達供給。這些用木炭做燃料的單位在一個單獨的架空的心輪上連結了十九個架空的滑車。

工人們對於兵工廠的壁報的貢獻，從技術上的意見變化到政治上犀利上的議論和本埠新聞的摘載。一段是描寫美國新式磨粉的方法。一段是警告夏天必須注意飲食：『不要喫沒有燒熟的食物，不要飲沒有燒開的冷水。』——或者再滑稽地加上一句，『不要貪喫肉。』他們工作一班十個鐘頭，其間有喫飯的時間半點鐘。

我和工廠的指導員。——政治委員——談到工人們下班後的活動。指導員是有幾分介乎效率專家和解罪神父之間的。他們的工作是設計各種打破生產上的難關的方法和聽取工人們的訴苦和建議。工人們被允許，甚至是被要求，加入職工會。至於會員的會費依照他的工資百分之一繳納，其中一半直接到職工會辦事處，一半就用來購置刊物，排演戲劇，等等。工廠給全體工人預備了一間俱樂部。又有一間放着教本的教室。經常地喫完了晚飯，就有教員來上兩點鐘的課。聽講是多少帶有強迫性的，其意義就是使工人們對於那些不願聽講的二流子給與一種巨大的道德的壓力。

在一處紡織合作工場，我發見了明顯的重要的天牛創造力彌補了合宜的機器的缺乏。合作工人臨時所設備的機器構造簡陋，却可以運用。缺乏了長的皮帶拖動線軸機，那些工人就設計一種緊繃的羊毛帶用松香和蜂蠟使變硬變強固，而達到了很可使用的目的。發明的人看了農民把打蠟的羊毛帶用在手搖的紡紗機上就動了這個念頭。當打蠟的羊毛帶大規模地用在工廠的馬達發動的機器上的時候，蠟給速度所產生的熱溶化了；所以他們就加上松香使變硬。

重要的彈簧是用從日寇搶過來的電話線製成的。把電話線放在坭塊裏，用木炭和骸骨燒到攝氏七八百度，受了這種熱力就變硬，變韌了。那個工廠監工臨時把這作成了，非常的驕傲。他指出他的電話線彈簧的優越性，如果從同樣的高度丟下去，他的彈簧跳起來比舶來品還要高。

這個製造廠的動力有兩個來源。第一就一隻遮住眼睛的騾子。騾子駕着一個木製的巨大的齒輪，齒輪配着一套小輪，皮帶，滾軸，和滑車。當騾子繞着圈子走的時候，這個系統就發出足夠的動力運動許多機器。他們告訴我，騾子工作的時間也和人一樣，其間也有下班喫東西的半點鐘。第二個動力的來源是一架大水車。從這水車溢流出來的水就利用來灌溉附近工人們所開闢的菜園。因為這些菜園生產比較工人們消費的還多，所以他們就把餘下來的賣掉，賣價在市價百分之四五十以下，賣得的錢就拿來購買沒有配給的各種食物。

因為當地發行的邊幣被國民政府認為不合法，所以在邊區之外就不准流通。國民黨——特別是參謀總長何應欽——說爲什麼八路軍是非法的，爲什麼不給他們撥軍餉，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邊區政府已經發行不合法的紙幣。何應欽說他可以證明共產黨在一九三八年已經在邊區發行邊幣了。我和延安的財政部長南漢和別由政府負責人討論這一點，他們都堅決地否認何應欽的攻擊的話，『實在，我們開始發行鈔票是在他們對邊區實施經濟軍事的封鎖，對軍隊斷絕兵餉之後，』他們堅持地說。在這之前，還未和國民黨決裂的時候，却也有小票額的鈔票發行流通；可是這些鈔票票面至多不過七角五分，這是小額的找頭缺少的緣故。而且，他們又指出這些鈔票並不是邊區政府作爲國營銀行的鈔票發行的，而是由半官的商業機關，光華貿易公司發行，——而發行又明顯地不是當做紙幣，而是當做代

價券的，很像電車上的代價券。發行的總額從沒有超過法幣一千元，（即美元二十五元，）票面又只是一分至七角五分。直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發生之後，正式的邊幣這才發行，第一次公開發行是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如果何應欽說，存留我們在那個時候以前發行的紙幣，』邊區政府祕書長羅邁說，『那麼這些紙幣必定也分散到這裏的人民手裏，而且還在他們手裏。我們請你做一番仔細的考察，有沒有這種鈔票，你就可以滿意相信；可以回答何應欽。』我照辦，却從未找到一張一九四一年以前發行的鈔票。

那時因為邊幣在邊區以外是不合法的，不通用的，所以不能夠用來購買那些必須從封鎖線後運過來的重要的必需品。然而邊區佔有大後方（延安的人民所稱的國民黨的中國）的兩種重要必需品：食鹽和石油。這兩種出產運出了邊區，被許可自由地通過封鎖線，就在那兒交換布和別的。要經過邊區外的當局認為適合才允許驟運的商人帶回去的東西。說到食鹽，邊區出產的區域是全中國最好的，可是食鹽的生產只限於邊區切身的需要，外加大後方不得不接受的一點。

至於油，在介於延安和黃河之間的延城，邊區政府運用一個不十分大的油田。這是一九〇六年一個日本工程師最初發見，勘測和經營的。他開鑿了四個油井，其中兩個出產油；可是到了一九一〇年，油的產量太少，滿清政府又對他加上種種妨礙，所以他灰心了，就放棄他的計劃。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政府經營了幾年，可是到一九一四年就簽訂合同轉讓給美孚煤油公司經營。他們運到許多鑽井和煉油的設備，又開鑿了五個新的油井。可是當無利可圖證實了的時候，（主要的是缺乏運輸，那裏周圍幾哩都沒有大路或者鐵路，）美孚煤油公司就洗手不幹，留下全部的設備而撤退了。從一九一六

年直到一九三五年紅軍的先鋒隊到來的時候，中國政府拿一半的心機去經營油井，却從沒有做成一種賺錢的生意。

現在共產黨正在努力工作以求油田的發展，他們認為——不管油產以及汽油、火油、蠟燭等副產物的出產證明了怎樣的賠錢——這「外匯」的寶貴的媒介。這種努力，雖然在被封鎖的區域發見了自己通常的標準是不健全的那種狀態之下，仍然可以說是「不經濟的。」行政當局坦白地承認他們沒有一個人真正懂得一點科學的鑽油井的知識。幾個舊時的工人仍然在工作。其中一個叫陳忠夏，他在管理油田，就承認他不是一個油礦工程師，不過是一個在外國人監督之下在油田上做了幾年工作得了一些實際的經驗的人罷了。美孚煤油公司留下的一些鑿井的鋼鑽差不多到有用的界限了。吸上唧筒上的破舊的活塞已經用布和皮包起來防止滲漏。因為缺乏鋼鐵，從河邊採掘出來的石板片就用做油桶的襯裏。事實上，臨時完成和另物代替也是這兒的規律。蒸汽引擎是一九〇六年日本工程師裝置的；美孚煤油公司運來的單位爲了缺少備換的機件已經不能應用了。火油和未經提煉的油裝入了用石灰塗上的竹桶，放在驢騾背上運出油田。用副產物製造的蠟燭，質地非常好，比較重慶或者別處大後方所得到的還好的多。汽油則留來開動二十幾輛行駛延安附近多地的殘破的載重車。

我所接談的工人對於他們工作的酬報似乎都很滿意。幾個在那兒待了許多年的老工人在後來的雇主底下工作，都非常熱心於目前的工作狀況。他們的工作時間縮短了，被人家作爲人類看待了，又有自己的職工會，自己的俱樂部，並且他們對於處理事務也可以說話了。其中有一個會說幾句英語，是一個在新加坡生長的華僑，在他未到延城的油田工作之前，曾經管過多年的水手。「在這裏比較當水

手好的多了，」他回憶地說。在邊區，也像在全中國一樣，生活是困苦的，可是從他的潑意的話，我就聽到希望的聲音——我相信我是聽到自信了。

當然的，當邊區政府主席，白髮老者林祖涵拿一張一九四三年邊區生產全圖給我的時候，他的語氣就合著自信。這裏就是它的真相。全年食糧的消費估計爲一、六二〇、〇〇〇擔，一九四三年全部的生產爲一、八四〇、〇〇〇擔，規定剩餘二二〇、〇〇〇擔——意思就是說，如果公平分配，每一個人所得的就比所需的較多。這食物的生產可能這樣分派：小米二四、五%；小麥二一、五%；黃小米一四%；豆一一、二%；蕎麥七、一%；高粱六、四%；亞麻五、一%；苞米三、七%；馬鈴薯三、二%；棉花一、四%；蔬菜二、二%以及各種零星的穀物。

食鹽的生產——據說是邊區出口的第一位——在一九四三年達到六〇〇、〇〇〇隻牲口所載的數量。這是由合作社運輸的。合作社增加運輸所用的牲口的數量當一九四二年的十倍。別的事業，諸如畜牧、工藝、和工業，也有顯明的進步。從事紡織的婦女有一三七、六〇〇人以上，大多數加入紡織合作社。每個工廠的生產比較一九四二年都增加了一〇〇%至四〇〇%，而成本却減少了二〇%到三〇%。

「甚至道士、瞎子、和老婦，」林祖涵說，「也被捲入這生產的浪潮中了。清康廟的一個道士，名字叫張鳳鳴，看到人們都熱烈地開闢荒地，他也激動了，就剪掉了他的道士的辮子，變爲一個莊稼人。在慶陽縣，一個五十七歲的瞎子硬要他的孫子每天領他到田裏去，也能夠開墾耕種四畝半的荒地。在志丹縣，有一個老婦當秋收的時候，每天早上雞一啼她就起身，叫醒了鄰居們和她一道到田裏

去，天剛剛才亮。這些例子在中國各處，或者真的在世界，是很難找到的。

林祖涵以爲這種熱心是由於人民獲得了奮力的領導和鼓勵。這是黨和政府給與他們的。第一、政府抑低地租使得佃農的負擔減輕，又鼓舞他們更加勤勞工作使得他們可以就他們的交易日子，而地主減少了的地租也可以得到擔保。還有，政府把錢貸與農民使得他們可以購買耕牛以及更好的農具。政府爲了獎勵種植棉花，就豁免棉產的稅三年，并且收受棉花作爲來年徵收穀產的稅。

邊區的人力經過了一個優待入境難民的政策就增加了。幾千幾萬的河南飢民都受了這政策的吸引。他們領到田地，受到協助，成爲自給自足的生產者。變工隊的制度可以增加生產的效率，就大受提倡。邊區的農業勞動者三三八、七六〇人中已經有二四％自願地組成變工隊，到一九四四年底這個數字大概可以希望加倍起來。

可是生產運動的紀錄中，最重要可發展還是軍隊，政府，和黨的工作人員的參加。在邊區的經濟上這些人通常地都是寄生份子；但是現在他們已經生產了他們自己的衣食六四％，并且快要達到完全的自給自足了，人民納的負擔也已經相對地減輕了。

『軍隊的生產紀錄』林祖涵說，『是神奇難測的。人們說，「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支軍隊像我們的八路軍一樣，能夠戰鬥，能夠生產，能夠和人民和諧地相處，」這是不可以思議的事麼？在生產上就和在戰鬥上一樣，我們的軍隊是熱心的，充滿創造力的。在去年春天的整荒時期中，他們天一亮就到山上，一直待到天黑，除了喫飯一點點時候之外，他們休息一霎時也都不肯。這樣就逼到他們的指揮官只好定下新的規則，在規定的時間之前，就開始工作或者在一定的時間之外繼續工作都是禁止。

的。

「并且還不止這樣。指揮官自己就和他的部隊一樣地工作。去年的種植季，團長陳中耀右手受了很厲害的傷；還是把工作堅持到底，過了一季。政治委員車濟，在作戰的時候去掉一隻右手，不能夠拿耕犁，就給那些在田裏耕種的戰士們燒開水。我們的軍隊的確是一支足以驕傲的軍隊，是中國人民真正的子弟。」

## 第十章 醫藥與巫術

在延安大學一千三百多個學生中，大多數是結了婚。但學校規則是不允許夫婦倆住在一塊兒，除非是每星期六晚上，到那時候，學校當局總將特設的「洞房」供他們利用。

「把他們在一星期內分隔開，不僅減少他們的分心，使男女雙方的學業更能進步，同時還可以增長夫婦間的愛侶，」該校校長周揚對我說，但當我對學生們問起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不願加以討論。

孩子們同他們的母親一起住在女生宿舍裏，她們組成工作交換隊，分組輪流照顧孩子們。這樣一切似乎都解決得很滿意，而且任何人都覺得很開心。女生們都明顯地覺得她們有她們的蛋糕可以吃——這就是說，她們可以有丈夫和家庭，同時仍可以受教育。他們在延安（延安大學的通常名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實際的學問，所以就西洋人的觀點說，延安，大像一個大學。

「我們新教育計劃的主要特點，」周揚解釋道，「是完全建築在實際應用上面。去年以前我們模倣西洋學府來定我們的課程，過於注重古典文學，哲學，及各種抽象之科學。我們太注意文學上及藝術上的外國形式，而忽視了中國自己的形式。結果，從延安畢業出去的學生並不適合於戰時環境中的基本需要了。」

「現在我們的學生在一年中至少有三個月功夫在實習上——相等於你們的實驗室工作。一個讀銀行系的學生到銀行中去工作，一個法系的學生同法庭去接觸，一個學科學技術的能夠在工廠中得適宜的經驗，一個讀政治系的學生可以被政府機關所雇用。」

學生也參加生產運動。去年他們曾經耕種與。割他們自己的小麥，玉蜀黍，和蔬菜田，同時養蠶家畜，這樣在食糧中差不多已有百分之六十已能自給了。

和延大相連的是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魯藝大約有三百個研究音樂和戲劇的學生，它佔據了離城約三哩的一所荒廢的教堂。這教堂平常當作學生聚會，公演的大廳，四座以前住歸化了的教民的房子已改為宿舍。男女學生多半來自前線各區。二年之後，他們仍將送回各戰線去組織劇團歌詠隊及其他。男女裝束大致相同，穿着不講究的褲子，在上衣外面束根皮帶。他們彼此間的興味，似乎局限於學習上熱誠合作的需要。

這是一個瘋狂的場合。當大鼓大鼓特鼓的當兒，一個女高音在練習音階。在數碼以外，有一個極伶俐的學生毫不被紛擾似地大奏其提琴。在一間宿舍裏，有一個河南少女用健康的聲音高唱秧歌，伴奏着一打她的朋友們的胡琴。在院子裏，又有三則劇本正在排演——那些戰時劇本，它簡單的情節是根據真實的故事如英雄事業或者日本人的殘忍行為。他們是單純但有力地敘述出來，用着農夫與兵士都懂的言語敘述着，爲了農夫與兵士他們總創作，也爲了農夫與兵士他們總表演。將來，這羣學生要分團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去表演，爲着老百姓——那些農夫們。

我出席過一次魯藝音樂系主任辦的音樂會。七隻土製的梵鐘鈴，一隻已破損的鋼琴及一隻大提琴，

節目開始時，演奏中，美、英、蘇四國國歌。七十五個男女同學組成的合唱隊登台，非常出色地表演巧斯泰考維基的聯合國之歌。接着以和諧與極情感的聲音唱英、美、蘇等歌曲。當男高音試唱蝴蝶夫人之一節時，和鋼琴調子配得不勻；有好幾個獨唱者極慎重地希望合調地唱西洋曲子，慘遭失敗了。但是合唱隊始終如一地堅持下去，尤其在唱近代的戰歌，新近著成的黃河船夫曲時。那天晚上成就應歸於二個用陝西話唱本地民歌的人，陝西話與國語、廣東話不大相同，好比愛爾蘭土語與英語之差。

共產黨員極端注重他們的文化。藝術家，創作家，音樂家，教育家，戲劇家，及新聞記者經常開會直率地討論他們的問題，批評彼此及所作的工作。我出席的一次至少有四十個人在場。其中大部份人是從上海來的，那裏在戰前是中國文化中心。但上海歐化的和有雜質的文學與這中國腹地的農民文學顯然不同，好比黛姆士瓊司 (Teresa Tsoo) 與孔夫子不同。在戰爭狀態之下那般文人離開上海的時候好像魚離開了水。要看不看輕那些距離很開的農夫，工人，兵士簡直是不可能的。毫不普遍地他們為他們自己而創作，而繪畫，而作曲，假使農民不能讚賞好的文學與藝術，這是他的不幸。藝術是不可以爲了要和大眾去講話而貶低身份的。

有遠見的毛澤東觀察到這種情形，並認爲這是不好的。召集所有文化工作者開會，他剝去他們自尊自大的態度，警告他們假使再如此下去便是退步和落後。他們必須使他們適合新的狀態，一個新的社會——這社會不像封建的上海貴族化社會有文化人，學生，有錢的商人，而且一個由於農夫，工人，兵士建築成的新民主的社會。

「因爲如此，你們必須深入民間，在你希望他們了解你之前，你先強制自己去了解他們，」他繼續說。「你們應該學習他們的語言作爲表演的媒介，你們應該學習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地方風俗習慣去做內容。你們應該學習愛他們像他們存在的樣子，而不是像你們所想像中的樣子。」

現在是戰時，他指出，文化工作者的責任是把他的天才貢獻給爲戰爭而努力。正因爲如此，他不應該介紹新奇的外來的表現形式，他必須做老百姓自己能夠接受的熟悉的形式。應該把人民傳統的音樂，藝術，文字和戲劇當做基本的形式而注入新的戰時的內容。新的形式必須以此爲基礎，從此地發揚出來。

延安的文化人牢牢的記住毛澤東的話，得到了可驚的結果，秧歌的發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秧歌——即農歌——是中國北方的山歌，尤其在山西陝西二省。它發源於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傳統的表現秧歌主要是在新年及各種節日；雖然也不一定限於假期，常常爲任何重大的慶祝事件而表演。用他們的高音唱出活潑的調子，村民們圍成一圈以有力的康加舞似的步伐跳舞。最近的秧歌略有更變。例如一九四三年一月，差不多每一個鄉村都同時表現秧歌，慶祝治外法權的取銷和斯達林格勒大勝。藝術家，音樂家和戲劇家寫了一點小品文，簡譜和裝飾的藝術品，那些，使他們大吃一驚，老百姓很快的編入他們的秧歌中了。從此以後，秧歌發展成今日各種各樣的形式了。今天，一隻秧歌的連續以它的形態歌唱可以單獨編成一個歌劇或音樂喜劇或情節發展的劇本。

我曾經看過許許多多的秧歌劇，它們永不使我不被迷惑。它們與在中國各地所能看到的東西完全不同。他們大多數採取戰爭的題材：一個鄉村好細的故事，一個兵士妻子的英雄行爲，日本人在俘虜

營中殘忍行爲。這很需要一番努力使我能夠慣於傾聽詩句，但是戲劇的表演技巧一剎那就可以把我抓住。所以，們可以在任何小的村落裏表現，劇情寫好後，演員可以不必有一點點舞台效果就能訓練好。除戰爭的題材外，也有關於本地各種問題的——特別是關於共產黨打算着手進行的新的設施。譬如衛生法，小孩保護法，飼養家畜法，滾筒收割法等新式的辦法衝破根深蒂固的傳統與迷信。這些鬥爭便是秧歌題材的豐富來源。

例如，我看過的一隻秧歌是打擊「巫醫」即「巫師」的。第一幕開幕出現一個年輕的女子，這個家庭的媳婦，在紡車面前坐下。做阿婆的跑進來，大罵這個女孩子，因為她喝了井裏汲上來的冷水。（最初宣傳：只有沸過的水可以喝。）女孩子承認她喝了沒有沸過的水是錯的，繼續紡紗。於是她生起病來了，開始嘔吐，她的翁姑倆將她扶到床上後，燒香求佛，兒子從田裏回來，看到病着的妻子仍在繼續嘔吐，顯出非常焦急。

「讓我到鄉村醫院中請公醫來，」他提議。但是立刻受到他的爸爸媽媽的反對：「不，到巫師那兒去。」「他是一個老騙子，」新思想的兒子說。他們回答道：「但是他和本地人接近已有十七個年頭了，他識得我們和我們的疾病的性格，比那備有新奇的念頭的醫生好得多了。」這個兒子極勉強地同意去請巫師。

第二幕佈置是巫師的家中。他的容貌好似一個年老的流浪者。他唱着他的歌：「開墾的工作多無聊！無論他們給我如何愉快去加入生產運動，我用不着去參加。只要人們還相信我能夠驅鬼逐怪，我便能活得好。」

他喝口茶繼續念道：「我剛才聽到，鄰村我的屍事殺死了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笨東西！他在破壞這行業。」

少年走進來。巫師很明顯地略有震動，他請巫師去替他的妻子診治。巫師含糊地搖搖頭：「我是一個非常忙的人。但是你的爸爸是我的位老朋友。」因這個緣故，他同意和少年一塊兒動身。「事情大有苗頭，」他旁白了一句，引起聽眾大笑。

下一幕演出二位老人家正越弄越發愁，因為女孩子繼續嘔吐着，正在這時，兒子與巫師一同登場。巫師道貌岸然地坐下。

「嘎，嘎，我曉得了，」當他們說給他聽女孩子的症候時，他裝腔作勢地說。「他犯這道——這道毛病。是犯在她的血液中。討厭！」

他從一個麻布袋中拉出他的巫術用具來，放在桌子上。聽眾們大笑——他們從前曾經看到這些東西。巫師脫去上衣，披上他的紅色袈裟。覆了一頂黑色的有紙做的裝飾品的頭巾到頭上。那末他拿起一支發響的三股叉開始有點像印度戰爭舞般的舞起來，還不時向着地板做神祕的動作。當他發狂似他動作時，全家都驚異地注視着他。每當女孩嘔吐出來時，他加快速度。最後他到隔壁去看病人，刺耳地搖動他的三股叉。

一回兒，他走回來，確定那面房間的窗門方向不行。「將她帶到這裏來！」家屬照辦了，女孩子躺在粗糙的床上抬出來。巫師將她的手指縛在與三股叉相連的繩子上。他向着魔鬼喝道：「滾出去，滾出去！滾出去！」女孩痛苦地呻吟。「不行！」他喃喃道：「不行！這些鬼兇惡地捉弄她。它們是

非常，非常厲害。我還沒有把握能否戰勝它們，把它們從她的身上趕出去。」這一家人求他用全力應付；如果不幸他失敗了她死了的話，他們也不會責怪他的。那個女孩子說：「媽，請他出去吧。在他未來之前我真的覺得好一點兒。」關於這句話，巫師大喝道：「這是魔鬼在講話。他們要馬上害死她。」說着搖動三股叉，瘋也似的對魔鬼念咒語。又拿出一條繩子開始來縛住她。「滾出去！從這兒滾出去！」女孩子昏厥了，他解了縛。

「要是她死了，我找你算賬，」那個兒子警告他，衝出去找公立村醫院醫生。

聽衆們開始大聲叫喊。「趕他出去，打死他！」他們的喊聲介乎呼叫與責罵。

同時在繯床三周以後，巫師宣稱，「她在三天之內就會好起來。」

他很快地開始包裝巫醫用具，藏好診費八千元，外加玉蜀黍一袋，印花絲織品一塊，預備在醫士到來之前離開。

正當巫師要離開時，那兒子和醫生及村長進來了。當醫生走向病人時，其餘的人便攔住了巫師。迅速地按了脈，和看了她的眼球。聽衆們默默地驚奇地注視他。他們直覺地呆看着，當他向她的手臂進行皮下注射時。

那兒子再也耐不住了。「這是什麼？她還活着嗎？」

醫生微笑道：「並不嚴重，雖然你叫我馬上來。她只不過懷了孕——三個月了。」

「懷了孕！」他們全都驚奇地注視他。他只按了一下怎麼能夠知道的呢？醫生馬上解釋她的症候。「她一定是喝了一些冷水或其他東西，使得她難受和嘔吐。」

「對啦，她告訴我她喝過了冷水，」那母親喊道。

那個少女恢復了知覺。「噢，我覺得爽快一點了，」她說：「但是我的手指好痛啊！」它們剛纔被巫師的繩子勒過。醫生給她敷了一些碘酒，吩咐把她移到另外房間內去休息。

現在他們開始對付巫師，稱他爲懶惰的毫無用處的流氓。他佯作忠誠地辯道：「我是受神靈之命替百姓驅魔逐鬼的。」

「噢，噢，受神靈之命，你嗎？你怎麼能夠驅魔逐鬼呢？」

「我捉住它們。」

「你捉住它們，唔？」（聽衆們大笑）「正要問你如何捉法？」

巫師看起來很不安。「他們攔住我的袖頭，那末——那末，我捉牢它們。」

「好的，你現在走到前面，使使你的法術，給我看看你如何捉魔鬼。」

「我——我——沒有時間啊。我要馬上回去照料田去。」

「現在先別爲你的田着急；你得走到前面，給我們看看你如何捉魔鬼。」

巫師勉強地打開他的用具，開始他的表演。所有的人都冷笑了，聽衆大聲呼叫。最後，他停止了。抓抓他的鄉村氣的頭咕嚕着說：「幹嗎要繼續下去？你們和我一樣明白根本——沒有魔鬼。讓我跑吧，我答應放棄巫術不幹了。」

大家忽然聽到這句話，出於他的意外，並不發怒，反而願意幫忙他改行。他們願意借給他耕具，幫忙他去替他的田掘土。那個兒子情願做他進入本地工作交換隊的保證人。

這樣，戲劇便在歌舞聲中閉幕。另一個年老的巫師登台作一簡短之演說：這幕戲是根據他自己的經歷；在他改行以時候，他曾經將他的用具——即我們在戲中所看到的用具，供獻給政府做展覽。他非常願意和任何希望更知道一點關於巫醫與庸醫的人談話。

有一點理由，我想值得把這個劇本的情節告訴出來。第一，這是一個例子說明共產黨的文化工作者怎樣應用秧歌，其傳統價值是仍被保留着，如所有說白是用詩歌體的，每一行都是應用七拍子節奏唱出來的，不是講出來的。第二點理由是對於迷信的問題他給予一個良好的觀念。

同時，發源農村原始的秧歌叫做「活報」，一種特別形式的秧歌劇，其歷史還不到一年。從其名辭想像起來，它有一種可以傳達的消息。他和長春的裝着假聲音的，誇大地對語的，拘泥定型的，中國戲劇完全不同。共產黨的活報是活潑的，真實的，把本日的消息很通俗地描述給不識字的人們，去增廣他們的見識，使得他們認識更大的世界，在其中環境使他們有整個部份。同樣的，活報可以與我們普遍的無線電報告相比，譬如「時間行進」(The March of Time)或「復活節狂熱」(Easter Frenz)。演奏是公開的，不用舞台和只有很少的導具。極多輕鬆活潑含有幽默性的說白，它們真是像一個時髦的觀察者。一個中西樂器混合成的樂隊伴奏着，很巧妙地應用於加強語氣和提高戲劇性。活報的表演往往帶有宣傳性的，但特別宣傳關於鼓勵民衆自動抵抗日本。例如題目爲「第一戰場」的活報演出時，正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在法國登陸後的第三天，開幕時東條揮動着血淋淋的大刀，在台上，他躊躇不決地要想去安慰小丑似的正在悲傷在俄國打敗仗的希特勒。希特勒關於如此迅速的在法國開關第二戰場很覺煩惱。

「幫助我，進攻西伯利亞，希特勒哭着請求。」

「我希望我能夠——但是要確保太平洋上美國跳板的諸島嶼已經夠使我頭痛了，」東條回答。（聽眾們喜叫與嘲笑著）「但是這裏有一件祕密武器給你，」他把一束黃色的紙給希特勒看，上畫玄妙的記號。當他含糊地對它念奇妙的迷信的咒語時希特勒愚蠢地望著他。「現在你用不到怕美國人與英國人了，」他確定地對希特勒說一面收起那些紙。

「那末，爲什麼，」希特勒問道，「爲什麼你沒有應用這東西在太平洋對付美國人與英國人呢？」

「哦——這東西不能夠在海上對付敵人，」東條口吃地說，跛子似的下場。

郭培爾用綑帶包紮着傷足蹣跚而入。希特勒命令他大吹法螺地去發宣傳，要嚇得艾森豪威爾放棄登陸。郭培爾可笑地狐疑着，無可否認他對付俄國的失敗。

在第二幕，五個面色頹喪的掛着大形廣告板的廣告司出現了，他們念着，「無敵的大西洋鐵壁，」於是希特勒向他們發表一篇著名的演說，其中郭培爾也說了幾句。（這種詞都是以秧歌的格式，寫成有規律的詩句，用簡單的音調唱出。）

戰鼓冬冬，大戰開始。不用絲毫導具，演員們極真實地描寫着登陸戰的每一場面。最初，海軍發砲轟擊，一羣水手排成橢圓形，設想在一艘戰艦的周圍，在裏面，一隊隊的水兵伸着手臂代表大形的炮台。又有小的橢圓形，代表登陸艇——以水手的跳動表示彈程，向着埋伏着機關槍想像中的海岸。我不再打算描述各種各樣無數的登陸時值得注意的姿勢，但我必須指出，這種種都是近幾天來無線電廣播中抽象出來的。演員們根本沒有機會看到關於這種戰爭場面的照片，或甚至各地的雜誌。

接着，戴着皮帽子（空軍）的人很快地跑着，手臂都向外伸開。他們環繞着以兩堆尺來代表的佩克

斯和克恩二個城市走禮與分開的角度很像戰鬥機羣。他們的後面跟着炸彈——三個人排成一三角型，第四個平睡在他們的肩上，兩手舞動如一推進樣。

艾森豪威爾出現了——細長的，面色蒼白的。有人說他像這種相貌，但是在邊區沒有一張他的照片可供利用。艾森豪威爾領導着各有計劃的攻擊，衝向顫抖的「無敵的大西洋鐵壁」，在後面希特勒和郭培爾在發抖。最後，鐵壁在一陣更響亮的戰鼓聲中崩潰了，希特勒和郭培爾逃走，佩克斯和克恩被佔領了。

結束時，是勝利的慶祝會，五十餘健壯的少壯圍成圈子唱巧斯泰考斯基的聯合國之歌，同時圍着中、美、英、蘇四面大國旗跳舞。各個插旗子的姑娘打扮成各國的樣子，西洋孩子的習俗——美國的，英國的和俄國的——特點是胸前填得很滿；他們同時裝上人工的鼻子，這是他們在演戲時，最明顯地指示是在扮歐洲人。

秧歌劇和活報的表現並無一規定。但星期六晚上的跳舞——現代化跳舞——是一個社會性的事件，差不多每人都參加的，缺乏有擦亮的地板的舞廳，也沒有伴奏的樂隊，星期六晚上的情形是多半含有田園意味的舞蹈。

陸軍總司令部的蘋果園中所開的一次，可作星期六晚上跳舞會的典型。溫和的光線從掛在樹枝上盞着紅、藍、綠、黃的紙罩的臘燭或可愛的燈上照耀在平坦的舞場地板上。當然，這不是一個良好呵舞場地板；但因爲每個男子，女子，小孩子都拿着布做的拖鞋或繩子結的草鞋，沒有一個會注意它的。女孩子都著寬大的褲子，束着根帶子，在前線生活着穿裙子是不方便的。更進一步，爲了表示婦

女地位的由解放，女孩子隨時可以選擇她的舞伴；這是絲毫沒有豫猶和拘泥的。樂隊是由於奇怪的成份組成，中國古代四絃琴，新式的梵啞鈴，口琴，土製的五絃琴，廣東的古老樂器，樂鑼，及像教堂中用的腳踏風琴。音樂嗎？他們演奏着動人的中國民謠，法蘭西舞曲，維也納的華爾斯如藍色多瑙河。有時樂隊真的演奏出熱烈的和最近的——(Jingle bells)或(Yankee Loodle)——敬他們的外國客人。別以為他們是會喫力的。他們跳着狐步舞，華爾斯，及每一步隨着樂隊演奏有各種變化的舞。他們全部都顯得很卓越。

在任何一夜，你可以見到頭髮蓬鬆，着襯衫的毛澤東，這個共產黨保護下九千萬人民的領袖，同一個延安大學伶俐的學生跳快步舞，那時候，一個推小車車夫可以與朱德夫人同舞。朱德自己，五十萬抗日軍隊的總司令，看起來像一個管牧場的老爺子，也抽出時間與一個年輕愉快的只有他一半長和三分之一年齡的小姑娘跳舞。有傷痕的林彪，聶榮臻，葉劍英及一打以上其他將軍——他們每個人都使日本沮喪的軍隊損失整個戰區——可以見到迴轉得像跳跳蹦蹦的大學生一樣。

我並不關心樂隊演奏的是什麼。沒有一個人會化許多功夫去注意，它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時間與良好的旋律。當樂隊奏出「普遍的」曲子時，他掘發了他的演奏節目，演奏從麗娃麗姐，阿德，卡門等節錄出來的曲子，爵士化之後成爲可以跳舞的段片。

隨便在什麼時候，他們奏着秧歌的調子時，任何人都會參加加舞的圈子，作一個活潑的緩慢的動作。秧歌的調子是如此動人，我敢說在蘋果園舞場外面繫着的一羣馬，也不禁發出長鳴來參加每個人都唱着的合唱隊了。

## 第十一章 鄉村民主

在一個離開延安步行須兩小時路程的小村莊中，過去曾舉行一次選舉，在這次選舉裏面，推選出當地參政會的代表。選舉委員會委員十一人坐在那兒清查選民的資格。委員會中包括一個富農，一個中農，三個貧農，兩個僱工，三個婦女，一個小學教師。

在六百二十個名字揭示在佈告板上的未來選民中，只有三人宣告不合格。這三人當中，一個是精神不健全者，其他兩人則尚沒有到規定的最低選舉年齡——十八歲。

候選人一個一個地立起來說明他們的政見。這當中有一個人說，他主張立即實現毛澤東最近所宣佈的十一項目標。那一綱領要點如下：一、每一個家庭須有一年的存糧以防年歲的不豐。二、每一村莊須有一架紡織機器。三、每一村莊須有一名鐵工。四、每一鄉須有一人民開辦的日校與夜校，一個研究漢字的團體，一個讀新聞團，一個壁報團，和一個秧歌劇團。五、每一個人應該努力識上一千個漢字。六、在每一個分區，應有一所醫藥合作社，在每一縣應該有一個醫生，在每一村莊，應該有一產婆。七、每一縣應有一個積穀倉，由鄉民共同協力積貯穀物。八、每一縣應有一販賣商（販賣每天的必需品）。九、每一個家庭須有牛一頭，與豬至少一隻。十、每一家庭應種樹百株，並須當心培植牠們。十一、每一村莊須有井一口，與每一家庭須有一個廁所。

第二候選人聲稱他同意毛澤東主席的十一項綱領，應加以一致擁護，並且認為他們應立即實行，完成其中某些事項。他們應該向延安縣政府報告，他們準備爲掘井，爲建築校舍，爲積穀倉而開墾荒地，及其他等等而貢獻他們的勞力。

第三個候選人同意前兩人的政綱，但附加聲明，他認爲他的同村人應該對教育特加注意。這是一個他們生存在裏面的新世界——一個伸達於他們的小村莊界限以外的世界，他們的子孫應該準備起來負更大的責任。

其他的候選人各表示他們的政見。我聽着他們，獲得了這樣的感想，就是他們有意做成了這些事中的某一件事。可是這對於老一輩的人一定感到有些奇特；他們還記憶着過去的實際受人奴役的日子。他們大部分坐在那兒，多皺紋的面上帶着被動的表情。然而我也能從他們的面上看出他們的思想：那就是對普通人民幸福感到關切的一個政府，表示惶惑，不相信與感激的混合情感。

關於這一選舉並沒特殊之處；牠正像全華北華中那些參加十五個抗日民主根據地九千萬受八路軍及新四軍保護下的大眾一樣。甚至在所謂淪陷區中，人民也在舉行選舉，大部分是在秘密狀態中，很多次是十分公開地，有幾次簡直是在日軍碉堡的步鎗射擊中。

爲觀察這種共產黨領導的民主行動，記者曾參加過一次邊區政府與邊區參政會常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所有二十四個與會的參政員，由民衆選舉產生，其中包括八個共產黨參政員。最年青的一人是三十一歲，最年老的一人是八十一歲。由於邊區政府主席林祖涵那時任共產黨代表赴重慶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商談解決政治糾紛，由一個非共產黨的副主席李廷民（Li Ting-min）任主席。出席的參政

員包括一個農民，一個商人，一個大地主，一個佃農，一個智識階級，一個教育家，一個醫生，一個軍官，一個文化工作者，一個店伙計，和一個回教徒。

這會議是在多縫隙而屋頂很高的政府大會堂中舉行的。麻雀在頂頂上粗大而未經鉋削的椽子上做的窠巢的四周，喧鬧地喳喳叫着。在粉刷潔白了的磚牆上，勞工階級的英雄傑片目光，視着下面頭刺光了的幾批有大鬍子的立法委員。巨大十五英尺的毛澤東與朱德的畫像，立於大會堂舞台的兩側，而在另一方面的上面，小的聯合國的國旗從大會堂的一角通往另一角懸掛着，以資點綴。

只有少數的旁觀人在旁聽着開會。參政員坐在大堂近舞台的較小的末尾的桌上，在這旁邊，有幾條粗製的長凳臨時移來。那是一個溫暖的日子，大多數的參政員穿着他們的短衫，雖則每一仍戴着翻耳的藍色帽，這種帽子差不多是邊區每一個人都戴着的。即使沒有牙齒年老的李廷民也戴着他的這種帽子，當他宣佈開會報告全世界軍事現狀的時候，和一個小磁茶壺的嘴上，啜着茶。他的結論是：「雖則我們的盟邦在其他地方獲得勝利，可是我們不應等待他們的援助，而應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和日本作戰」。他指出了當時在華中華南挫敗，是由於重慶政府的軍隊沒有獲得了人民的支持。他要國民政府把五十萬封鎖邊區的精銳部隊調開，派他們到華中華北去採取對日行動。「不但此也，我們的軍隊，也要能讓他們，機會，駢肩對日作戰」，他附帶地說。

劉百齊 (Lai Hoi Chi) 早期革命時代的年青煽動家劉子丹的父親，立起來坦白無隱地吐露出他的造林進行的計劃。他指出政府未能與農民合作。後來在他們的方面盡了他們植樹的責任，但他們需要種樹專家指導他們怎樣當心樹的培植。隨後他開始對樹的病害防治技術，提供了幾個建議。

他巨山 (Ho Chuan-san) 一個非共產黨的教育家，提議改進學校制度，提供了好多實施的意見。他建議爲遼陞森林地的鄉村農民設立流動學校，規定許多教師在好多村莊中每天巡迴一次。在農忙季中，教師們甚至要直接到在田間工作的學生那裏去，以便農民一方面可繼續工作，一方面可讀書。一塊小黑板，上面寫着幾個生字，應該放在每一畝田的田頭，以便在學習中的農夫，當他工作的時候，學習牠們。在這個提議之後不久，我碰巧看到這樣的黑板設立在好多村莊上，證明這位參政員的建議並不是信口開河而已。

短小精悍的馬玉祥 (Ma Yu Chuan) 發言，主張對前線士兵的無依無靠的家族，應加體卹。應盡量做到使這些家族自足自給，不獨因爲這可以減輕政府的負擔，並且因爲這也可以提高他們的自尊心。他因此主張土農具及種籽應該送給這些家族中有能力耕種的分子。

畢光道 (Pi Kiuwang Tao) 一個非共產黨的醫生，主張產生一個更精詳的衛生計劃，施行於落後的村莊中。他要求採取有效的步驟，把人民從術士與巫醫的懷抱中吸引過來。需要訓練更多的西醫，以減除嬰孩的死亡率，這許多嬰孩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未滿一歲即行死亡。

高松章 (Kao Szy-Chang) 一個商人與前國民黨保安處長，討論着當前的政治問題。他用着諷刺的語調讀着委員長說：『蔣介石，你並不是這樣的一個壞傢伙，但毛病是你固執的和不肯聽信別的人。得注意的，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一切愛國者應該聯合起來造成一個富強的中國。我們要出全力幫助你，如果你願走上民主與統一的道路，你那時也確無疑變爲世界上四大領袖之一。同時讓我們來停止我們間的爭執，趕快去打我們共同的敵人吧』。

在短時間的中間休息中，有一個人拿出了一疊捲邊的紙牌，在會議桌上玩着「延安撲克」（這一種撲克戲是橋牌與魯梅（Nummy）戲的混合打法）。

在休息後，前在民政府監察院任職而現被列爲代表國民黨的一分子的喬松山（Chiao Sung Shan），起來發言，對於邊區政府的司法現行制度，加以詳盡地檢討與批評。他指出了訴訟的缺點與其改進的辦法。第一，審判官應該直接到訴訟的村莊中的那些鄰人與父老那裏去，或在任何案子發生的地方去。這樣，他不獨能搜集到親自閱歷到的證據，並且節省時間，這樣可使受檢舉的農夫仍能從事於田間的耕作。更應對法院外的調解，加以鼓勵。這一方法，在民事與大部分刑事上，能有滿意結果，惟對於叛國與反動的案件，或爲例外。他力主會由關中分區專員馬錫武（Ma Hsi Wu）所創始的調解，應使他更大衆化。馬錫武會爲了他的辦理民刑的案子敏捷迅速而出名於邊區，他不浪費時間，而直接去尋找出糾紛的來源，爲覓取解決的辦法，他借助於當地受人尊敬的人士。封捧兒一案，就是最適當的好例子。封捧兒一個樸素的少女，和張波兒訂了婚約。女孩子的父親認爲張波兒太窮，相信他能從他心目中預定另一個女婿得到更多的禮金，但張波兒的父親由於和女孩子的父親早訂婚約，召集了一批鄉鄰親友，在一天深夜，却來了那個女孩子，把她和他的兒子結婚。女孩子的父親到地方法院去控告，法院判決婚姻無效，並將張波兒的父親判決監禁六月。

不過這件案子引起了鄉村社會與論大嘩，馬錫武被請求出來解決這個問題。爲便於獲得正統的法律觀點起見，他首先和地方官吏討論。隨後他和鄰舍與親友會商。最後他詢問女孩子願嫁給他父親所選擇的富人呢，還是嫁給張波兒，那個他的父親會爲了搶劫她而判了罪的人。她回答道，即使叫她

死，她也要嫁給張波兒。

馬錫武於是召開了一次公開審判，由全鄉村的人參加，由這些人來權充審判官與陪審人。隨後被發現出來，女孩子的父親會一再地把女孩子賣給這個求婚人，又賣給那個求婚人，繼續不斷地攫取禮金。不過女孩子對這一切一無所知，堅持嫁給她父親第一次替她選擇的男人，這一個男人她說她真地愛着他的。

鄉村上人一致判決老封一再賣女兒，犯了國家的婚姻法律，因此應該懲辦。不但此也，男孩子的父親老張，搶劫女人，同樣犯了擾亂社會秩序罪，他也應受懲辦。男女孩子根據自願結婚的法律，應讓其結合。

喬松山下最後結論說：「馬錫武那種大眾自己密切有關的幸福與生活，應該依賴羣衆自身的主張，甚至是比法律還要『得公平正確的』。也許在他的心中早已存在着俗語所說的觀點：『三個臭皮匠，及得上一個諸葛亮，』——這是一個原則，共產黨想建立於他們的司法實施制度上的。」

## 第十二章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

共產黨控制區中，沒有戰俘的集中營。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共產黨宣佈他們「不殺俘虜，而顧及他們優待待遇，並釋放那些願意回到他們隊伍的人」。在自戰爭開始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為止的二千四百〇七個日本逃軍與俘虜中，除開三百二十二入自願留下以外，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他們的部隊，或者回到了淪陷區的中國。在那兒他們或是做着地下工作，或甚至用了假造的證件回到了日本。那些留着的三百二十二個人，享受着完全的個人自由，並且都是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會員。這一組織有着他的總部在一羣設備完全的可以避彈的窖洞中，這些窖洞，是高高地在延安城中心的岩石面上。雖則同盟須依賴於八路軍的物質接濟，然而牠却完全是一個獨立組織，牠的指導員是岡野進及野坂參貳的化名，爲著名的日本共產黨及革命家，經過了多年的在華北的祕密工作，剛在最近才抵達了延安。

這一退出戰場日本士兵的團體的目標是在毀滅日本軍國主義與在他們的本國建立民主政治。不少的人已爲了進入日軍的前線實行引起騷動與叛變的宣傳而犧牲了性命。他們獲得如何成功，可由過去一年逃兵人數增加來證明，這些人說及日本士兵中在討論着同盟的活動。

在一九四四年的上半年，曾用日文，印了超過百萬以上的傳單，小冊子及報紙，分發於那些分散

於全華北的幾千個日軍碉堡及堅強的據點的門戶的前面。關於這些小冊頁中，曾無什麼描象的東西。他們討論着日本士兵的個人問題——他們的食糧，他們的待遇，他們的讀物與新聞的供給等——以及日本軍人生活中，特有的無禮貌等。

舉例來說，在河北中部，一位中隊的指揮以打人耳光出名——這對一個日本人是一件有辱尊嚴的事。在前線的解放同盟工作人員聽到了這一件事，用傳單神祕地散發於他的崗位前向他提出了個人警告。從此以後，他不再打人耳光。複寫的新聞紙載着用短波無線電收自舊金山與倫敦，美聯社與路透社用莫爾斯電碼 (Morse code) 發出的新聞廣播，差不多每天在日本駐軍的碉堡前傳遞着。對於日本同盟社勝利消息特別加以注意，指出牠的欺騙性。

在每年三四次的日本節日，繪有彩色的十二英寸見方的慰勞袋成干地在日本的雄厚的駐軍中分發着。這些袋中藏着簡單的珍美食物，如花生，無花果，糖及日本小說的翻印品，紙牌，和偶然有一些中國的米酒等。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日本士兵總有回敬禮物送來，有時是最近自日本寄來的報紙雜誌，有時是日本香煙和啤酒或他種酒。

日本軍官，深知了這種親善的沮喪士氣的影響，竭力設法阻止牠，時常把他們的兵士移來移去。所幸這一辦法，却是對解放同盟會員有利之舉，他們由此可以找到新的資料以為參考，而可不需要他們自己方面時常移動。通過信札往來的關係，即可與在堅強據點的個別會員，獲得相互間的聯絡。從情報工作人員方面，日本巡邏馬隊的地址即可得着，在同一地區的一個解放同盟的會員，就要寫幾封談家常的信給他們，很小心地避開政治與宣傳不談。雖則日本士兵們禁止覆信，不過這種信平均有百分

之十是有答覆的。在河北南部，爲答覆發出的二百九十五封信中，有四十二封信收到。

偶然，一個解放同盟的工作員，在一個駐屯軍中，會找到他的以前所屬的部隊，這件事恰爲松田遇到。他發現着他的中隊在河北太行山中，寫了四十封信給其中的各種兵士——這些信充滿着私人的，親密的事實，結果他們便不再會懷疑他仍是活着的；因爲日本宣傳中曾經宣佈過戰俘與傷兵一律爲第八路「匪軍」慘酷處死的。松田的幾封信引起了駐屯軍非常之大的不寧，結果中隊隊長由愧備傳話給他說，如果松田願意歸來，他會受到他的老伙伴的歡迎，並且宣告準備願用大量的軍火與金錢，作爲他贖回的費用。松田回答說他並不是一個需要贖金的戰俘，他邀請中隊隊長及他的部屬參加到他的方面去，和東京的軍閥作戰。

松本少佐，獨立混成旅七十五團的統率者，曾下決心，關於解放同盟的在他的區內的活動，他願親手來加以應付。他寫信答允，如果這些人願意回到日本軍隊中來，他願擔保對他們不加傷害。解放同盟工作員客氣地答覆道，他們受着八路軍優遇待遇；不但此也，他們是爲值得費時間的事而作戰，他勸告他參加到他們方面去。少佐發起脾氣來，再寫信說他們是賣國賊，一見到他，務要逮捕他們與槍決他們。他也寫信給那一區的八路軍的將領說：我以一個軍人對另一個軍人的身份，要求你把那些人送交給我」。八路軍將領經過和解放同盟工作對員此事會商後，下令出其不意地進襲少佐的總部，少佐的部屬被捕，但少佐自己却僅以身免地被免脫掉。解放同盟會員於是在牆上用粉筆寫道：「松本大佐，我們已經歸來了；你爲什麼逃開呢？」

一月有三四次，顯成了一齣「鴨城團」出發活動。這是一件危險的工作，因爲該團一定要移動到

日軍礮堡的擴音器所能達的範圍以內。頑強的日本軍隊，有時會，有時不，響從黑暗中來的聲音開火，有時一個激惱了的礮堡軍官會下令衝鋒攻擊。吶喊者因此須受到雄厚實力的保護，時常在比較孤立的堅強據點進行工作。

解放同盟會員對他們的吶喊運動曾經獲得意外的成功。在大行區，吶喊員濱田發現一個他過去所屬的部隊，當他在山西潞城駐紮的時候。統轄礮堡的軍曹恰巧是他的好友，他的同村人。這一位軍曹，一旦相信他真和一個他很久以前認爲已死去的朋友談話，身體傾伸到堡壘外面，來和濱田談話，在駐屯軍中引起了一種騷動。

一個由三十日軍與五十個偽軍駐屯的山東堅強的據點，曾遭遇到一次吶喊隊的進襲。當偽軍對吶喊員鈴木及其部隊開火時，日軍立即禁止他們。在隨後一點鐘以內，駐屯軍對於解放聯盟與其工作，提出了無數的問題，對這樣一個組織存在，表示無限的驚訝，因為他們會一直相信他們的軍官所說的關於八路匪軍的故事的。

吶喊比傳單，小冊子和寫信有着顯著的佔便宜的地方，因為牠供給了直接交談的機會，在進行交談中，可以用詢問與答覆。但更有一較好的方法，是打電話。這兒危險可以減少，而談話可以無限地繼續下去；同時也可以和堅強據點的整個的電話網，用一架普通的電話線建立了聯繫。剛從華北前線回來的小林先生告訴我他的打電話的一些經驗：

『那是一個寒冷起大風的除夕。在墨黑的當中，我們沿着一座結冰的山徑上的小徑一蹣一滑地走着，每一人都懷着恐懼，深怕不小心的走上一步會把他弄得滾下一座削壁下面去。我除開十分擔心着

我的中國衛隊在背着他們的來福槍及從日本人繳來的輕機槍以外，還得背起可寶貴的電話器具。電話器及與堅強據點通電話的工具，也是鹵獲物。最後，我們達到了目的地——一個沒有屋頂燒燬的農舍，僅離開日軍據點二百碼遠。我們不敢生火取暖，或甚至點燭取亮。

「我按置了電話具於支撐起來的三腳的桌上，我靠近我的耳機上，等待着暗號，以便使我知道，在外面黑暗中爲我設立電桿木的中國兵業已完成他的任務——這一任務就是把我的電話線插入那一區堅強據點的電話網內啣接起來。我們的衛隊散佈在附近的蓋着雪的地帶，中士從一個崗位移往一個崗位使他的手下人留心防衛。

「最後暗號到來，我看一看我的夜光錶面——時間業已快到半夜。剛好到時間！我把我的電話器搖動了四次。在過了一會兒後，一個瞌睡的聲音回答道：「喂！喂！」

「喂！喂！」我回答道，是第四據點麼？」

「這兒是，誰的電話？」

「我可以和片山伍長說話麼？」我問。有人告訴過我片山是個好人；不過幾天以前，他曾斥責他的小隊中人對一個農民的做出不必要的虐待。立即片山來聽電話。

「可是片山先生麼？」

「是的——我是片山。誰打來的電話？」

「我打電話給你不過是要對你恭賀新年，」我說。「你曉得快到半夜了。」

「對的，沒有疑問——確是這樣的。我會立意要不睡等他到來，但我揣想我會打過瞌睡。謝謝

你——我也向你賀新年；雖則我想來這不是一個可賀的年，不是麼？我順便要問一句，那兒來的電話，總部的麼？」

「不是的，這是小林的電話，他是一個日本解放同盟的會員。」

「有了一個長時間的沉默。隨後我再說下去：『喂！喂！你仍在聽麼？』」

「是的，」來着這樣的回答。但片山帶些窘急的語氣。我不要把牠嚇得放下了電話，因此我趕忙地說：『我們昨天送給你的慰勞袋，可喜歡麼？』」

「『慰勞袋麼？哦，是的——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們送的麼？』」

「『是的。足夠你們所有的人分配麼？』」

「『是的，夠了，謝謝你。』隨後我聽見他嘻笑。『什麼事？』我問。」

「啊，沒有什麼！——只不過爲了我們的中尉當他聽到牠們的時候，發了狂。他告訴我們這些東西會毒死我們。」他又嘻笑起來。『你曉得，我們叫偽軍先嚙。』我和他同笑着。隨後他清醒過來，『你曉得，』他接下去說，『我簡直不能想像會和你談話。』」

「我說我明白那一層，但這是大除夕，我們兩人都是日本人，想念着家中的我們的親人。我聽到他長太息。『什麼時候我們就再能見到他們？』他問，像煞是對他自己發問。」

「這給了我我所等待的機會到來了。我告訴他關於我自己的事——我曾受傷很重，結果我連自殺也不能夠，這一舉動我一直認爲是一個受傷了的日本人應做的光榮的事。八路軍從戰場上把我救起來，看護我恢復健康，並且讓我有自由。但到了那時候，我已開始明白了他們一些所奮鬥的目的。別

的解放同盟的日本人和我談話，我決定參加他們。隨後我說：「我們日本解放同盟正像你一樣關心着我們的家族。我們要停止這個沒有人要有和沒有人會從牠裏得着什麼的戰爭」。

「講到這一層，他沉默了。隨後他要求我告訴他關於解放同盟的經過，我們談了半點以上的話，直到他說有人來了，他要放下電話。」

「我隨後打通了第六號、第九號與第七號據點的電話，和另外幾個人談話。在和第二號據點打電話時，一個軍官走進室來，剛當我在和他們當中幾個講話的時候。他搶去電話機，開始咒罵我，命令我閉起口來，並威嚇着我，要派一隊人出去搜索我。我平心靜氣地說我不接受他的命令，那就是像他那樣的人，是我和解放同盟的伙伴們所要打擊的——如果他率領一隊人出來——我們不但要把電線扯斷，並且要把他活捉。那句話使他狂怒萬分，幾使他像火藥一樣爆炸！他掛上了電話，我繼續着打電話的工作」。

這不過小林先生所敘述的一件事，但這件事却是可以作為代表的。

日本最高軍事當局對於解放同盟的看法可由其努力使人不相信牠而曉得一斑。指斥解放同盟的會員為騙子及賣國者的反宣傳傳單，分發於華北日軍當中；好多特務人員受着開小差或被俘的訓練——隨後努力參加到解放同盟的內部去，以後挑起分裂，誘致會員，及暗殺其中好多領袖。

在我去觀光的時候，在延安有着六名這樣的人——自己供認的特務，他們很願意發表談話。身材高大二十四歲的谷川之行是其中的一個。他說他被特別指派，負責暗殺岡野，後者這時替他為我做翻譯。谷川，一個由貧農出身的入伍兵，一直是駐紮華北鈴木第四獨立團的小兵。一天，他的聯隊長北

川中佐召他到他的營中去，喜逐顏開地給他啤酒餅點及咖啡吃喝。『我早有了關於你的好消息』，他對着莫名其妙谷川說。『也許你可以有升官的資格的。你高興有那樣的事，是麼？』谷川吃驚不小，甚至連話都說不出。他被革退，過了幾天以後又被召回。這一次軍官開始進行工作。在一次豪華的宴會後，有人告訴谷川他被選擇出來擔任特別榮譽職務：他要被訓練成一個間諜，去被八路軍俘獲，這樣可參加到解放同盟中去。如果他完成這一任務，這會等於一個師團所擔任的任務。在他回來時，他可以獲得勳章，升官與一筆大的獎金，還可得一長假回家。如果他失敗了——那末他的家族在他們的鄉村中受到『待與光榮』。

谷川說，他最初是十分疑惑不解；他不明白爲什麼一個普通下級士兵能夠選出來擔任着這樣重大的任務。後來他明白——正因爲他是一個普通的下級士兵——他的上司毫不有動於心地遣他擔任這樣危險的任務。自然沒有選擇的餘地——這種請求實際上是等於一道命令。

因此谷川進了山西陽泉一所特別訓練學校，他在那兒和十五個別的像他一樣的人，化了四個月在研究電報密碼術，技擊術與好多不用武器的不同的殺人方法。在政治學上，教授告訴他們說，中共直接聽命於史大林，史氏利用他們當爲傀儡，以便征服日本及整個遠東。並且叫他與中國間諜合作，當他一旦到了中國共產黨區內的時候。他又受着怎樣用簡單的暗號，如脫帽子，繡眉毛或挖鼻子的方法，傳遞消息。如果他的任務被發現出來，他只能承認一部分；無論如何，他不要怕八路軍他們從來沒有殺過他們的戰俘。

『這在那個時候使我驚駭萬狀』，谷川笑着說。『因我們時常聽到共產黨把他的戰俘酷刑處死』。

谷川就這樣『逃到』共產黨方面去。當八路军巡邏隊帶他到一所小的茅屋中去——在那裏面他看到一張蔣介石的照片——他有一忽兒認爲他落到中央軍手中去。『但是』，他告訴我，『一當我看到在另一堵牆上的毛澤東的肖像，我知道我並沒有失事，雖則我在那時完全不明白這是怎末回事』。

八路军送他到延安去，那兒他被邀參加解放同盟。

『自然，我們差不多從一開始就覺察出他是一個間諜』，岡野說。『你明白，我們把他的故事全部檢查一下，發現牠漏洞百出。不過我們不提一句話，深知道一切解放同盟的人會密切地留心他，結果他不能做出任何值得我們擔憂的事』。

在延安六個間諜中的另一人是年青的荒田，他在去年經過四個月的訓練而被『捕』。當他來的時候，他隨身帶着一個猛烈的炸彈，藏在一隻掛錶中，他想用牠來炸死毛澤東或朱德兩人當中的一個。他又帶着一極小瓶的毒藥，藏在他的袴子的遮掩鈕扣的衣袋中，想作爲同一目的的用場。他從來沒有讓他有機會用這兩者的一種。當有一天另一間諜的罪行提出於解放同盟的會議來討論的時候，荒田決心自願地供認出來——使他大爲吃驚的是，他們早已明白了關於他的一切。『但我實在並不當爲一回事』，他帶着笑聲地說。『我從來沒有對於這一工作發生過什麼熱誠』。

剛在我的觀光前幾個月『開小差』的小田健治，也承認，指派來擔任暗殺岡野的任務。『我受到這樣一切的重視，十分榮幸』，岡野先生淡淡地說。

年紀五十歲說話很輕的岡野，日本共產黨發起人之一，曾經是一個全庄都從事於革命的人。他的父母死時，他還是一個青年，遂由他的年長的哥哥來照顧，最初送他進商業學校，隨後進京都大學。

受了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的影響，他曾經到過俄國，隨後到了英國。在作過幾次演講以後，當英國偵探本部通告他不受英國歡迎的時候，他接着到法國、瑞士、德國與俄國去。從那兒，他回到了日本，回國後不久，即被送進監獄。他在那兒憔悴不堪地度過了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從那年起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他大部分時間在監獄中度着生活，直到他從日本逃亡於蘇聯時。在一九三五年，岡野被選爲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之一。在一九三七年，他潛入到華北去，從事於地下活動反對日軍。在一九四三年，他抵達延安，顯欲把多少沒有目的的反戰同盟——這一組織中有着有熱情但無經驗的過去的逃犯——改變成爲現在的反軍閥的革命同盟。

解放同盟的政綱是企望很奢的。至其他的事，這一組織敦促日本士兵們須立即要求停止戰爭，推翻軍閥，在日本國內建立民主政府。牠同時要求和其他國家根據平等與合作的原則，建立友好關係。牠力主九一八事件的煽動者，中日爭的製造者與太平洋戰爭的發動者必須懲罰。還有其他信條，則爲復員與解除武裝直至最低限度的自衛力量，須立即實現。增高生活標準，完成言論，報紙集會，結社、及信仰的自由，對一切超過二十歲的人給予選舉權，及召集國民大會建立民主憲政等辦法，須加採用。

關於天皇的運命問題，岡野及解放同盟講話極爲謹慎。「皇天仍對於不少的日本人民視爲天神一般的人物，所以我們在目前不能喊『打倒天皇！』不過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日本人也許會當他只不過是一個脆弱無力的凡人，一個在軍閥手中被玩弄的傀儡。軍閥業已使我們站在有利的地位，蓄意強迫天皇來負戰爭的全責。在每一月的八號，所有的報紙應發表用天皇名義頒佈的對英美的宣言，這

意義就是說，如果戰爭失敗，天皇必須負擔這一罪名。不但此也，天皇受軍閥的挾，時常出現於人民之前，業減弱了大眾對他的「聖」的信仰。無論如何，我們的爭執不在和天皇本身爭執，而在和附托於他身上的絕對大權爭執，這一大權軍閥已經篡竊在手。我們估計他們很可能再加篡竊，以便進行某種新的帝國主義的冒險」。

他既然這樣闡明了主權的原則，岡野接下去說明不同意於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的見解，他曾主張維持天皇及其神一般的尊榮。「這是全然非民主的」，岡野說，「於未來也充滿着危險——雖則他躊躇地承認如果憲法把天皇的地位減削至等於英國皇帝的地位——那就是實際上傀儡的地位——那也許可以讓天皇在民主的日本有一個位置。「不過完全沒有一個天皇——像美國一樣，更爲好一些」。如果君主制廢除掉，他下斷語道，對天皇予以給養金及適合於對一個舊家的應有的待遇，自爲聰明的辦法。

所有解放同盟的會員都進着延安的日本人的工農學校。在訓練過一年半以後，他們被選拔出來到前線去擔任各種職務。這所學校——牠像所有的延安各機關一樣，佔有一並排的幾個窑洞——是創立於一九四〇年。在一開始的時候，他的主要目標，是在剷除那些伴慮認爲這是日本的「聖戰」的觀點。這一戰爭及日本參加在牠裏面的性質是由他們自己人當中學業出來的教師，用着他們本國語言，耐心地加以解釋。正常的課程表內包括國內與國際時事的分析，世界地理，及政治經濟初步課程等。在教學上採用對問題的簡接推論法——舉例來說，對「粹主義及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的幻夢作一分析，這樣以便給日本軍閥大東亞的「新秩序」平行幻夢來暗示其不可能。

目前着重之點是在鼓勵與發展個性與獨創性上面，作爲戰爭中在前線反軍閥的準備，作爲戰後在一個民主日本革命工作的準備。在政治史，經濟，及社會科學講授而外，所有學生也授以普通課程，提高他們的知識水準。每月有一次，每一人都得在他的同窗前面檢討與批評他自己的工作，這些同窗予以適當的讚美或指責。

對於實際工作也極注意。學生費去不少時間於起草宣傳單及編輯報紙上。他們勤懇地練習着宣傳的吶喊。到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爲止，用日語的廣播每周有兩次從延安發出去，希望不獨能達到華北的侵略者耳中，並且能達到日本本部的人民，爲了技術上的理由，這些廣播暫行停止，而宣傳材料，目前則由郵局或用電碼遞送到前線去，以便解放同盟的工作員在戰場中分發。

日本學生不獨參加延安的一切大集會，並且不時對羣衆演說。他們被許有投票與被選舉權。他們的人當中一個，叫做森健(Ken Mori)的，被選爲邊區政府的參政員，而另一人名做中口(Kadokuchi)的則充當延安的市參政員。按照八路軍優待日本人的原則，這些學生們比之平均數的中國士兵，得着較好的口糧。舉例來說，不以高粱給他們，而以白的麵粉給他們，他們分配的肉類，每月也有六磅——比之八路軍兵士所得的要多過一磅七昂司。日用必需品，如牙刷、牙膏、毛巾、肥皂及煙草等，也大量的供給。他們自己開伙食，做着日本式的小菜。雖則他們免除了參加生產運動的義務，可是他們却每天撥出幾小時致力於紡織，木工及種蔬菜的工作。他們是熟練的玩具製造者——在延安這樣的玩具是不怕沒有銷場的。

當我第一次參觀同盟的學校的時候，在場的七十多個會員排列成隊伍，而由他們的發言人致辭，

說：「我們準備隨時和我們的美國及其他盟友攜手向日本軍國主義作戰。爲了推翻那些把我們國家導入困苦屈辱的人的原故，我們準備做任何所要求於我們的事」。

在一間會客室中，有着學生活動精美的陳列品，和詳細的統計圖表列在一起；還有喊吶隊出動時的沙板（鋪沙以寫字之板）的雛型，及電話機等；還有傳單，冊子，和他們已經散發給日本碉堡中的駐屯軍的新聞紙的樣本等；還有把裏面貯藏物陳列在一邊的『慰勞袋』；一桌字的戰利品，主要地爲私人用物如一個兵士放在他口袋中的東西——有護身符，扎記簿，日記簿鑿定圓盤，以及流行的電影及舞台明星的着色的照片等。

在那顯然化了不少工作在裏面的統計，告訴我們解放同盟的會員曾經在過去一年中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有百分之三十在進行他們前線的宣傳工作中遭殺害；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四的會員在未入伍前是工廠中的工人，百分之三十二是農夫，百分之十二是商人，其餘的百分之二十二包括着公務僱員，工匠及漁夫——並且甚至有四個和尚；百分之七十八是步兵——百分之六十六是高小畢業生，百分之十五爲中等學校畢業生，其中有兩人有大學文憑。在圖表中引以爲榮的是，把他們的口糧和日本平民的口糧來比較，除開米以外（華北人一向是種植着與吃着麥而缺少米的），他們的口糧遠較爲高。

沿着各座牆上，掛着用手畫的宣傳畫，展示出『那號稱第一等陸軍的日本軍隊中應募兵的不平與痛苦。所有的這些宣傳畫都有着英文的標題。其中有一幅這樣寫着：『新應募的兵被命令着立在一座架子或桌子下面，在上面放着東西。他們用佝僂的姿勢，頭抵着桌子的下面一層，繼續站下去，直到他們的背脊開始難堪的酸痛。如果他們想坐一下，他們就將受到老兵的拳打或腳踢』。一張畫着一位

在床下的粗笨的應募兵的畫面上，說明：『有時幾個新應募兵將被人命令着在床下面爬着，學着鴉鵂叫。有時一個老兵要用通來福槍的鐵條，在他頭上敲一下，只在供其他一切人的頑笑』。另一標題上則這樣寫道，『營營盤裡發現有不整潔的地方，入伍兵就受到責罰，一定兩人一隊地排列起來，互相打耳光。如果他們打得不重，一個老兵走進來，打玩忽職務者的耳光特別重』。

這些學生是熱烈談論他們自身及他們的工作，關於這些事他們顯然引以爲榮的。陸軍少尉大山告訴我他過去怎樣教中國砲兵用奪來的日本大砲。中島則教授木工。山田，一個日本陸軍中的助理外科醫生，現在八路軍醫藥服務團中工作。島田則爲投擲手榴彈的專家，他推崇八路軍的適應環境的能力。吉田講述了幾次他所參加的吶喊攻勢的故事；到了最近，他說，日本當局小心地用最嚴重宣傳色彩的新聞來給他們的部隊作精神的食糧。

『日本軍隊斷然不相信』，他對我說，『我們關於聯合國在歐洲或太平洋的勝利的消息，直到我們指出，不管他們怎樣說着日德的勝利，新聞上所常提到的地理上的地方，業已清楚地證明軸心國在勝利中喪失着領土』。

吉田伍長，一個被包圍的分隊的唯一一生存者，是在一個十天作戰的結束後被捕的。他想用切斷喉管來自殺，但他並沒有切得十分深；他被捕獲，他受了八路軍看護，恢復了健康。（他把他頸上的疤痕給我，同時其他的人則在大笑。）在恢復了神智後，他會要求拿他去槍殺，害怕八路軍的救他是爲了要殘酷公開凌辱或實行嚴刑拷問。不如他所想，他却受到最優厚與最友好的待遇——這件事使他惶惑不解，直到他明白了一些八路軍對戰俘的政策以後。

團在約近六個月前被俘的片山；講述專對他的碉堡而發的吶喊運動及收到慰勞袋的事。『我們當這些工作人員是賣國賊』，他說，『並且當八路軍是一個可怕地奇怪軍隊送給我們慰勞袋。我們時常笑謔地互相告訴說，如果一個日本下級士兵跑到八路軍中去，他們要叫他擔任高級軍官去率領他們的軍隊。這一笑話在我們一次作戰失敗後，更受了人的重視，那時流言四播，說我們的被擊敗，因為八路軍被逃亡過去的日本人率領的原故』。

中口講述了一個可怖的有趣故事。內的一連第四連人曾經和八路軍打過多次仗；但每次出擊，總發生有四個人被擊斃。須知道日本字四也同時就是四的意思——因此他們一連連長把他們的連部的字從第四連改爲『廣瀨』(Hirose)連，『廣瀨』是連長自己的名字。不過以後幾次接觸中，不獨照例有四個人被擊斃，連連長廣瀨也被擊斃了。排長升上去接充廣瀨的職務——但在下一次戰爭中，排長又和照例的四個人一同擊斃。到了這個時候，該連開始害怕，認爲八路軍有着某種神祕的力量，巡邏隊開始說生病，結果連高也從那一部分開拔出去。中口自己在連部移往內蒙前線前的最後一次開火中，受了傷被俘虜過來。

有幾個學生坦白地承認他們會屠殺平民，爲了這一舉動，他們大罵他們的軍事訓練：他們被教導着，說中國人都等於畜生，他們自己是高貴的人類。他們不但自由地講述這些事——並且他們詳細寫述他們自己與別的日本人的殘暴的記錄。解放日報有一天發表了整面的這些故事的記載。這兒是一個可概括其餘的故事：

『在一九四一年，井關 (Iwano) 第三十六師，第二百二十三混合旅團，第三營的田中連駐紮於山

西的鄉寧及澤州。一天，一個年二十七歲的被逮捕的犯人帶進來。一個人只要眼睛一看就可曉得他是一個無罪的小販，但我們的連長硬說他是一個探子，把他交與我們「處置」的醫生。醫生命令那傢伙上身衣服剝去，橫睡在地上；隨後他拿了一個大的注射器，裝滿了水，把牠刺入了那一個人的胸口中去——拔出來染滿着血。同時血也從那人的發嘶聲的口中流出來。即使我們當中有幾個人也不忍看，把頭調轉回去。但這位醫生只不過微笑一下，繼續把水打入小販身體裏面去。當這個人昏厥過去的時候，醫生用某種藥使他醒轉來。最後這個人死掉——於是殘暴成性的醫生收拾了他的東西，從容走開。」

另一記載如下：

『在一九四一年七月，我被派到北平東南的長辛店的警犬訓練學校去任職。一天，他們帶了將近五十個中國平民關進高牆垣的天井中。加藤少佐命令我們沿牆佈崗，當我們站定了以後，他大聲說，大石軍曹，開始進攻！在天井很遠一邊的一扇小門開開來，一羣牙齒鋒利的狗跳出來直奔向那些驚呼的中國人，向着他們的喉嚨咬，他們想用拳頭來擊退牠們。受傷冒出來的血，只使那些狗更爲兇猛一些，牠們不折不扣地把牠們的犧牲者撕成碎塊。最後，所有的中國人肢體殘缺地死在地上，吃飽了的狗，才被引開』。

另有第三篇記載，則由某一名田島者寫成，內容如下：

『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第九獨立混合團的三十九營的第三連，駐紮於山西吉縣第三區。第一天，小野下尉對我們說：「你們還沒有殺過一個人，因此我們將要有一次殺人的練習。你們不要當中國人

爲人類，而只當他們比貓狗衆生都不如的東西。勇敢點！注意，那些願意去做殺人練習的人，走向前一步。『沒有一個人移向前。下尉發起脾氣來。』你們這些膽小鬼！』他喊道。你們當中沒有一個人配稱日本兵。難道就沒有個自願麼？好吧，我要來命令你們。』他開始叫着人的名字：大谷、古川、上野、田島！（天呀——我也在內！）我舉起了我的上刺刀的槍，手發着抖，受着下尉對於愛神經的咒罵的指揮，我慢慢地走往立在坑旁邊驚怖萬狀的中國人，那坑是他被迫日掘的墳墓。在我的心中，我要求他的饒恕——我跟困着，耳中聽着下尉的詛咒——我用刺刀刺着那個喪魂落魄的中國人。當我離開了我的兩眼的時候，他已滾落到坑中去。『兇徒，殺人犯！我稱呼着自己。』

這樣的插話，我曉得，是難以卒讀下去的，但是，由於牠們是每一個在被侵略中國的所熟知的一部分，我仍要繼續引證牠們中間一節如下。

在一九三九年六月，我在本間師渡團的小原營中，在綏遠寧夏邊境進軍。有一次我看到作見軍曹與清水伍長從一個小草屋中拖一個老人，一個少女，和一個嬰孩。在幾分鐘低聲談話以後，這兩個軍官把手槍對着老人說：『你和你的女兒——來玩一回，玩一回！』隨後他們剝掉了老人和女兒的衣服，竭力想使老人和他的女兒性交。老人詛咒與打他們，因此他們用槍打死了他。女兒狂呼起來，當他們一嬰孩從她的手中搶走的時候，隨後強迫使她睡在地下，把胡椒塗擦着她的陰戶上。

這幅報紙上載着一打以上的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事件曾經發生過不俱一次，並且發生過無數次，據我曉得。但什麼動機使這些日本人描寫牠與出版牠，只有一個比我熟悉東方心理的人可以解釋。我却不能解釋牠。

## 第十三章 反日根據地

當中國紅軍各構成分子在長征以後集結於北陝西的時候，他們數約八萬人。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和蔣委員長及中央政府締約時，紅軍編入了國家軍隊之中。不過只有四萬五千個共產軍被承認，並且只給了他們三師的番號（第一百十五師，一百二十師，與一百廿九師）。這三個師集合起來，統稱為八路軍。當一年左右以後，『第幾路軍』這種編制取消時，八路軍編入了第十八集團軍以內，受第二戰區司令閻錫山直接統轄。雖則共產黨後來與閻錫山及中央雙方失和，但他們的部隊仍襲用第十八集團軍的番號。一方面他們仍視他們自己為至少在名義上是閻錫山十八集團軍統率下的中央軍的一分子，他方面，他們寧願通稱他們自己是八路軍。

共產黨的新四軍，包括着原來地內戰時代的遊擊部隊。在一九三七年對日戰爭爆發的時候，這些遊擊隊，和南京最高軍事當局商得同意及接受牠的命令，在安徽省沿長江兩岸集合起來，組成新四軍，有着四個支隊的番號，人數共達一萬二千人。

大致說來，在戰爭開始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與漢口陷落期內，日軍多少有些忽視共產黨的軍力，集中他們的注意力於中央軍方面。跟着這兩大城市的陷落，共產黨八路軍——從內戰時代以來富有經驗的遊擊軍隊——在日本戰線後面開始加強了活動，特別注意敵人的華北交通線。於是日本人調

派有力的軍隊到他們的後方去掃蕩這些共產黨遊擊隊。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期間，掃蕩戰無論在人數及殘酷方面，都達到最高峯，其結果在共產黨控制下的人口，由二千萬萬減少到五千萬。

不過共產黨繼續組織對日的羣衆集團抵抗，敵人的『清鄉』，『三光政策』，『殲滅戰爭』；用峽洞與隧道戰術，礮山與河流阻塞戰術，及其他爲應付這次戰爭而計劃出來的各種戰鬥形式來對抗着。不獨此也，超過二百萬以上的人民自衛團組織起來，困擾日軍，和八路軍的正規軍及遊擊軍在他們的敵來則退的軍事活動上合作起來。同時，共產黨工作人員幫助人民改組他們的行政制度，建立了民主政府的形式，根據秘密投票，來實行選舉。他如減地租，減借款利息，由佃農來擔保地租及利息的償付等改革，也加採用。一個生產運動，也加以推行，在這運動裏面，正規軍與遊擊隊，當他們不作戰的時候，也參加其內。

到了一九四三年，雖則在一個繼續不變地長期堅持的壓迫政策之下，然而共產黨却已經恢復了他們在華北各種損失，並且實際上開始擴張了在他们控制下的領土。今天，他們號稱差不多有九千萬被解放的中國人民在他们指揮之下。他們的軍隊活動於廣闊展開的前線，北自綏遠到東北諸省，東至太平洋，南至海南島與廣州，沿長江而下，幾達上海。他們防守着可以一眼見到北平，天津與青島的地區。

這廣大的區域，完全由武力解放出來——武器是從日本人那方面奪來的——今天已經組織成功十五個半自主的抗日根據地。這當中有五處是在華北：山西——察哈爾——河北區的，山西——河北——河南區的，山西——綏遠區的，河北——山東——河南區的，和山東區的。八處是在華中：蘇中

區的，浙東區的，蘇北區的，淮南區的（淮河以南的區域），蘇南區的，皖中區的，鄂——豫皖邊區的。華南的根據地是位於海南島及廣州附近一帶。

位於華北的根據地是在隴海路以北。牠們向西伸張開去，達於黃河；向東伸張開去，達於黃河及直隸灣；向北伸張開去，達於內蒙包頭及百靈廟以下諸點，察哈爾的多倫，熱河的赤登，遼寧的民州（Mianohor）。牠們包括着山西、山東及河北諸省的全部，綏遠、熱河、察哈爾、遼寧、江蘇及河南諸省的一部，有着總面積三十七萬方英里，總人口八千萬。

地形是一片廣闊的平原，中間交叉着錯綜的山脈系統，軍隊藏於山中，而人民居於平原，發揮着互助的任務。在戰爭的早期，敵人佔領平原，孤立與包圍山中的軍隊。當他們發現他們不能餓死八路軍，日本人實行了無數次的掃蕩戰，這依然宣告失敗。同時敵人建築新鐵路及超過九萬五千里以上的新公路。他們在鐵路公路兩側，掘着深闊的壕溝，造成了無數堅強防禦據點和碉堡，每座碉堡的相互間的距離，是步槍射程所能及到的。堅強據點的補導網，及碉堡網遍佈於鄉村之中，以便封鎖山中的部隊，而抑制着低下區遊擊部隊的活動。

但針對着一切日本人的各種努力，共產黨勢力繼續膨脹着。依靠了人民的合作，他們不獨能保持了他們自己的陣地，並且對侵略者舉行反攻。關於這種反攻的詳情，容在下章敘述。在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為止的十二個月中，他們曾經進攻與毀滅了一萬三千個這些堅固的據點與碉堡。這看來似屬不可能，當一個人考量他們被迫作戰中所遇到的一切可怕的障礙的時候。我也不大相信這回事，當我在延安他們告訴了我這情形的時候；但從我兩月中我和八路軍路在敵後活動中在一起所見到的事實——

真地從事參加於這種堅強據點與碉堡的佔領與毀壞——我才相信共產黨的說話並無誇張之處。攻勢只在武器缺乏與形勢不利下受到限制。業已有華北抗日根據地區域中的八千萬人當中的五千萬人，從日本人的高壓下面解放出來。不但此也，華北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濟南、和青島，目前雖在敵人控制下，却直接與時常受到八路軍的威脅，他們只少着武器去把他們克復。

華中根據地橫跨長江的下遊，淮河、漢水與黃河流域各地。牠們從浙東展開達於洞庭湖，從那兒再向北達於隴海鐵路。牠們包括了江蘇的大部分（直達到隴海路爲止），安徽、湖北及河南、浙江的一部分——一個包含着中國產米最豐富的區域。牠們散佈於一個廣達於十三萬五千英里，人口超過六千萬的地區之上。這些根據地四周環繞着高山，是建立於廣闊平原之上，邊緣交錯着運河的大網系，有着湖沼星羅棋佈着。就在這兒，新四軍過去七年和日本人一直作着戰。

在這一區域裏面的交通，是所有中國各區中最發展的四方，全區爲鐵路縱橫交錯着，其中包括京滬鐵路、平浦鐵路、平漢鐵路、隴海鐵路、淮南鐵路、江南鐵路、浙贛鐵路，粵漢鐵路及滬杭甬鐵路。公路則更較鐵路來的發達，有着約近六千英里長的總數。正像北方一樣，這些交通線是設着防禦工作的，目的在分割與阻塞新四軍的活動。共產黨用範圍廣大的埋地雷的行動破壞公路與鐵路的活動來作對抗，敵人因此被迫駐屯了九個半師團的兵，再加上了一二十三萬的僞軍，以防制新四軍。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曾發動對新四軍的三次大進攻，他們威脅着敵人在華中的主要據點的心臟，如上海、南京及漢口等地。所有三次進攻，都慘告失敗，跟着新四軍對日本人繼續加以壓力，牽制下了很大量可以用於別處更其要緊的前方的軍隊。

自從一九三八年廣州陷落以後，華南的遊擊隊已經在從廣州到九龍的日本後方活躍着，到了一九四四年，他們自己已經建樹起了雄厚的力量是夠控制七千英里與人口總數達四百萬的地區。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東江抗日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自此以後，牠接受延安中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完全領導。東江遊擊隊集中他們的大部分活動於沿廣九路一帶，那兒他們時常使火車出軌，及襲擊防守鐵路線的駐屯軍。以他們的大膽著名，他們曾有一次炸毀掉貼隣九龍郊外的大鋼鐵橋。

自從香港陷落後，東江遊擊隊，由於他們可任意地進出這一城市，曾經救出了好幾十個中國人，其中包括重慶的高級官吏。英美人，（平民與任軍職的人兼而有之）也救出了不少。有不少的美國在季港天空被擊下的飛行員，也被東江遊擊隊救援出險，回到他們的空軍根據地去。

自從一九三九年日本佔領了像一顆眼淚一樣孤懸於華南之外的海南島後，在該島上的共產黨曾實行了好多次的對穀倉的劫掠，並襲機場與交通線，迫使日人在島上保持一強大的駐防軍。把海南島準備作爲盟軍在太平洋反攻時的登陸地點，乃是他們的希望。

## 第十四章 軍事紀錄

由於在延安的八路軍及新四軍的總部認爲他們至少在名義上，仍受重慶最高軍事當局的指揮與統轄，有關共產軍活動的各種報告，照常送呈國防委員會。

下面是軍事紀錄的一個節要，乃共產黨宣稱他們軍隊從戰事爆發後至一九四四年夏天，戰鬥的經過。

八路軍及新四軍合併起來共佔全中國對日兵力的十五分之一弱，不過共產黨軍隊却和百分之四十五·九的今日在華的日本軍隊作戰，以及約近八十萬的偽軍中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軍隊作戰（關於這一事件，世界所聽到的比較少）。在戰爭的七年中，共產黨打了九萬二千次以上的仗。他們曾死傷了一百十萬的日偽軍，和俘虜了十五萬的敵人。虜獲物中包括三十二萬支來福槍（足夠配備五十四萬人之用，以每五人配備三支槍的比例計算）；九千挺機關槍，六千尊大砲，及一大堆的雜色的軍器，如戰壕中用的白砲，手榴彈投擲器，子彈，無線電，電話機等。五十五個日本高級軍官被擊斃，其中除開大佐與少佐以外，包括一個中將與七個少將。在同一期間，共產黨死傷超過四十萬以上，其中包括五三五個上校職位以上的軍官。

『所有這一切戰爭中，』共產黨總參謀長葉劍英將軍對我指出道：『自從一九四〇年以後，沒有

一顆槍彈，沒有一個小錢，或一磅的食糧，是由國民政府給我們的——只有一個例外：有一百二十挺輕機槍及六挺射坦克的砲，特別運載進來，那是由蘇聯最高軍事當局給我們的。」

上述的話，是答覆馮盡宣傳能事的羅澤閣將軍（Lo. Fong Ko）的攻擊的，他說：『共產黨在過去六年中，未打一仗。』四十萬的死傷，差不多和目前的八路軍與新四軍合併起來的總數相等（五十七萬人）。

共產黨爲什麼能夠獲得這樣多的成就呢？主要地由於他們隊伍中的特殊高的士氣——根據副總司令彭德懷的說話——這是有耐心的政治訓練的結果。

『任何軍事計劃的完成，』他在一次會見中說起，『主要地依賴着勇氣、自信、戰鬥力，和軍官與士兵雙方的團結精神。提高這種性質，即是我們軍隊中政治工作的目的。僅有口號標語不發生多大作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種逐漸教育的過程——促醒我們軍官與士兵的國家意識，使他們熟悉了敵人的謀略與質素，教導他們唯一把中國從目前困難狀況救出來的方法是抵抗侵略者直到勝利爲止，和不流血就無法獲得中國的獨一無二幸福。』

同樣地重要，是軍官與士兵間的加強了良好的關係。在過去軍閥的軍隊中，沒有軍官與士兵的和洽空氣存在。軍官虐待他們的士兵，遇有輕微的冒犯，即行鞭打，並且強迫無理由的服從。今天，剷除了這種流弊還不充分；產生一種團結精神，培養友好與尊敬的空氣，加強甘苦相共，存亡相依的精神，是重要的。

『在我們的求解放的爭鬥中，我們應該依賴人民龐大的潛力。我們應該組織他們，教育與武裝他

們，領導他們打遊擊戰。爲獲得他們的援助，我們應該遵守最嚴格的紀律。至其他的行爲規律中，我們的士兵應該言語與態度上容氣，他們應該償付他們所買的東西的錢，歸還他們所借用的東西。他們應該賠償任何損壞的東西，打掃清楚任何他們弄髒的地方，並且在開拔前，應該聽命去作一次考察，是否對人民無意中做出了任何不對的事。」

一旦觸及到八路軍政治工作問題、厚嘴厚的彭德懷——通常是一個帶些沉默的傢伙——就滔滔不絕地不能停口。這對他並不是新的事物；這種知識與信念是一種要追溯到早期內戰時代的經驗的結晶，那時他和他的配備十分不堪的革命信從者，一同加入到毛澤東、朱德、賀龍及其他領袖的手下去，這些人曾十年立定腳跟，對抗着以壓倒優勢的兵力與武器向共產黨身上圍剿的蔣介石及國民黨。那是政治信仰，及黨的教育工作，支持他們作那可驚的長征，這一有組織的深徒，只有拿破崙退出莫斯科的歷史記載可與之比擬。他曾講起過這件事，當我第一次在陝西南部他的司令部遇到他的時候，那時是要回溯到一九三七年，正在日本人進攻北平的前夕，與戰爭快爆發的期間。

『和日本戰爭隨時有可能，』他那時曾經這樣說，『但我們已準備作戰。我們所缺乏的武器，將由我們的人民明白他們爲什麼而戰來維持勢均力敵。我們也有龐大的人力作後盾，以及作長期消耗戰的必要資源。』

土頭土腦語帶諷刺的賀龍，在貢獻他的說明共產黨的異乎尋常的軍事紀錄的意見中，是十分乾脆的，他說：『我們的兒郎們，剛巧是些不怕日本鬼子的人，總之一句話！』我們要知道賀龍，那是他和他的手下人，由他親自率領，對日本機械化部隊，在戰爭開始的早先幾個月，從北平長驅直下的時

候，加以第一次的嚴重挫敗。日本人曾吹牛他們要在三月內征服中國。輕視了中國的兵力，驕傲着他們自己的機械化武裝，日本人從華北疾掃南下，把他們前面的中央軍，驅逐得像一羣受驚的歐羣一樣奔逃。賀龍不但沒有參加到退走的中國軍隊中去，抽調他的內戰中有經驗的老兵到一邊去，讓日本鬼子喧嚷地走過去。在平型關的狹仄的通道上，賀龍，一位遊擊戰略的大師，對日本機械化的隊伍主力，加以包圍。被陷的坦克與砲隊互相殘踏地往上爬着，發狂地逃性命，『我們給他們一次大哭叫號地迎頭痛擊，』他沉默地說，更像對自己而不是對我說。『我們真地奪獲了那些坦克車及裝甲車中的幾輛，但我們只能把牠們毀壞掉，因為——嘿我只能承認——因為我們不曉得怎樣開那個鬼東西。總之，我們對牠們毫無辦法。牠們也許會變為一件麻煩的東西；坦克車是沒有多大用處，除非是在平地上，而在華北又沒有很多平地。所有的平地，我們能夠並且很容易地把他切斷，使牠簡直不可以讓坦克轉動。』

日本人的飛機也並不使賀龍及其長征隊感到任何恐怖。他們在過去十年內戰中，及八千英里長征的途中，曾時常遭受到中國飛機的轟炸與猛襲，這結果，日本鬼子的俯轟炸機不足以嚇唬他們。實際上，賀龍曾大膽地進襲陽明堡的日本飛機場，損毀了三十架飛機。『我們在這一工作上沒有妄費一粒寶貴的子彈；我們用着我們的刺刀與手榴彈走進去，我們毀壞了停在機場的每一架飛機及把機場的設備附帶也一并毀掉。』

賀龍的姓名在今天的華北全部，變為家談戶曉。在內戰時代，他們叫他為『共產黨的羅賓漢。』誰在一九二七年國共破裂前，他是一個國民黨的將軍，但大量殘酷的逮捕羣衆及國民黨的屠殺每一個

被認有同情共產黨嫌疑的被捉犯人，十分使他憎恨，他參加到共產黨方面去作他們長期求生存鬥爭。在一九三五年，他領了五萬個手下人，開出了湖南，參加長征。到了他在西藏邊境，與朱德及共產黨主力軍會師的時候，他的兵力減少了一半。他的士兵成千地死亡於飢餓及露宿上；其他幾千人死於作戰或受傷致死，因為他們在他們路上的每一階段，都得作戰。當我在陝西訪問賀龍及其軍隊的時候，他們剛才開到。我在一九三七年七七的晚上在他的司令部中，那時消息傳來，說日本人進攻北平近郊的蘆溝橋——這著名的進攻爆發了亞洲戰爭的火藥桶。有人也許要認為這位將軍和他的軍隊，在經過這一次可怕的長途跋涉後，沒有什麼再比休息重要的了。可是不然，在第二天早晨召開的一次羣衆大會上，賀龍及其部隊宣佈他們願對日作戰，不問蔣委員長及國民黨是否同意。

自從那第一次大會過去以後的七年中，賀龍很少改變。他仍是一個身體強壯精神飽滿的戰士。賀龍率領第一百十五及一百二十師進入山西沿同蒲路佈防。由於這結果，日本人不得不停止了他們南下，回師到他們的後方去對付他。這給退却的中央軍一個喘息的機會，能有充分的時間掘壕佈防，堅守陣地，抵抗敵軍。「我的士兵那時是對於那嚇壞了的國民黨的士兵，壯了他們不少的膽量，」他說，或許有一點誇口。「我們時常叫他們是日本人的開路先鋒，因為他們跑的路，就是日本鬼子跟着走的路。」

雖則和日軍作戰比之以前內戰，是更其危險與困難的事，可是賀龍仍極注意於組織羣衆，不問在那一個他的軍隊活動的地方。「沒有人民的幫助，我們決不能夠存在下去。我們從我們過去時代的經驗，明白了那情形。我們派了宣傳團，在我們軍隊前面，到鄉村中去，說明我們到來的目的：日本鬼

子正在滅亡我們的國家，我們到來打他們。我們需要人民的幫助來幹這一件事，需要他們的幫助，反抗敵人，保衛他們自己的田土與家室。如果我們願意對這個防衛犧牲我們的性命，難道要求人民的幫助與合作是太過分的麼？有錢的人出錢。有力的人出力，盡站崗的責任，對敵人的移動供給我們情報，做嚮導，或者拾傷兵。在我們抵達前，我們就曉諭他們，我們隨後的模範行為使我們的好名聲在我們到達以前流傳開去。我們的軍隊不問我們到什麼地方，都受人歡迎。他們立即從我們的特殊關連草帽上認識了我們。」

『這樣我們才能在敵後生存與作戰。這樣我們才能發展與擴張，為此我們在過去幾年中，我們已經從日本的高壓下，解放出來幾千萬的中國人民，幫助他們建立自由與民主的抗日根據地，能有強大的力量，足以在敵人最精強的武器的前面，持久作戰下去。』

在延安，有一時期，曾有好多親自參加建立與發展這些抗日根據地的人在着。他們召集起來開一次會，為將來設立計劃。舉例來說，這些人當中，有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司令蕭榮臻將軍。

## 第十五章 晉、察、冀、

山西——察哈爾——河北抗日根據地——通稱晉察冀——是十五個半自治的根據地中最大，最富與最重要的一個。

晉察冀包含一個北自內蒙及滿洲南至正大路，西自同蒲路直至直隸灣。就其全部人口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人來講，約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人是在晉察冀政府直接統轄之下。在日本人統制下的七、〇〇〇、〇〇〇人，是主要地集中於較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與保定之中；這些城市，都是日本人所喜歡稱之爲『華北佔領區』的軍事據點。

晉察冀的故事，也就是聶榮臻的故事。獅子鼻的四十六歲的聶榮臻，四川人，在一九二〇年，在勤工儉學計劃下被送赴法留學，在勞動大學研究工業及化學工程。後來他在巴黎的克魯梭兵工廠及萊瑙汽車廠做工。一九二四年，他進入莫斯科的軍事學校，於一九二五年回到中國，在著名的黃埔軍官學校任教職。他參加北伐，向漢口出發，但隨後的國民黨清黨，他加入了紅軍，首先充林彪的政治顧問，後來充任賀龍手下的師長。

一九三七年十月，只在戰爭發生後的幾個月的時間，聶將軍受命率領一支精銳的二千名的老遊擊戰士，向東開進河北省。他們的武器，總數只包括一千支來福槍。

晉察冀在這期間是在極端混亂狀態中。逃走的中央軍，有着各地地方政府的官吏跟隨在一起，並有幾萬個受了驚嚇的農民參加在裏面。那些留下來的人，數目太少，士氣也極低，不能收穫在田中業已快成熟而未割的穀物。土匪劫掠沒有武裝的村民，少數日本浪人，拿着一張日本旗，能夠佔領任何大的城市。

在這種鬧鬧不安的情況下，聶榮臻和他的二千人開到，立即從事恢復地方秩序。政治工作人員安定人心，勸告他們到戰場上搜集放棄了的武器，來武裝他們自己。把信心恢復起來後，遊擊部隊很容易地組織起來，此外還成立了一副補充的自衛兵，及民衆自衛團。從他們自己的人當中選出新官吏，代替着南逃的舊時任命的官吏。

三個月後，到了一九三八年的一月，聶將軍把秩序已恢復得十分好，召集一個人民大會的代表，實屬必要，由這代表來推選一個臨時政府。大會有廣汎的不同階級來參加。出席者有極富的穿着絲織品的長袍的大地主，有穿着老棉絮短襖的農民。有幾位蒙古人與回教人也來參加，甚至還有一個穿紅袍的西藏喇嘛出席，代表他們的少數人民。許多人到來必須要通過日軍的戰線。有些人則來自被佔領的城市。討論根據平等原則，完全以民主方式出之。討論結果的官吏選舉，則由秘密投票方式出之。晉察冀邊區政府行政委員會九個被選出來的委員隨後打電報到重慶全國軍事委員會及行政院，請予批准，並且對設立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也加追認。

同時，聶將軍的二千個長征軍的原來細胞，當更多的新入伍兵應募後，擴大得很快。

『在一開頭，我們對這樣犀利的裝備着現代武器如坦克，大砲及飛機的敵人，沒有作戰的經驗，』

聶榮臻當他邁着大步，走上走下地時候這樣說。他是一個好動成性的人，神經極爲敏銳。他不能靜止一會兒。爲使他的兩手不停，他像孩子一樣啣着地跳着一條繩，或玩弄着他的派克自來水筆（派克自來水筆，代替着獎章，用來贈與那些在共產黨軍隊有顯著功勳的人）。『在他方面，日本人以前也從來沒有遇到一個像我們一樣精於游擊戰術的敵人。爲應付我們在他們後方的日在增強中的威脅，他們用了他們傳統的正面進擊，借問陸地與空間的轟炸，意欲佔領我們已經佔領的一個據點，開始移動軍隊，向我們進攻。當他們佔領了這地方，他們認爲戰爭已告結束。不過我們只不過撤離這一據點，以便包抄過去，進襲他們的後方。幾乎時常是我們用切斷他們和他們的根據地的交通線來強迫他們退走。』

極端的流動性是他們進攻日本人的主要優點，雖則他們受到重機械化武器的阻撓，然而這却對於防禦一個不作陣地戰的敵人，不能收多大效果的。由於需要兩方面願意才能打一次仗，日本鬼子只能向聶氏的游擊隊挑戰，當他願意戰的時候，而他只在他有利的條件下，才願意作戰。類似這樣事的例證，聶將軍講述了著名涞源戰爭的故事。日本人曾派了一千人的武裝精銳的縱隊去探尋與殲滅藏在山中的聶氏的游擊隊。

『我們引誘他們走入一個大的袋形中，隨後在天明前我們出其不意地打擊他們，趕他們到一個小山谷中去。在這兒，用交叉的砲火，掃夷他們，致他們的死命，直至這樣的程度，甚至連把他們大砲從驢子身上卸下來也來不及。除開少數幾個日本鬼子個別地發狂地逃脫外，就沒有留存下來的敵人。至少當這次仗完畢了以後，沒有一個日本鬼子留下來活在戰場上。大砲作了我們最好的勝利品，雖則

我們學會了用牠們，須經過相當期間。當我們會用了牠們，我們利用牠們來完成我們攻擊他們的確鑿的目的。』

同時阿部中將 (Kishu Aoe) 遭到這樣可恥的敗北，決意親自率領另一一千人的精銳縱隊，發動一次討伐行動。『像以前一樣，我們潛伏在山上的隱蔽處，讓他們走進了我們的陷阱。隨後我們掩襲他們，在他們曉得什麼軍隊攻擊他們前，完成了擊斃阿部中將及其僚屬的任務。留下狗命的日本鬼子，發出無線電乞援，飛機從空中飛來，由降落傘上跳下來了十個新將校；但我們在第二天的一仗中，把這幾個人當中大部分人也擊斃。』第三個一千人的增援縱隊，加速開到。我們也不加阻擋任其開進來；到了那天的晚上，總數達三千的日本鬼子，只有三百人能夠突圍出去，逃到他們的根據地去。

『那天，我得搜集了很多可寶貴的來福槍，擲手榴彈的軍器，及其他武器，』聶氏嘻笑地說。他的成功把全晉察冀的人民都瘋魔了起來，不折不扣地使他獲得了幾千新兵。爲替阿部將軍的死亡報仇，日本人集結了五萬人的精良部隊，實行一次懷有奢望的征討，目的在把八路軍像一條鐵帶樣包圍在裏面，這樣，以便壓迫他們離開他們在五台山的主要根據地。聶氏的部下，就是從這些山中下去進攻在涞源的敵軍縱隊的。在這時守五台山的八路軍主要部隊恰巧是第三百五十九旅團——王震 (Wang Cheng) 及其部下。

日本鬼子，爲使用恐怖戰術，焚燒他們所見的一切東西，屠殺一切他們所能捉到的人。對於防守的人，一切事看來是不妙的。這一圍困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並使英國政府關於聶氏的命運，提出了詢

問。漢口業已陷落，日本鬼子，他們早已誇口，中國人不能作陣地戰，現在又開始宣稱，中國人在游擊戰術上，也遭到失敗。

在慶祝殲滅五台山守軍中，像日本鬼子所曾舉行的，未免言之過早。等待適當機會到來的游擊隊，穿過了加緊包圍的鐵帶，到了敵後去重行改組。這一件事完成後，他們猛襲日軍，使日本鬼子軍隊潰亂。鬼子既感到頭痛，遂被迫放棄了全部的討伐戰，視牠爲一次化錢很多的失敗。

日本人那時迷夢完全醒了，終於認識清楚；蔣氏的軍力的實際情形；那就是對他們在華北全部陣地的威脅。他們挑選出他們最能幹的戰術家當中的一位，對蔣氏的游擊戰術，下一次詳盡的研究。到了一九四〇年，他草成了所謂『廣佈驅散』與『蠶繭』戰術。基本據點的網，中間有着好多築着堅強工事的碉堡，戰壕，及鐵絲網，在這一區佈置開來。隨後開始他們的蠶食工作，那就是逐漸擴張他們的網狀工作，以便把區內設立更多的據點，位置愈弄愈縮短與愈密集。在這一方法下，日本人希望減少八路軍游擊隊可以活動的與取得給養的地區。

八路軍，在總司令朱德指揮之下，於是用了一種大膽的總反攻，向日本人挑戰——這就是著名的百團大戰，自一九四〇年八月發動到九月中旬爲止。首先他們進襲鐵路公路，切斷與摧毀敵軍的交通。隨後他們開始進擊比較孤立的據點與碉堡。用了從日軍奪來的大砲，他們開始有系統地一個個摧毀了牠們。日本人着慌起來，被迫從前哨地帶退守，沿着鐵路公路集中兵力。他們沿着這些交通線，建築了新的與更其堅強的據點。新的碉堡，以能抵抗他們自己的野砲的襲擊爲原則而加以設計的，是兩層樓高，有着一層很深的地下室，如果碉堡毀掉，可以從下面繼續作戰。這種小型的堡壘，更用兩

道很深廣闊的戰壕，幾道鐵絲網，及無數木圍牆防衛的開火洞，來使之鞏固。

『我們從奪得的文件中，發現日本人準備提早進行太平洋戰爭，計劃以華北作爲他們人力與資源的倉庫，』聶氏接着說。『那時我們並不驚奇，當他們對於糧食戰術感到不耐，決定進行大規模進攻，以便在華北一勞永逸地解決八路軍的時候。他們調來一龐大兵力，約有七萬日本人與三萬僞軍。在完成了對北岳全區大包圍以後，他們重行開始向中央的五台山收縮包圍。在勝利以後，他們計劃下山到平原中去，消滅最後的抵抗，這樣，他們那時就可以集中全部注意力於未來的對英美的戰爭上。』

『但他們又遭到一度失敗，』聶將軍暢快地說。『在他們憤怒之下，他們把他們眼前一切都加以毀滅，想藉此來使人民或八路軍都不能生存下去。這就是他們所謂『竭澤而漁』的戰術。魚類不能生活，當海乾了的時候。』

日本人兩手空無所獲，又退回他們的據點。在他們的報紙上，他們承認他們的失敗說：『日本陸軍像一隻不能捕捉那個膽怯老鼠的兇猛獅子。』

當太平洋戰爭業已進行的時候，日本鬼子又曾一度恢復他們的『蠶食』戰術。不折不扣地幾千座新的碉堡與新據點，建造起來，中間的空隙是離開一英里半到兩英里。『他們在河北平原造成了像一座森林般的堡壘，』聶將軍宣稱。

『但我們留在那兒屹然未動，在兩個堡壘中間的空隙上活動着，雖則在我們的行動上遭到很嚴重的障礙。當他們包圍攔來，我們移動出去；當他們伸出了他們的頭，我們砍掉他們的尾巴。不過這却是對我們有損失的把戲；敵人逐漸地從我們掠取去了更多的土地。日本鬼子兜捕人民，使他們爲他們』

的坦克車及裝甲車建築了公路網。我們重行動員民衆在夜間再把這些毀掉。第二天，日本鬼子會到來叫民衆修補我們所毀壞的路。這是人民難以忍受的負擔。使他們沒有時間可以耕種。找出別的辦法來應付這種威脅，遂變爲必要。看來確然是的，日本鬼子已在很快地完成他們佔領華北肥沃的多人口的平原了。好吧，我們決定了與民更始的政策；組織武裝與幫助他們來盡對他們自己的幫助。這永遠是一個游擊的指揮人所應復返的據點。我們教導他們怎樣做地雷與手榴彈。我們教導他們怎樣打槍，怎樣毀壞敵人的交通，怎樣保衛他們的家庭與田地。我們教導他們新的技術——隧道，戰術，地雷戰術及壕溝戰術，麻雀戰術，及其他十多種對敵作戰的方法，不問在什麼當敵人出現於他的據點及碉堡之前的時候。我們的成功，遠超過我們最樂觀的企望之上。人民結果明白他們用不着對日本鬼子有什麼害怕——他已經造成他的最大的不幸——而決定打回家去。再者，日本鬼子用多次最惡毒的討伐戰來復仇；但當他的死傷可驚地增加的時候，他像受了蜂螫一樣地，縮到他的據點中去。由於他不能允許調來必要的援軍作大規模的軍事活動，而在太平洋上其他地方軍隊更有迫切的需要，他不久就發現自己只能堅守於碉堡之內。

『隨後我們日漸在擴張的八路軍重行穿着起他們的制服，拾了他們的槍枝，並且從守勢改取攻勢。目前，我們已經從日本人方面恢復了比太平洋戰爭初起時的更多土地。我們現在仍對敵軍採取攻勢。』

這看來像一個浮誇的談話。但我隨後要去證明他所說的話，當我到前線去的時候——那就是在敵後的前線。不過我在延安及邊區仍有幾星期的逗留，才能動身到前線去。我會看到那兒的很多的人民

戰爭，他們這樣允許我。同時，我也願意聽到關於牠的起原，牠的問題，牠的發展的更多消息。因此，蔣將軍介紹給我兩個從河北最近抵達的政治工作員。

「他們幾乎是從開始，就把全部精力化在這項工作上，」他說，「他們能告訴你詳情及內部工作情況來補充我已經敘述的大綱。」他們確然是如此，說來真奇怪。

## 第十六章 地下戰爭

王東克 (Wang Tung Keh) 與趙芳 (Chao Fang)，雖則他們沒有親屬關係，却像父子。不問在體質上或心理上，他們並無傑出之點。他們僅不過是普通農民，但可作爲華北勇敢的幾千萬人當中的代表。

王是河北中部他的縣裏面的人民武裝力量的一個領袖；趙是也在河北中部日本佔領下的保定附近的一個青年前衛隊的隊員。

一小時接着一小時，一天接着一天——差不多有整夜——我坐着聽王與趙談晉察冀的人民戰爭。首先一個人談，接着另一人談。有時，他們會變爲熱烈起來，滔滔不絕地講着，有時同時發言。並且在全部談話經過中，我被他們的故事吸引得着了迷。他們說着說着，我讓他們按照他們自己發展放野馬，只不過偶然插進一句問話。我現在記起的，是他們的聲音，當我想到華北戰爭時候。對於我，牠的歷史將永遠是兩個農民講述的聲音。

從剛剛一開始的時候，他們的工作一直是發展與調整在人民戰爭中的農民個別的努力。受了八路軍的訓練——這一訓練在各種社會中選出了領袖型人物來做這種工作的——他們也組織了在他們家庭周圍的村莊自衛團部隊。人民早已在製造爆竹上，熟悉了使用火藥，遂在用陶器瓶、茶壺、杯子，及

馬口鐵的罐頭等，製造粗糙的地雷，中間裝着黑色的火藥，用一根簡單的藥線來使他爆發。王和趙及其他二三十個受八路軍訓練的用廟宇中的鐘鐃化開來，把較多的金屬做裏子來改造成的地雷。村民對於埋置及偽裝地雷，以及很小心處置這種改良的武器方法，顯出了進步的姿態。最重要的是，他們能聽從勸告，反抗日本人的對犯有埋地雷行爲的每一個村莊人民，進行屠殺的威嚇。當日本鬼子出動被看到時，埋地雷的村莊即逃避一空，消息廣泛地傳播開去。在今天，無數的村莊通路上，密佈着地雷。小路、小溪，即使在禾稼上，也巧妙地散佈着火藥，這一來，在好多地方，日本鬼子再敢不小心地觸一觸一個不相干的南瓜，因為南瓜已使他們知道，當拿起來的時候，也會爆炸的。

在某幾個區內，地雷戰已經發展成爲一種精良的技術。埋地雷的地方是在沿公路的戰略要點上。在每一地雷的埋藏地帶，有一磚築成的地下管子系統，中間通過著藥線，直達到一個農家或附近瞭望所中的一個原始的『鍵盤』上。當一個敵人的縱隊移入了地雷地帶，管地雷者鎮靜地拉一拉鍵盤上的這一條或那一條藥線。地雷爆發起來，像軸針球機件 (Pinball Machine) 一樣發着光，當發光的敵人衝進衝出竭力想把自己退出地雷區的時候。

無數的做成圈套的陷阱，敷設於鄉村的旁邊：例如躍起的地雷，阻滯的地雷，與顛覆的地雷等。最後一種僅是普通的地雷，部分地展露在外面，像煞埋地雷的人，曾經中間被打斷了工作，沒有能事前把他掩護好了一樣。日本鬼子的技師小心地抬起這種地雷，正當他翻轉來檢查他，裏面藏的硫酸小瓶溜出來，地雷在他們的手中爆發開來。目前，日本鬼子不敢在沒有十分當心前，接觸任何地雷。即使他們的磁性探雷器也不能偵察出那費力很多，放在路旁似不相干的藏在擊開的岩石當中的地雷。

村民經過了若干時期與獲得成功以後，變爲更其大膽起來。現在，他們用寫在旗上，或懸掛於田中的稻草人上的標語來激惱與污辱日本人。當日本人想撤去標語的時候，這些當中有好多標語會爆炸起來，他只好耐着他的驕傲心理，決心不加理會牠們。這樣一來，標語增添了幾十倍——自然牠們當中很少幾個是埋有地雷的。

呈現在眼中的任何事物都像埋有地雷。在若干區內，簡直一切東西都確然是的。一隻留在路當中的籃子，一個留在田中央的犁頭，一個留在近路旁的紙包小件——這一切東西都可能埋有地雷。一條車轍掘開來，一個地雷小心地埋在裏面，一個舊汽車胎輕輕地在多黃塵的上面滾一下。在幾個日本鬼子的貨車在這樣情形下被炸毀以後，鬼子的汽車開行者決定沿兩條車轍的表面駛突過去——這兩車轍上面也埋着地雷。即使小孩子們也用類似藏有地雷的土堆，阻礙了道路的可怖的把戲，從事地雷戰。一個鬼子貨車夫，偵察出這個土堆，很擔心地彎路走進人一個多污泥的田中去，那些在一邊從他們的守望崗上看到的青年人，就不免要在暗中大笑。有時，如果貨車陷進了泥地中，遊擊隊的狙擊兵就突然出現放着槍彈與投着如陣雨般的手榴彈。

『我們在晉察冀最出名的地雷英雄是年青的李邕(Li Yung)，』王說。『你可願聽一些關於他的事麼？』

『自然願意。』

『好吧，李邕是整個華北地雷戰士的激勵者。他還是一個小伙子——二十左右年紀——但他對於地雷戰如果一無所知，就不值得提起了。去冬在日本進攻北岳區的三個月掃蕩戰期間，李邕和他指揮

下的一小队人死傷了三百六十四個日本鬼子，炸毀了五輛大卡車。

李崑愛用的戰術之一是引誘日本人走進預設的陷阱。輕視日本人對他的頭顱所出的很高代價的懸賞，他在適當的情況之下，却願意把他自己透露在一個進攻的縱隊前面。

「嗨！我就是李崑，」他會這樣大喊。「跟我來，如果你們敢！」

「在他們熱心追趕他的時候，日本鬼子忘記了謹慎，跑進了李崑所步行過去的陷阱中。有時他在進攻的敵人縱隊的路中埋置同一類型的地雷。當他們達到了某一點，他對領隊的好多人放一排子彈，逼迫他們分散到羊腸鳥道兩旁他預設的陷阱中去。」

日本鬼子有時趕着牲畜或被捕的村民通過地雷區，使地雷爆發。村民用埋置有藥線的地雷來以防萬一。王告訴我，村民的實施方法，總是等待牲畜與被捕的人安然通過了地雷地帶，然後再發作跟在後面進入地雷地帶日本鬼子下面的地雷。

「當日本鬼子決心不顧一切犧牲碎碎地通過地雷陣地的時候，他們有時——可以說很多次——在村莊的大門口，遇到我們木砲的轟擊，」趙芳開始說道。

我舉起一隻手來。我不能十分確定我聽見的他所說的話有沒有錯誤。

「喂，等一下。……木砲，你剛說的是麼？」

「哦，是的」。年青的趙停了一下說。「啊，自然，木砲對於你有點新奇的一件東西。我們認為他是毫不足奇了，你該明白。」

因此趙解釋這件武器給我聽。一棵堅硬的木頭，常有十英尺左右長，擊成一條管子，這管子有時

鑲上幾條金屬。外面用偷自日本人的電話線來緊緊繞着，使牠不致炸裂。砲彈重若五磅以上，是由碎鍋、玻璃、石塊——及一切在手頭堅硬尖銳零星材料做成。在房子裏面的牆上打開一個洞，把掩護着的砲口和外面對着村莊大門的牆相平。一個軍官從一個窺探的洞或屋頂上瞭望着，當敵人達到一個預定的目標的時候，如村莊大門等地，就下令叫人開火。日本鬼子對這些木砲，有着迷信般的恐懼，因為這種異乎尋常的轟擊，即使牠不致置人於死地，却會使人受重傷。

當日本鬼子經過這種大砲，實行進犯、和迫進村莊中的時候，他們會跌進了無數街道中，小街堂中，他們想走進的家屋中的誘人上圈套的陷阱中。他們會從每一座屋頂上，受到手榴彈的襲擊，從每一個門口，或窗口，受到槍彈的射擊。隨後，會突然來一個神祕的平靜，村民看來完全不見了。

『隨後就開始另一類型的戰事——那就是隧道戰事。』老王捲起了他的袖子，喝了一口熱茶，用動作表示叫小趙靜默。王是隧道戰事的專家。

在戰爭的早期，村民在他們的屋下面掘成了地下室，躲在裏面避開敵人。日本鬼子很容易發現這些地方，把人趕出來，任意奸淫、毒打、與殘殺。村民隨後把他們的地下室通連起來，直到全村莊都變為一個像兔子窟窿樣的隧道。但當日本鬼子重來的時候，他就把全村包圍起來，小心搜尋每一進口，用火，煙與水，把人民趕到地面上來。於是有幾個村莊召開會議，決議把每一個村莊的隧道系統和另一村莊接連起來。這是一件吃力的工作，但如果牠真能把他們從日本人的屠殺中救出來，牠仍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

因此，在河北中部，今天存在一個令人驚奇的隧道系統，把周圍幾十英里的幾百個村莊連接起

來，其建築規模之大，足使紐約地道的系統，和牠來比較，真如小巫之見大巫。隧道是非常廣闊，足夠躲藏全部人民及他們的牲畜與財產，並且還準備着充分的食物與水，以防長期的圍困。

當日本鬼子發現隧道是以直線從一個村莊，通往另一個村莊的，他們在田野中間，掘了橫斷的壕溝，以達到切斷和暴露這些隧道的目的。這樣他們能夠把一個村莊和他的鄰村孤立起來。

在平漢路上的保定以南卅英里的北唐 (Pei Tang)，日本人決心要給隧道的戰士一次教訓，以使他們永不會忘記。截斷了一條半英里的隧道，他們在牠的兩端用唧筒打進了瓦斯，悶死了八百個村民。不屈服的河北中部村民，又計劃着新隧道的圖樣，隧道以斜七歪八的方式建築起來，或高或下；牠們用通過以防不測的進口方法，和完全獨立的隧道系統的支綫連接起來，這些支綫高度不同，通向於各方面。一切的進口上，都裝着簡單的防毒氣的設備，並且對隧道系統的任何一部分，都作有準備，使牠們能夠防護敵人的進來或顯露在敵人眼前。

到了日本鬼子能強行走進了開着口的那個地道的時候，他們走進了無數的陷穽。在單人行列中爬行通過狹隘的地道洞口的時候，一個日本鬼子很可能觸發一個埋藏的地雷，或者墮入一個多尖釘的陷坑，或被一個揮着大刀的莽漢把他的頭砍掉。有時，全隊的人會被誘進一間廂房中，在他們後面落下了一座隔開他們的障壁，來使他們入圈套。隨後，就會有人拉藥線，使地雷爆發，或對四無通路的地下，投一個手榴彈。

『聽我說，』我插進去說，『我也許是最好不要寫這些事件。日本鬼子可能得到這一情報，對於你們在晉察冀的朋友不利的。』

老王嗤之以鼻。『不要緊。牠無論如何不會對他們有些益處。此外，我們實際上有好幾十種的不同隧道種類，及幾百種的不同誘人的陷阱。因此，胆大吧，寫任何我們告訴你的事。』

他停了一下，當我暗中把一張新稿紙交給我的打字員的時候。我問他以前可曾見到過一個打字員。他搖一搖頭。『我不過是一個鄉村的蠢漢。我對這些現代的新奇東西，一竅不通。』他隨後像是出於一個回想似地接着說，『雖然我却曉得一些打日本鬼子的事。』

他並不是吹牛。他並不重視那樣的技能，任何有普通頭腦的人，都能打日本鬼子——這是他所想說的意思。

隧道是對日本鬼子的一種挑戰，他們會想用各種方法打進隧道之中，或驅逐村民到地面上來。被捕的人民用刺刀對着，押着下去觸發埋藏的地雷。但下面的守衛人却學會了在地雷上用保險機預爲防備，當日本鬼子跟在俘虜的後面的時候，地雷受着距離很遠的控制，以使它可以爆發。如果僞軍被迫跟在俘虜後面下去，如果願將槍繳出的話，也可以赦免他們的性命。防衛的人關於這件事有着了解：在比較尚未開闢的隧道口上，在下面的守衛人，能夠從走下來人的鞋子上，辨明是友是敵——赤腳或穿草鞋的人，證明是一個被捕的村民，或一個僞軍，他方面，一個穿皮鞋的，定然是日本鬼子。

由於每一小部分的食物，每一小部分的燃料，每一有些價值的東西，都拿到地下去，日本人燒毀房子覺得並沒有什麼意思。不但此也，他們並且不敢遠離他們的據點，因爲在任何時候，八路軍的正規軍或隨地都有的遊擊隊，會突然集中起來出現。（在中部河北人口稠密區的幾千名八路軍，日裏住在隧道中，夜裏出來進擊附近的日本據點）。

日本鬼子想用一箱瓦斯綁在豬尾上，隨後用火油澆在他的背上；他們於是在這上面點着了火，縱這個嘶鳴的豬到地道下去狂奔。但村民僅在地道底層上面掘一條橫的水坑，把豬淹死，中和了瓦斯。自然，每一種對抗的方法，只有在日本鬼子想出了新的惡毒詭計，犧牲了好多性命以後，才有新的對抗方法想出。

日本鬼子曾有一次想用好萊塢的驚人表現來對一區的隧道，實行長期圍困。他們隨身帶一個留聲機，裝着一個很響的放聲機，由一位自殺隊員在開着，奏着一種卡車來來往往的聲音的片子，使地下的村民覺到他們的村莊仍被佔領着，上面仍有着大量軍用車輛在開駛。幾天以後，村民注意到移動的車輛的聲音，有些奇怪，牠有沒有那伴同而來的震動，這震動應該在下面隧道中感覺到的。走上地面，村民發現了這一詭計，捕捉了日本鬼子，現在用這座留聲機，供村莊的娛樂之用。

『假如我說給你聽，』王提議着說，『在大丘地村 (Taourit) 的戰爭，你不願意聽。那是村民所打的永遠打不完的人民戰爭中最能代表的幾十次的仗。』

『自然極願意，』我熱烈地說。

## 第十七章 大丘地之戰

老王點了一支香煙，吸了一口他的滾燙的茶，開始說道。

離開河北省會保定三十英里高陽縣中的村民，在他們完成了他們的隧道與其他防禦工事以後，對日本人特別採取反抗姿態。日本鬼子爲決意禁止這一表現，派了一個實力雄厚的討伐部隊，由旅團長山本率領前往。（老王不曉得他的日本音的讀法；「山本」，據他解釋，是日本那位將領的兩個中國字姓名的讀音）。

「山本最初設立他的總部於以前府城所在的高陽縣城內。隨後有一天，他帶領了三百人，開往離縣城六英里的大丘地村。村民動員了他們的民團——約二百人——準備對付來攻，他方面，村中其餘的四百家則交與地道作戰的人指揮。

「民團的指揮人於是先檢閱一下村莊的防禦工事。有着兩尊木砲，對準着四條通往環繞村莊的低的泥牆的每一口上。一切通往村裏面的大路與小徑，都佈了地雷。街上也埋了地雷與誘人的陷穽。當他發現一切都整備完竣，覺得滿意的時候，這位民團總指揮，駐紮於最高建築的屋頂上，指揮戰爭。他用一面鑼發號施令。打一聲鑼表示「北門緊急」；兩聲鑼表示南門緊急；三聲鑼，東門緊急；四聲鑼，西門緊急。他下令除非日本鬼子至少要抵達到五十碼以內，是不准開砲的。



網礙障的人敵過通

山本小心地走近了村莊，對於毫無動靜表示疑懼。他排開了他的士兵圍困村莊，隨後，經過了一度躊躇以後，他下令同時進攻四門。民團總指揮敲他的鑼。地雷爆發起來——大砲開出去——手榴彈如雨點一般地丟下去。那是一次空前的爆炸！當煙霧澄清了以後，山本倉皇敗退，留下了幾十具屍體。」

老王點着了另一支煙。「我們第一次認爲我們已經打死了山本本人，但我們後來却失望，發現了我們所打死的不過是他的軍官。」

「你說的是「我們」麼？你參加那次戰爭麼？」我問。

「啊，我想到了，我忘記提起那一點，我怎末不是呢？」他微笑着說，有點兒窘——他並沒認爲這件事重要。「是的，我剛巧在那兒——我是那一區的政治指導員，你要曉得。」

山本，既憤怒又恐懼，召集了他的被逐退的殘餘兵力，發出了一道請救兵的緊急文書，他決意要把這座村莊化爲平地，以便洗雪他的恥辱。當救兵開到的時候，隨同帶來了砲隊，他圍困了村莊，尋找一個可以安置他的大砲的地方。北門外很安全的小丘上的村莊墳地，看來是最好地段。

「但我們已在那座墳山上埋下地雷，以防萬一有這樣的事發生，」王嘻笑地說。「山本更變爲狂怒起來，當他在籬笆的柱子上看到了反日標語的時候，他下令立即把他們撕毀。當一個衛兵走向前去，他所觸到的第一棵籬笆柱子，炸去了他的兩手，炸死了他及其他兩個人。可是山本暗中似有神助——他只被擊倒而已。」

如果山本在這以前已經是激惱了的，到了現在，他更憤火中燒了，他按置了他的大砲，命令發出

一排催淚彈與瓦斯彈，向村莊射擊。

『可是我們以前對於這種瓦斯彈，稍有經驗，我們發覺大蒜和冷水大大地減少他的對我們的效力。不過當一個團丁受不住瓦斯後，我們把他送到地道中去，叫一個地道守衛者上來代替他』。

在同一時候，打仗的消息已經用暗號通知周圍的村莊。離開兩英里的吳原 (Wunin) 村，派遣了他的團丁從隧道中前來；蕭汶 (Shawwan) 和南濟 (Nanohi) 的團丁也到來。當全部時間都從事遊擊戰的有力部隊突然出現，攻擊山本的後面的時候，日本鬼子遂逃竄。『我們從這一次仗中，奪獲了一百支以上的步槍，』老王滿意地說。『可是稍後從戰場上搜集到的銅盔，並不像以前一樣，分配開去，作為炊飯鍋子之用——我們把他們交給遊擊隊，作為他們在「麻雀戰」之用。』

在這一仗後，村民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們斷定日本鬼子一定要再來收斂他們的死者，這些死者的靈魂不會安靜地長眠，如果屍體不好好地埋葬或火葬。因此，屍體裝上了大車，送到離開二英里的地點，整潔地堆在路的一旁。在屍堆之上飄着一面旗，寫着這樣的字：『如果你們要保留狗命，不要再來。我們這次對你們客氣，把死者送還你們。下次我們就要把他們餓狗。』隨後，為緩和這一影響，在一邊插上另一面旗寫着：『你們這些兵士，回到國內去也是農工。你們為什麼打我們呢？我們願你們不受損傷。我們只要生活在和平之中，和你們和全世界和平相處。』

山本把他的兵士開出高陽城來，靜默地搜集了他的死者。不久以後，他從那一縣調開，大丘地就不再受到攻擊。

有好幾回，自從王提起了『麻雀戰』後，趙芳就想插嘴。這時，當王停下來啜另一口茶，趙芳開

始熱烈地告訴我關於他的朋友王明 (Wang Min) 的事，王明的父親，在北唐隧道瓦斯的戰中喪命。北唐留存下來未死的犧牲人的家屬，組成了『白衣團』(白色是作爲戴孝之用)，遊擊隊的一個特別團，誓對日本鬼子報仇，王明也是團中的一分子。一天，他認出了漢奸之一，他曾把北唐隧道系統的祕密賣給日本人的。這位漢奸住在近日本據點的圍着牆垣的住宅內。王明，不畏縮底，一天晚上偷入了漢奸的住宅，用手槍對着他，把他俘虜。漢奸帶到縣政府審判，判決槍決。所不幸者，在此不久以後，王明被日本鬼子逮捕起來；曉得他被捕必遭不幸，他脫出了他的束縛，用拚命的力量，逃出了獄卒的掌握，奪取了衛隊的步槍，用刺刀刺死了他。天剛亮的時候，他逃到附近屋頂上，被人發現。遂被包圍起來，他勇敢地對打着，直到中午的時候，殺死下面好多日本鬼子與僞軍，然後才用他最後一顆彈自殺。

『白衣團』繼續騷擾敵人像一羣狂怒的大黃蜂一樣。他們所創始的一種戰法，變爲很出名。這就是『麻雀戰』。像麻雀一樣，他們到處存在，這兒隊去了一個日本鬼子，那兒隊去了一個僞軍。一個在開拔中的日本鬼子隊伍中的落後者，會被走在路上誠樸的老百姓手中的刀殺掉。從埋伏着的人發來幾槍，會殺死二個人，傷了三個人，隨後埋伏者散開，以使無復仇目標可尋。

麻雀戰的一種改進，就是環節蚯蚓戰 (Segmented Worm Warfare)。一隊埋伏打下，當日本鬼子恢復了第一次受驚後，他們在路上開始追逐埋伏者。埋伏者，不被覺察的，在每一個他們所經過的村莊，留下了幾個人。不久以後，追趕的日本鬼子發現他們是在作無效的追趕，雖則每一個村莊上的老百姓都明確地告訴他們說：『他們剛過去，向那一條路。』不獨此也，在他們回轉來時，他們又將

遭到集合起來的環節的埋伏；這樣，把戲層出不窮，直到日本人聰明起來不再上鉤，始告終止。

有時遊擊隊把他們自己化裝成鬼子或偽軍，大膽地在公路上進行。有幾次是一打以上的人這個人穿着偽軍的制服，二十個人穿着鬼子的制服——通常的人數比例，大都是這樣的。他們進行了好幾英里的路，收拾了一切在路上所遇到的鬼子與偽軍。受嚇的偽軍通常不發生問題。日本鬼子很快地被解除武裝，剝去了衣服，口中塞進東西不使發言，和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像煞他們是囚犯。同時別的遊擊隊沿公路藏着，準備援助這一縱隊，如果牠突然遭遇着一隊實力雄厚的敵軍。這一詭計的目的，是在截取帶文書的信差，捕捉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地方的重要偽官，劫奪搬運的物資，搜集武器，彈藥及藥品——一切都以極小代價來獲得。這種偽裝的遊擊隊都有着暗號以證實他們是自己人，以便不致爲自己人攻擊——舉例來說，如把步槍定期地向空中舉二三等等。

『我過去和這樣的一個排在一起的時候，』趙說，『我們遇到一連串的卡車從路上走下來。我們叫他們停下來。他們被證明是屬於一個偽縣長，帶着大量有價值的載運的東西，受着三十個鬼子與偽軍的護送。看到我們的日本旗，偽縣長從車上下來，開始叩頭。他說，他爲了公務，往漢城（Pohun）去。我們說，我們要檢查一下貨物。對這點，護衛有些疑心起來。發生了一次戰鬥，但護衛兵不久就從路上逃走。在援軍開到前，我們已經奪到了貨物，散開去了。』

另一個簡單而陳舊的有一時期運用得極好的詭謀，就是這樣的一種。一隊偽裝的遊擊隊，出現於日本據點之前，護送着幾個被縛縛的犯人，說他們是八路軍的士兵。不疑心的日本鬼子讓他們走進

去，立即發傳們消滅，礮堡也被毀掉。有一時期，日本人時常特別仿效別人的舉動，偽裝着八路軍，以便探出村莊中同情八路軍的人。不過牠從不生效，因為村民立刻察出他們，大大地對這些『不受歡迎』的八路軍辱罵一番或丟石子，來尋尋他們的開心。

當日本人發現村莊的戰士很少攻擊偽軍，節省了他們的地雷與寶貴的子彈來打日本鬼子——他們遂和偽軍調換制服。但當偽軍走過村莊的時候，村民問他們要不要喝茶——自然，『偽軍』立即可以辨認出來他們是日本鬼子，不問他們回答與否。此外，真正的偽軍——穿着危險的日軍制服的——就不得不宣佈他們的國籍。

『如果縱隊離開一段路，你怎末會察出制服已經交換過這一事實呢？』  
『容易的——日本鬼子決不能偽裝他的蹣跚的弓形的兩腿的步行姿態。』

爲欺騙永遠在察看的村民，使他們不曉得他們的人數，趙說，日本鬼子常常派遣着卡車，載着礮堡中的『援軍』，以便受到路上地雷的夾擊。一輛通過的卡車，似乎滿載着人，實則只不過半打以內的活人在裏面——其餘的都是橡皮人。當卡車到了礮堡的時候，這種打了氣的橡皮人祕密地把氣放掉，空卡車從村莊中開回去，這算已按察下了牠的『援軍』。趙告訴我，村民對這種孩子玩的把戲，極感興趣，時常有些狙擊兵很輕蔑地會對這些橡皮人費掉一顆寶貴的子彈。

日本鬼子也用木砲。不過這些都是假貨。上面蓋着防雨衣，牠們兜來兜去地拖着，以欺騙八路軍的情報組，使他們對日本軍器估量得過高，偽裝的大砲有時拖到戰場上去，按在真砲旁邊。放滿着石子與石塊的箱子與板條箱，上面顯著地寫上子彈兩個字，常常公然地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地方。

心理戰，或神經戰，王與趙兩人都說，華北村民也大量運用，並且用得極爲成功。一件永遠成功的計策是放出八路軍移動的不正確的謠言——這些謠言更由授與那些爲人知道的敵方間諜說這是『秘密情報』，而更有力量。舉例來說，一個日本間諜，據人報告說，接到密報，說人民準備貯積食糧，供應（神祕的）八路軍的集中；有時村民會用巧妙的藉口來強調這一偽造謠言的可靠。日本地方官吏就會提出緊急要求，派遣援軍，這樣一來，把他們上級官弄得六神無主，調派軍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當日本援軍到達以後，他們衝到這裏那裏去搜索八路軍，由村民頭腦清楚地領着他們前進：說『他們剛離開這兒』。『他們從這一條路走的』。『他們從那條路走的』。一個像日本那樣的強國，她利用着漢奸與傀儡，却特別在這樣姿態的戰爭中，有懈可擊。

同時，爲做出了虛張聲勢的恐嚇，村民吹着號角，穿上從遠處看上去像八路軍的制服，身上帶着短槍，肩上荷着大口徑槍，開來開去——使擔心的日本鬼子從他們的雙眼望遠鏡中瞭望，相信八路軍真地集結了兵力。

特別在夜間，神經戰更獲得顯著的成功，幾千處的日本據點與碉堡，真被村民包圍起來。在外面黑暗中進襲的，也許只是少數幾個人——但日本鬼子却不能對這確切知道，爲此寧願就在他們設防的有掩蔽的營房裏面。有時進襲者放一掛鞭炮，混和着幾聲步槍的射擊，使日本鬼子相信他們是被真正的槍火攻擊。有時，日本鬼子會以瘋狂的排槍來答覆，盲目地向黑夜中開火。當他們的砲火平靜下去，更放幾次真槍又會引起同樣情形的重演。或者把少數幾隻狗拋進了圍繞碉堡的壕溝。牠們的亂跳亂蹣，牠們的竭力爬滑溜的圍牆，會引起進攻部隊猛襲碉堡的印象，擔心的日本鬼子又將開火。天明

到來，神經緊張的日本鬼子才發現這種詭計，因此在相當的時期不加理會，於是遊擊隊指揮人會偷偷地上來，真正地攻擊這地帶，予以損害，然後再退去。

有時人民會和八路軍的正規軍積極合作，進攻較大的據點。有一個圍困了二十八天的地方，經過村民首先小心地把一切通達的公路都埋置了地雷，阻止援軍的開來，再把幾里路內的狗搜集起來，殺掉牠們，把屍體沿堡壘放着，最後終加以佔領。因為在夏天烈日之下，狗的屍體很快地腐爛起來，把據點籠罩着非常強烈的臭氣，結果使日本鬼子被迫放棄他們的堡壘，突圍而出，遭到慘重損失。

「現在你可願聽一些關於我們海軍作戰的經過麼？」老王帶着十分鄭重的態度說。

「你意思是說水戰麼？」

「是的——在水上的戰爭。」

「好的，讓我們有機會聽一聽！」

「好吧，他是這樣的……」

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天，在北平的日陸軍大本營，下令禁止離北平五十英里左右的北洋淀 (North Bay) 湖區的村民打野鴨，這一種鳥每年有大量的數目羣集在那兒。當村民拒絕聽從命令，日本人派了一隊特製的汽艇與汽船警衛這淤淺的湖沼。

村民爲了獵野鴨，產生了一種大的「拾槍」——十英尺長的管狀的武器，施展起來，像一尊土砲，開出去的散彈，爲一磅左右的碎金屬。這些東西現在也被拿去供軍用。村民藏在湖岸的蘆葦中，

對開過去的汽艇射擊着。在二三十艘這些汽艇被沉擊或受重傷以後，日本鬼子變爲狂怒起來。在湖沼的中央，他們建立了一條巨大的浮筏——一座真正的戰艦——密佈着機關槍與設在甲板上的大砲。在上面高橋樑眺望台上的偵察者，用強大的兩眼望遠鏡，偵察岸上。當看到蘆葦中有一些搖動，機關槍與大砲，即行開火；或者，如果射程太遠，那末在鄰近的一系裝甲汽船立即派出去偵查。

由於日本鬼子採取這種戰術，於是用抬槍狙擊的湖上居民只在夜間出來。戰艦上的探照燈後來無法在蘆葦中找到他們，他方面，用舊釘、破鍋鏟、生鏽的器具，犁頭等等做砲彈的射擊，繼續掃射到戰艦的甲板上，或兇猛地轟射牠的四邊。當鄰近的禾稼成熟的時候，幾千個村民一夜聚集起來，悄悄地把開堤防，讓水放進到田裏面去。到了天亮，日本人吃驚地看到水面大大地低落。他們匆忙地把戰艦上的砲與器械擄走，用汽船從湖中通外面的水道中逃往天津，要不然，他們就要擱淺下來。在他們離開前，他們縱火燒掉戰艦，這一景象爲幾千個心裏快活的村民見到。他們在岸上排成行列，嚷着，跳舞着，拍着手，像一羣高興的孩子。當堤防修好了的時候，湖水又滿起來，野鴨也回轉來，村民再行有自由用他們土製的抬槍獵着野鴨了。

## 第十八章 河北的女英雄

湯成國 (Tang Cheng-Kuo) 不過二十歲的年紀，可是她却是晉察冀邊區南宮 (Nankuo Hsinu) 婦女自衛團一千五百女英雄的指導員。她曾被召赴延安受特別政治訓練，這樣，我才能和她長談河北中部女英雄的好多活動的情形。

湯成國毫無特殊之點。她是一個矮小的女孩子，有着蓬鬆的短髮披在三角形的臉上，有着整齊的牙齒和堅定的棕色眼睛。穿着簡單的上衣與褲子——已經褪了色，但却整潔的，袖子捲着，胸口掛着一枚鏤鏤做的有毛澤東肖像的徽章，她幽靜地說着話，帶着爽脆幾乎類似喊口令一般的語聲。她是一個十分自重的女人。

『只有近八百個的我們的女孩子，是你所能稱爲女戰士的，』她說：『她們是從我們村莊中未結婚或無子女的婦女當中招募而來，年紀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我們武裝起來，訓練着使用步槍、手榴彈、及地雷，並授以軍事的知識。有時我們自成一單位和敵，單獨作戰，但大部分，我們和遊擊軍及八路軍的正規軍配合。』

年齡大一些的婦女則受情報活動的訓練，教導她們怎樣看護傷兵，授以可稱牠爲一個軍隊中的家事責任。在打仗期內，她們是抬傷兵者，食糧及子彈的搬送人，偶然她們也打仗。

湯成國的女戰士們也不是督察黨中唯一的女戰士——像她們一樣的，更有好千個人，組織於地方部隊以內，彼此間不十分有聯絡。這些團體，自然不被當爲流動部隊，她們的工作，主要地是在保衛她們的村莊與家室。在平靜的時候，她們在村口站崗，或防衛十字路口，檢查一切經過人的通行證。在日本鬼子到來後，女孩子們和遊擊隊，民團及正規軍聯合起來作戰。她們伏擊鬼子的運輸，狙擊鬼子的縱隊，從牆上和屋頂上向他們投手榴彈，當敵人走進了村莊的時候。

她繼續靈活地講述下去，用她的兩手做着富於表情的姿態。

『每一年，通常是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左右，我們召開着共通策略商討會。從各縣村莊上來開會的女子，帶着她們的武器及足供十日用的食糧。開會的地點，自然是祕密的，並且每年更換地點。在我到延安前由我任主席的最後一次會議是在敵人最近的據點四英里以內，離開平漢鐵路，只有十英里。』我們總設法草成了某種實際問題的方案。在目前的時候，我們的問題是毀壞日本人在牌樓(Pai' h.)與安國(An Kuo)間離開約二英里的據點的交通。並且，如果需要的話，我們也準備作戰。首先，我派了幾個偵察員去探出在每一個據點上有多少日本鬼子。他們從附近的村民獲得了這種情報。偵察員一對對地出發，一個人留下來偵察，另一人帶報告回轉來。』

我給她一支香煙。『我從不抽煙』，她微笑地說——我揣測她所說的話的真正的意義是『我沒有時間想到過這樣的事』。隨後她繼續講她的故事。

『在還沒有給她們命令以前，我促她們注意，並且告訴她們，這次行動完全出於自願的。四百三十二出席人當中，除開五個人外，一致立即舉起了手。五個沒有舉手的人，有着輕微短時可癒的傷，

願意爲這一營人擔任炊事。我草擬了一個計劃。第一，我選拔了二十五個女子偵察每一個互相毗連的據點。』她對兩個據點，作了一次長而正確的描述。每一個據點，剛巧位於村莊的外面，包括着幾座圍着高牆的碉堡。牆的頂上佈着碎玻璃與鐵絲，牆的外面，是一道闊壕溝，壕溝是下闊上削，因此，牠是很易跳進去，而很難爬上來的，因爲兩岸突出的原故。這兩個據點，是每一個由六十個日本人和同樣數目的偽軍加以防守，這兩羣的人住在圍牆內兩個分開的兵營內。

這兩據點中間的公路是兩旁都開着深而闊的溝，沒有小路或大路讓它和公路交叉，只有在防衛者槍口的射程所及的一段是例外。公路本身是築成比田野高上三英尺，田裏面禁止種高的五穀如高粱、玉蜀黍等類的東西，因爲這些穀物可以供躲藏遊擊隊之用。駐屯軍從鄰近村莊取給他們的食糧、燃料，與勞力而不付錢；有時還要女人。村民被勒令每天報告消息，特別關於任何八路軍出現或到來的消息，並且時常被威嚇着，如果他們不真實地報告，則將殺盡一切居民。這些條件，自然，只有在日本人槍口射程所及的村莊中才辦到。

講完了兩座小型的堡壘以後，湯成國繼續講述她的故事：『靠了我的哨兵站崗下來通報我們，敵人是否從他的據點出來，我隨後把我的女孩子們分成一打左右人數，小隊，分配給她們各自的任務。有些小隊砍倒電柱子；別的小隊則繞起電話線，把牠拿走——日陸軍，你曉得，供給我們充分的電話線。還有其他小隊則被支配開壕穿過公路，他方面，則更有其他小隊埋置地雷，誘致援軍入彀，這些援軍，一當交通被切斷發覺以後，即可能出現的。』

當我們完畢了我們夜間的工作，我們向前爬達兩據點，放起爆炸，把手榴彈拋過牆去。日本鬼子

引起極大騷擾，開着機關槍，但他們的開槍，最大的原因，是由於他們受了恐嚇。」

女孩子們第二天早上慶祝她們的成功；正當她們準備分散開去，回到她們的村莊，消息傳來，說一大隊的八路軍開到。當那一大隊的將領聽到女孩子們所完成的事，他立即決定伏擊日軍，日軍一定會從他們的營房中出來，以便修理上一夜的損毀。

『我問將領我們是否要參加他的隊伍。他說我們人數太多——我們只會礙手絆腳；但他能讓五十個人一同去。因此我們抽籤，抽中的五十個人，拿去了一切紙條或其他足為證明身份的東西，以防萬一被殺或被捕時，可以供給敵人情報——這些報紙，會被用來討伐我們本村之用。於是我們被派守在離公路不遠的墳山後面。我和將領想了一個計劃，證明收效很大。——縱隊的日本鬼子走下公路來。我們等待着，直到他們十分接近——於是我們投擲了我們的手榴彈，狂呼起來，衝往田中去。日本鬼子發出了歡呼，開始追趕我們，希望活捉我們——直接奔往在等待的我們八路軍的機關鎗陣地。二十一個鬼子被打死，然後一小隊人才恢復神智，不顧一切地奔回去保護牌樓的據點。』

在這次仗後舉行的一次會議中，八路軍將領讚美女孩子們在火線下的勇敢，用四顆手榴彈送給每一參加作戰的人，作為獎賞。附近的人民聚集起來，送給她們大堆的禮物——果子、花生，及鄉村製的茶食。日本鬼子拉起吊橋，在這以後有三天就在他們的據點內。

但，湯女士告訴我，像這樣的任務與軍事行動，並不是女孩子們所擔任的唯一的工作。她們也在別的方面幫助工作，這些工作，也許軍事性比較少些，可是當然也是同樣必要的。在一個碉堡系統的鄰近地帶，日本鬼子有時為欲捉捕八路軍或政治『過客』，結合起來，在日間，或晚上，對一個村莊

搜劫。在據點的附近，時常是不大容易建造成隧道防禦的，爲此，應該找出別的方法來應付這種緊急問題。目前，不問什麼時候，一有這樣的過客到村莊中來，他立即向地方領袖報到，他派定他到一家人家去，從此以後視爲那一家的一分子，在村莊上有着他的親屬。這須有充分的演習——對這方面防禦的女孩子們有着責任——直要等到連孩子們都能毫不躊躇地說，『那是我的叔叔』，或『堂兄弟』。尙未寫成的戰爭史上，充滿着由於這種練習而產生的意外事，與預謀應付的危險與壓迫。

舉例來說，橋店村(Chiootenahan)在日本人的某次搜查中，爲他們佔領。突然，有一個未曾預料到的遊擊隊送信員走進村莊中來——立即被捕。但他嚷道：『爲什麼捉我呢？我來這兒不過是看我的姑母呀。』一個聽到他說話的老太太立即會意。『我的姪兒！我的姪兒！』她喊道，當她跑向他的時候。隨後，轉身向捕捉他的人解釋道：『他是我妹妹的第三個兒子。放開他呀！』日本鬼子遲疑不決。另一女人跑上來問：『呀，他們對你的姪兒幹什麼？他幹了什麼錯事麼？』這一來，把事體弄得可靠，日本鬼子踢他一腳放了他，並且對他下一警告說，行動不要這樣不當心。

這樣集體安全的表現，時常寫成戲劇，出演於全華北的鎮市鄉村中。我想起，我親見到這樣一幕戲，這給我深刻的印象，雖則牠是強烈與十分可怖的一幕。這一齣戲只包括一幕佈景，很快地用有格律的語言發表出來。在這一劇裏面，日本鬼子有理由懷疑一個八路軍的軍官藏在他們所包圍的一個村莊，但每一個在那兒人都有着一個令人相信的說話和沒有可疑的身份證，日本軍官絕望之餘，抓來一個少年，開始拗他的手臂。

『誰是在這個村莊中的八路軍的軍官？回答我——回答我，要不然，我要拗折你的膀子！』

少年大聲嚷着痛，但拒絕說出來。他的父親被帶到前面來。「叫他說出來！」日本鬼子的軍官憤怒地尖着聲音說，把指揮刀的尖頭放在他身旁。「叫他講出來，要不然，我們就把你兩人都殺掉。」到這兒爲止，少年開始軟下來——爲此父親奪過了軍官的刀，殺掉他的兒子。隨後當他轉身向軍官時，衆士兵們用他們的刺刀把他刺穿。

在這幕短劇結束的時候，沒有喝彩——對於那一羣觀眾，這是太真實了，不能僅當爲娛樂來觀賞。我們承認，把這樣情節來使之戲劇化，可以在普天之下每一個民族的作曲法中發現有這樣的描寫。但是這兒的華北荒涼的羣山中，一個殘酷的侵略者與一個反抗人民的衝突間，却實際上是每天在發生——就在目前，當這本書被你們在讀的時候。我所描寫的戲劇中一個奇特的情態，我承認，我不能對自己解釋得滿意地：這一殘暴的日本軍官由一真正的日本人扮演——他是日本解放同盟的一個會員——起勁地以戲劇本色演出。我在這兒發現一個心理學上奇特的問題。

## 第十九章 新四軍

對共產黨所組織的抗日根據地的性質與範圍，沒有最低限度的知識，是不能對於中國的政治與軍事情勢，有明白了解的觀念的。不過，第一，把握這一事實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日本人的佔領中國領土，在其安全的充分上，任何一方面，是不能和納粹佔領的歐洲好大部分相比擬的。不問什麼地方，中國人一經組織起來，他們就積極地或消極地抵抗。在延安最引我注意的，就是這種組織的意志。當一旦抵抗業已組織成功的時候，中國廣大的區域，就是成爲對於日本人的——一個難以容受的問題。

因此，日本鬼子所謂『被佔領的華北』，大致可以分析成下列的幾種地帶！（一）實際上被佔領的區域——那些在日本據點內步槍射程所及的區域，這些據點，在華北人口稠密的部分內，是建築於一個或兩三個村莊之中。（二）抗日根據地——完全在中國人民控制下的區域，有着他們的民選政府。這些區域，在牠們裏面，八路軍的正規軍有着他們的流動的中心，只有日本鬼子，在他們定期的掃蕩戰，或當他們和八路軍及其協助的組織交戰的時候，才被強制進入的。（三）在上述第一和第二地帶間的無人地帶——這是真正的遊擊區。

在華中的抗日根據地和華北的那些根據地相同，這些根據地裏面，晉察冀是典型的。我們因此可以認華中根據地，在總的方面，是和新四軍的故事有着關係的。

自從他的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創始，有了一萬二千個過去的遊擊隊以後，新四軍已經發展到超過十八萬受過訓練與穿着制服的正規軍，擴張他們的保護勢力，幾及他們的在活動的華中區六千萬人當中的三千萬人。在他的存在的六年中，這個軍隊已經打過了一萬七千五百次以上的仗，曾經抵抗過敵人所發動的一百二十次的大的掃蕩戰，死傷了二十四萬以上和俘虜了三萬四千以上日僞軍。他的鹵獲品包括十二萬四千支步槍及小兵器，二千六百挺的機關槍，和一百尊大砲。損失的數量，軍官與士兵的死亡者共達四萬五千人，受傷者共達六萬五千人。

不過根據重慶的說法，新四軍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以後，就早不存在了。那時究竟發生怎樣的事完全不清楚。共產黨說新四軍從中央政府最高軍事當局接到命令調防江北。他們堅持地說，他們是在忠實地履行了這一命令時，突然遭到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一萬新四軍被殺或被俘。新四軍總司令葉挺被捕監禁，至今仍未釋放。當新四軍被官方解散的時候，他的殘存的分子到延安請示。從他的行伍中，選出了一個副司令，他仿照八路軍的規模改組了新四軍，他們繼續在後方既抵抗日本軍，又抵抗中央軍。

這兒是一節蔣委員長關於皖南事變的談話：（註）

『新四軍的行爲，他的不奉命令，攻擊友軍，甚至叛變與怠工的舉動，遂不得不加以解決；這純粹是一件執行軍法的事件。決沒有一絲混有屬於政治範圍或黨派關係的意味在內。……』

在十一月（一九四〇年）中，新四軍由最高軍事當局命令北開至某一指定的區域與敵交戰。他決定抗不奉命，但等待着，直到限期終了以後，隨後，擅自南移，達成了一次蓄謀的策動，致在光

天華日之下，進攻第四十師的總部。這種顯然叛變的行爲，爲維持軍紀，實有予以解散的必要。……政府去年只限於嚴加申斥，促新四軍不要再做出時常抗不奉命之舉。不過牠固執不從，不改變牠的故態，最後越出一切常規。形勢發展到了某種程度，勢必有採取嚴峻行動的必要。

我對此事極爲痛心與感到恥辱，由於下屬的錯誤與不能盡職的出現於他們統率的將令的前面。我個人感覺應付這次不愉快的事件負責，在這件事裏面你們任何人都沒有可遺憾的理由。……

你們所有的人應該想到新約上的饒恕人到七百七十次的教訓。新四軍的罪行甚至超過此數；如果我自己不變爲犯罪，疏忽了我的爲國家盡力的責任，是沒有再赦免他們的餘地的。」

對於這一切——「都是胡話」！新四軍的副司令陳毅說，當我和他談話的時候。「唔，這簡單赤裸裸的事實，證明相反的是對的。誰打誰呢？誰殺誰呢？我們的人數既相形見拙，我們怎樣敢進攻呢？——聽好，是在「光天華日之下」——那證明足以消滅由我們的總司令率領我們的一萬最好的戰士呢？胡話！」

這時陳毅將軍剛來到延安，在路上走了好幾個月。他曾長途旅行，借道山東與太行山，越過幾十道日本人的封鎖線。他是一個肥胖的不整潔的一類人，年紀在四十初。生於靠近成都的一個富有的地主家庭，他在故鄉四川的一個高級工業學校讀化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赴法國留學，他在巴黎與里昂就了三年，準備進格雷諾貝爾(Grenoble)的電力工程學校。當他聽到北京政府與法國政府談判一筆以西甯的鐵路建築獨佔爲交換條件的大借款的時候，他和一羣中國學生結合起來提出抗議。在一次激烈的演說中，他責難這一由祕密條約所得來的借款是被北京用作鎮壓廣東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

之用的。由於這一次演說的結果，他被法國勒令出境。

他告訴我說：『這次事件對於我的一生有決定的影響。我從此明白，政府如一直在腐敗當中，在工程上求進步與努力是沒有用的。』

一九二一年，他回到四川，創辦「新學報」(China Ping Pao)於重慶。經過兩年的時間，他想藉他的報紙來促成社會改革，但他不能影響當地的軍閥。因此，他到北京去，加入了國民黨(同時也祕密地加入了共產黨)。不久以後，他到廣州去參加北伐。當勝利的革命軍抵達漢口後，他變爲新設立的軍事學校的教授。爲獲得四川軍閥的擁護，蔣委員長派他到重慶和成都去充任特別代表：他從這次出使回來後，發現國民黨一九二七年的清黨運動正在達到最高潮的時候。帶了他的幾千個左翼的學生，他逃到南昌，加入了紅軍爲牠的生存而作戰。但當紅軍在一九三四年從江西開始長征的時候，陳毅奉命令和一個自願軍的細胞組織留下來，以便和地方保持某種接觸及組織遊擊隊。

自然，繼續維持共產黨所倡始的土地與社會改革，是不可能的，除開在國民黨「清黨」勢力難以深入而不太有充分力量摧毀遊擊隊的山區以外。陳毅停留下來，強調共產黨與紅軍並不是被驅逐出了他們在江西的根據地，也不是故意放棄那兒的人民：『共產黨與紅軍爲了國內和平，爲了遭遇日本侵略的威脅日在增加的原故，自願放棄牠的在江西的根據地。』

一九三七年日本進犯開始後，對陳毅及其山中遊擊隊的壓力，由於討伐的國民黨軍隊調開至華北作戰而減輕。陳毅和他的下屬的將領，要求參加國民黨對日作戰。經過了冗長的談判，成立了一個協定，根據這一協定，幾萬個分散於華中八省的遊擊隊當中，只選出了一萬二千人，成立新四軍。這些

人被命令着在江蘇沿長江的上海南京區集中。政府，也同時——據陳毅說——允許對華中紅軍根據地的區域內的土地問題，加以解決，讓共產黨黨員參加地方政府，並予抗日的新四軍以給養。

『國民黨不履行這一切允許的條件，』陳毅肯定地說：『我們的答允對日作戰，是純粹出於自願的；我們可以很便當地留在我們的根據地上，無限期地堅守他們防止一切到來的人們進入。』

在他們開入沿長江一帶時，新四軍被挑選出來的分子，不准開入城市。雖然，却有無數的人出來，要求加入新四軍——據陳毅說，新四軍很容易招募到十萬人；但他們却被嚴格地禁止增加他們的人數。看來，政府似不要他們趕緊開赴長江前線的，因為，雖則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他們到了南昌，在那兒設立了總部，可是到了那年七八月後，他們最後才達到長江沿岸的上海——蕪湖——南京區。在軍隊中有八千人從南方來，另一部被指定的四千人，則於六月中抵達蕪湖對面的長江北岸。

『不過在這期間，國民黨的軍隊實際上已放棄了這一區域』，陳毅接着說，『各縣爲盜匪及僞軍所蹂躪，後者控制了地方政府與人民。我們的制服是茶褐色布做的——很像日本人的制服——人民，誤認我們是敵人，手中拿着日本旗走出來，跪在我們面前。他們曉得我們不是日本人後，非常高興。

『我們立即開始打日本人，僞軍，與地方盜匪。到了這一年的年底，我們的兵力已增加到三萬人——這一擴充，完全由於我們成功的遊擊戰。在漢口陷落後，日本人對一切中國軍隊，以感覺輕視，他們不大注意我們。因此我們發現很容易對他們加以出其不意的襲擊，有時在計劃周密的伏擊中，撲滅了全連的日本鬼子。人民看到我們的成功，很願參加我們的軍隊。他們特別高興的是發現我們的軍隊紀律甚佳。我們的軍隊嚴禁沒有得到人民的允許，拿他們的任何東西。在進軍時，我們總抱了

這樣的主張，首先把事件和村莊上的父老討論一下，然後才把我們的士兵住在人民的家中過夜。住夜的地方，在我們離開前，小心地打掃清潔與把一切東西照原狀收拾整齊。

『那末好多人請求參加我們的隊伍，有什麼奇怪呢？我們歡迎一切要打日本人的人。我們用從敵人取來的武器，武裝人民，訓練他們成爲人民自衛團。』

『當我們的兵力在人數上增加的時候，我們發現，把我們限制於最高軍事當局所指令的我們的活動的南京附近的狹小區域內，愈過而愈困難。不但此也，日本鬼子開始嚴厲注意我們，指揮實力雄厚的部隊進攻我們大集中的兵力。因此我們發覺把我們軍力分散，與滲入到日軍戰線後面，實有必要。那末，這一點也許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我們和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間磨擦之點，他們堅持我們須繼續集中於指定的區域——一個顯然易爲敵軍攻破的目標。』

約在這個時候，陳毅說，國民黨軍隊中有大量的人數投降於日本人。在這些軍隊中，有戴笠指揮下的忠義救國軍，這些人活動於上海南京區，直接受袁佐佩 (Yu Tso Pei) 的指揮。這軍隊的一部分立即參加了駐在城市中的偽軍；其餘的人則駐在城外的村莊中。

『用這用分散兵力的方法，他們能夠玩着兩面的把戲，並且可以安閑。日不必作戰，』陳毅攻擊他們說。『同時，我們新四軍則被命令着每十天中至少作一次戰。但不問什麼時候，我們進攻城市中的偽軍，戴笠就咕噥着說，「你們打我的軍隊」。』

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後，隨着漢奸汪精衛傀儡政府的建立，在何應欽 (Ho Shing Chin) 指揮下的戴笠部隊五萬人投降到日本鬼子方面去，在一九四一年，另有在李長江指揮下的五萬人降敵，因

此我們新四軍又必須對這些人作戰。由於這些新投降的傷軍十分熟悉地形，我們在打他們時，遭到更多的困難。」

雖然有這些情形，新四軍繼續增加與擴大他的影響與軍事活動。接着在皖南事變以後，中央委員會的軍事委員會在延安開會，派遣陳毅代替葉挺爲新四軍的司令。共產黨議決，新四軍是置於延安的朱德的最高軍事總部直接指揮之下。

在打新四軍的戰爭中，日本人曾用對八路軍作戰的各種方法來對付新四軍。他們的掃蕩戰慣常在收穫的時期後舉行，那時穀物已經收割，在平原上，新四軍很少或沒有掩藏的東西。『清鄉』運動目的就在剷除新四軍，使他們不能移動。日本鬼子說他們的掃蕩運動是像梳頭髮，而『清鄉』則像剃頭髮。

『反之，我們感覺像競技者在一個永不會完畢的比賽中一樣，』陳毅說。『因爲我們沒有後方根據地來給養我們作戰的必要物資，我們總得自動地找尋出敵人的弱點，以便進攻這些弱點，求得武器與給養。在戰爭中，我們大部分是在夜間進行，利用刺刀與手榴彈，因爲我們的武器是較差，我們的子彈是極端稀少。我們也用宣傳、傳單、吶喊運動，及善待俘虜，來對敵作戰。』

在隨同新四軍的遊擊隊在這樣的大城如上海、南京、漢口等城區範圍以外活動時，正規軍是駐紮於平均一天開到的地帶以內。他們保有的區域，直到離上海以北六十英里左右的沿江的地區，離南京二十英里的地區，與離漢口三十英里的地區。

『當反攻到來的時候，』陳毅說，『我們將充前鋒，恢復華中這三個最重要的城市。』他自然不

是說這可由新四軍單獨完成。『我們所能盡的最大任務——就我們缺乏武器與設備方面講——是繼續和敵人爭持下去。把他一舉而驅逐出去，我們需要和國民黨中央政府的軍隊，及我們盟友的陸海空軍的全力合作。』

（註）見他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所發表的國內外時事報告。

## 第二十章 內戰？

在我致力於估計共產黨對戰爭的貢獻中，我曾和朱德談話多次。第一，他說，就共產黨的觀點來講，這次戰爭不過是爲民族獨立及生活民主化的長期奮鬥的一個繼續——這一奮鬥開始於一九一一年  
的革命及推翻專制政治。

「在這一點上，我們今天的奮鬥和你們的革命戰爭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你們獲得那次戰爭的勝利，因爲你們的人民明白他們是在爲什麼而戰。而我們將獲得我們的戰爭勝利，因爲我們也明白我們爲什麼而戰。所不幸的，國民黨大多數的招募的軍隊，至少在目前，只是模糊地知道所爲何事——這無疑足以證明他們的繼續反覆無常的原因。可是我們八路軍及新四軍的自願軍和這有顯著的相反情形：他們是人民的軍隊，他們受人民的支持；在這點上，他們和華盛頓的自願軍相似。並且他們有創造性及戰鬥能力，這使他們能以正規軍的姿態作戰，並且也能以遊擊隊的姿態作戰。」

朱德表示，他曾對華盛頓的遊擊戰術，細加研究過，這一戰術，證明對於反抗武器較精的英國傭兵，非常成功。有着他的士兵，正如有着華盛頓的士兵一樣，把極端的流動性與和人民的密切的合作連合起來，曾挫折了一個可怕的侵入的敵人。被佔領的區域，當這些原則加以應用的時候，就不會一直被保持爲「被征服」的區域。巨大數目的日本軍隊被弄得精疲力盡，不能移動，爲了在他们自己的

前線的「後方」必須有時常軍事行動的原故。

「我們的八路軍及新四軍在武器及力量上無疑是比敵人低劣。可是好多日本將領怨恨地說，不問什麼時候他們對我們實行打擊，他們總是徒勞無功；但他們被我們的軍隊攻擊，他們却總被打擊得落花流水。理由是簡單的：通過人民的幫助，我們具有着有價值的情報，我們知道敵人的每一移動。我們和敵人接觸，只有當我們願意的時候，而在我們自己有利的條件下。當敵人派了大軍來攻我們，我們不站定了來抵抗它；但——這是最重要的——在這樣一個兵力前面，不獨不後退，並且前進到它的後方，相信在那兒的人民，會支持，保護與給養我們。可是當我們遭遇到少數人，我們毫不遲疑地立即進攻。」

「運用了這些戰術，我們是繼續地採取攻勢。我們繼續騷擾敵人，使他們沒有安寧或休息，以鞏固及剝削他的所得。好多日本軍官曾真地來對我們訴苦，說及他們所稱爲的我們的「非正統的戰術」。一九三八年，在離開太原約七十英里的大木橋（Tanchiao），日本駐屯軍和我們閃避的八路軍的一團小接觸，遭到好多次的失敗。這位憤喪欲絕的日本將領最後送一封信給我們的團長楊永（Yang Yang），向他挑戰，指定在某一日的某一地方，作陣地戰。「就我個人講，」日本人寫道，「我應該讚許你們的戰術；但他們是不勇武的——他們是卑怯與不明明的。你們可敢出來決一雌雄麼？」自然這不是我們從日本將領所收到的第一次或唯一的這樣信的例子；並且這樣的挑戰，我們自然也不理的。」

朱德告訴我，這樣的一次挑戰，也曾由近南京的日本駐屯將領送給陳毅。「我和我的新四軍接受

你的挑戰，」陳毅回信道：「但我們建議，爲了公正地決定誰是較優的戰士，我們須同等地武裝起來作戰。不但此也，我們應該請求中立國的代表來裁判。如果我們被擊敗了，我就帶領我的兵士到別一戰線上去，公開承認你們是較優的戰士。但是——如果你們被擊敗，你得帶領你的軍隊回日本。」對此日本將領卻沒有了答覆。

就技術上講，朱德接下去說，華盛頓將軍開始革命，反抗英人，用着手頭所能有的任何種類的槍砲。當戰事進展的時候，他的軍隊自己給養自己，一部分武器則奪自英人。八路軍與新四軍也是同樣情形；他們在軍事進展的期內，從敵人方面奪取武器。『在美國革命戰爭的最後階段，華盛頓從法國人方面接到援助，這一援助是通過英國封鎖線到來的。如果中國同樣從她的同盟國得到援助與接濟——尤其是把武器送給那些願意用牠們來抵抗敵人的人們——打勝日本不會長期的延遲下去的。』

假定，我提議說，這樣的援助，爲了某一理由，或別一理由，不立即到來，又怎樣辦呢？

『那末我們就不能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至少不是由軍事行動。缺乏現代反攻的武器，我們只能採取消耗戰，必須依賴別的因素來取得最後勝利。』

『你們特別需要什么武器呢？』我問他道。

講到這兒，朱德並不切實際地說到要求重砲、坦克、及軍用飛機，而就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供給步兵的武器，如好的步槍，輕重機關槍，及爲運動戰而用的射擊坦克的砲與野砲，以及炸毀碉堡、橋樑與火車的高度炸藥等。有了這些東西，我們能夠在不開什麼地方的運動戰中應付敵人，打敗他。』

不過朱德也承認，爲恢復現被日本人佔領的大城市，坦克、大砲與飛機的進攻力量一定是必需的。『可是我們自己不準備用這些武器——雖則我們熱烈地歡迎我們盟軍的兵員帶着與運用牠們來和我們的兵力協作。』他明瞭在政治上及實際上所牽涉到的問題。美國與英國的官方，只能與中國國民政府發生直接關係。給與中國的戰爭接濟物品，只能直接交給中國國民政府而不能附有條件。兩個西方大國，舉例來說，不能指派這些接濟品的某一部分給共產軍之用。英美官方因此無能爲力，如果國民黨是拒絕把任何接濟品給共產黨。

戰爭的危急，自然也許可以促成某種法律手續上的更變。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決定，如果好幾十萬在華北華中的中國人——對他們的政治主張如何不加考慮——願意擊殺日本人，我們應該給他們武器。就這一點講，在我們的對蘇聯態度中，當他們受德國人攻擊的時候，有着這樣的一個前例。有着這樣一個思想在我的心中，我問朱德共產黨是否準備直接和英美軍事最高當局開談判，如果證明從國民黨政府送來援助是不可能的話。

『爲能夠打敗我們的敵人更加快些，我們需要我們的盟軍的援助，』他回答道。『因此，如果他們證明是願意和我們直接談判的話，我們自然十分高興，歡迎這種機會。』

但我們怎樣能直接接濟共產黨這一實際問題，依然待解決。通過國民黨控制的區域，用卡車或飛機輸入進去，不須多說，是困難的。但共產黨也控制着很長的海岸線。日本人只佔領着重要的海口，如上海、青島、天津、及其他等海口。即使如此，共產黨的遊擊隊却在這些城市貼近的郊外活動。實在在目前的時候，衝破封鎖線者（最先或許是潛艇）能夠在好幾百個地點接濟，從這些地方，他們能

夠被八路軍自己攔在內地的。在這以後，把日本的海軍與空軍擊潰，我們或許能夠用我們自己活動於建立在共產黨控制的海岬根據地上飛機保護的武裝護航艦隊來輸入。

這樣和共產黨的接觸，只有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不能合作的條件下需要的。這種糾紛的解決談判雖自一九四四年春天以來已有進展，然而中國的少數觀察家，仍希兩黨間能獲得武裝休戰，超過一切東西——一個在戰爭期內的休戰。他們在基本原則上相距太遠，不能希望更接近的條件，除非會有什麼奇跡出現。在重慶的好多觀察家相信，永久的解決，並無希望，除開借助於內戰手段以後，或者，不採用這一手段，任其顯然分成爲兩個中國——一個國民黨的與一個共產黨的中國。

心中懷有這一切意見，我坦白地提出了如此的問題：將在中國進行軍事行動的美國及別同盟國，將無疑地在勝利以後，把他們戰爭大部分的器械留在這兒，因為當我們撤退的時候，運費太大，不能把大量的這些東西運回去。如果那時國民黨仍當權，仍被認爲中國政府的指導者，他們將得着這一切武器——除開那些我們可能留在共產黨控制的戰區以內的東西以外。我所要問的是這一點：萬一我們的軍器在戰後用來對付共產黨，他們可恐懼麼？共產黨，我曉得，曾有時攻擊國民黨，說有意避開對日本鬼子作戰，以便保持充分的力量，在戰後來消滅共產黨。

朱德費了幾分鐘，作嚴重的考慮。隨後他回答道：「我們不願想到中國的內戰，我們當然不會發動這樣一個戰爭。但我們和中國其他的民主勢力，準備保衛幾年來奮鬥造成的民主收穫，而和任何想摧毀這些收穫的反動派作戰。這樣一個戰爭，不僅是反對共產黨——牠一定是反對中國的人民。因爲人民是站在我們方面的，如果國民黨要想打我們，他們一定打全中國的人民。這樣一個戰爭，會

是現在這一戰爭的繼續——牠的意義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隨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失敗而終了。」

他隨後問我說，我是否相信美國會幫助中國共產黨從事這樣一個內戰。「我自然不曉得」，我回答道。「這須視戰爭結束時的世界形勢和我們戰爭厭倦的限度而定。自然一些像新國聯的東西也許要設立起來——一個具有力量的組織；雖則我不知道牠究竟有權力干涉一個國家的內政。至於我們美國人——哦，我們一直是有着孤立主義的壞名氣的……」我不給他半點鼓勵，除開提到美國人的傳統是同情於失敗的人以外。

朱德帶着深思地搖着頭。「雖則如此，我們對羅斯福總統懷着信任，我們有把握相信他會幫助中國的民主勢力。他不是一個孤立派。我們熟知他的表現於大西洋憲章中的人道原則。在這一戰中我們所有人的目的，是在爲民主反對獨裁而作戰。如果在打敗義、德、日三國的獨裁者以後，允許一個反對中國民主勢力的戰爭開始，那末在世界任何地區，當這一戰爭繼續下去的時候，就不能有和平與繁榮。爲擁護戰後世界的民主原則，美國應該幫助中國的民主勢力——而不是獨裁勢力。我可不可提醒你，你們美國人在你們的獨立與民主戰爭中也受到外國人的援助的呢？我們要請求你們對我們做同樣的事。」

我問共產黨爲對民主的中國的和平與團結有貢獻起見，能否接受蔣委員長爲國家的領袖。

「一切事件，我們相信，是在改變中的，他回答道。對於蔣委員長，有兩個方向：如果他是非常努力於推進全中國民主政治，認真地扶助抵抗日本的鬥爭，他一定受到人民的擁護，我們應該幫忙選

他當真正民主中國的第一任總統。他那時可變爲中國的華盛頓。但他如果想效法希特勒，或追隨我們中國皇帝的榜樣，如果他明確地一方面採取他目前打擊抗日勢力的兩重政策，另一方面他自己避免與日本人鬥爭，如果他繼續禁壓共產黨及中國其他民主分子，甚至達到冒內戰危險的限度——那末他不久會發現他自己不受人民的擁護。我們共產黨所盼望的是第一條道路，希望委員長也採取與走上這條道路。」

講到這兒，因爲他和別的共產黨領袖對這講得很多，我遂詢問他關於一個戰後民主中國的形式與內容的見解。

「牠的政府應該由人民選出，」朱德說，「而得到各階級各黨派的合作與擁護。」

「包括國民黨在內麼？」

「是的，包括國民黨在內。基本上，國民黨是健全的；並且即使在目前，在牠裏面也有着民主勢力——例如孫夫人及孫科等——這些人，如果有機會，會把黨走回到正當的途徑上去，因爲反共分子像何應欽、孔祥熙、及陳立夫等人，在新民主政府中，是不會有地位的。人民不信任他們也不會選舉他們。」

此外還有共產黨保護下的抗日根據地問題，這些根據地現在穿過省區的邊境，改變了華北華中的地圖。我問：「戰後民主中國，這些區域的地位將如何呢？」

「他們將保持他們像現在的組織，」他堅決地回答道。「他們將保有半自主的地位，地方自治是必要的，因爲中國是一個大國而她的各區是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中。我們還沒有完成全民族規模像你們

在美國所曾經是的那樣社會與政治的統一。」

他爲未來中國所設想的民主國家既不同於蘇聯，美國，也不同於英國。他所建議的新中國包括一個權力較弱的中央政府，而有着權力較大的半自主的好多地方政府——和美國的模型相反：那裏面有着集權的中央政府，而好多邦只在地方事件上有着自主權。朱德心中所理想的是有些類似大英帝國聯邦共和國的模式——自然。是較狹小的規模：一個各邦的聯合，這些邦甚至在財政、經濟、及外交方面也是自主的。

「再者，」他強調地說，「我可以指出，所以這樣的原因，是我們國家各個區的不平衡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統一可能在最後達到，但只有經過逐漸的步驟——並且自由而上開始，而不是由上而下強制完成。」

## 第二十一章 他們是共產黨麼？

對於美國人，共產主義一直是惡魔。普通的美國人將勉強地承認俄國人在打納粹方面，已經盡了很好的任務，但他仍不要和共產主義來往。在考量中國共產黨時，那末就有兩個問題發生：第一，他們和蘇聯有着什麼關係？第二，這些中國共產黨究竟是共產黨到什麼程度？

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能說的是這一點：在我五個月和共產黨生活在一起的時期中，我沒有看到和俄國的絲毫實際關係。沒有俄國人的接濟——沒有大砲、飛機、或配備。沒有俄國人的軍事及政治顧問。在邊區政府的少數幾個俄國人，是一個站在施手術檯邊一天歷十六小時的外科醫生，及兩個由中國政府在護照上正式簽字而到來的塔斯社的代表。這兩個塔斯社人員，據我所知道，並不發消息到莫斯科去——他們不過是收發定時的新聞稿件，正如今天全世界各處的軍事政治中心地帶，美國新聞處所發出的消息一樣。

偶然，我看到馬克思與列寧的肖像；但這些像一個革命的過去時期的古物一樣。在每一個馬克思或列寧肖像之外，我發現幾百張羅斯福、邱吉爾、史太林和蔣介石的肖像。這四個人的肖像懸掛於各處——於官署中，於商店中，於兵營中，於農民的茅棚中。史太林的肖像掛在那兒，不是當爲共產主義的領袖，而是當爲聯合國首領之一——聯合國家反法西斯侵略鬥爭的一員。

這兒是那一問題的答案：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黨——根據俄國這一名辭的定義是不是的。他們在目前，既不主張也不實行共產主義。在早期時代當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構成了那個黨的哲學與實施的指導是對的。但當歲月進展了以後，中國共產黨發現勸誘個人主義的中國農民改掉他的作爲小塊土地的主人的野心，而去相信新流行的集體主義，困難却在增加中。一再的提出折中方案遂變爲必要的，到了今天，中國共產黨，並不比我們美國人更具有共產黨的性質。我曾和中共的主要領袖毛澤東討論這一點。

在延安，毛恰巧並不是一個難以接近的預言家，不是一切智慧與指導的源泉，他的話也不是毫無問題的法律。當然，毛的觀點與建議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極大的影響，但牠們只拿來當爲討論的一個基礎，而由該黨各領袖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來作最後通過，這些領袖們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圖章。因此毛所宣傳的演說，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來，再由他的黨中同志整理過，最後的形式，因此是黨委員會的混合表現，而並非純粹是毛自己的觀點。

他派了他的私人汽車來找我——一輛半噸重的齊佛萊送貨車，在側面的「救護車」字樣的上面，漆着大的紅十字。在這下面，漆着：「紐約註冊的華人洗衣聯合會捐贈」等字樣。

毛澤東在面對着半打一並排的普通窰洞的小院子的門口迎接我，這兒他和家族及親近的助手住着。和他的美麗的較年青的妻子在一起——她是以前的藍蘋，上海著名的電影名星，一個十分聰穎的婦女，一九三三年後的共產黨員。在一九三七年，她放棄她的電影事業，到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中去工作。在這兒，毛對戲劇的興趣，使他倆混在一起，他們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悄悄地結了婚。

兩人都穿得極樸素，她穿着一身簡樸寬博的衣裳，在細腰上束上一條帶子，他則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開的馬褲。我被帶進會客室——一個有着簡單磚地，白牆壁，和有着笨重粗糙傢具的窳洞。時間是在傍晚，唯一的火光，是一枝按在翻轉杯子上的臘燭。用淡茶，土製糖果及香煙來招待他。毛不斷地吸着他的可怕的延安香煙，另一方面小孩子則在我們談話的全部時間中進進出出。他們會立下來，怔視着我過幾分鐘，隨後搶了一塊糖，飛跑出去。毛對他們不加注意。

他在中國人當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廣闊，體格不結實。約有五十左右年紀，看起來不到四十歲。他的整部的面顏，有着異常高的顴角，上面披散着一團黑髮，被一雙特有表情的眼睛而顯得炯炯有神，他很容易微笑，溫柔地講着話，而在他的熱誠中，簡直帶些矜氣。他的一種使人不愉快的習氣，是在用他的皺縮的口脣吸煙，一口口吐出煙氣中間，有着把煙吸進去的鬧聲。

他對我說，『第一，我們不是求達到蘇俄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產主義。我們更其願認為我們現在所做的，有些像林肯在你們內戰中所爲之作戰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有好幾億的奴隸，爲封建社會桎梏着的奴隸。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我們的人口是賴小塊土地生活的農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屬於窮奢極侈的大地主的。由於近百分之八十的佃農，須以他們生產品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償付地租，牠等於實際奴隸所償付的。』

他舉出了吳滿有的例子，他必須爲他的土地，付出這樣一筆苛酷的地租，結果，他從他種出來贖養他家族的食糧中，沒有什麼可留存下來的。『在今天，中國有好幾億像吳滿有一樣的被壓迫的人——好多這樣的人，他們的妻子們餓死，他們不得不出賣他們的子女，或溺死他們，而他們自己也變

爲乞丐或土匪。由於這樣的窮困，許多農婦被迫去當娼妓。並爲了缺乏充分食物的原故，我們的農民很易罹疾。甚至在今天的邊區，嬰孩死亡率仍高達百分之五十。

『不過爲設法解放這幾億人民與用土地改革來改進農民生計，我們不想像蘇聯那樣趨於極端——沒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於人民。我們承認，我們確然在過去那樣做過；但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和國民黨與政府締結協定後，我們放棄了這種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個勸告地主減租達到合理的數字，而同時向他們保證這些減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戶正當地交給他們。在這一點上，就經濟的意義上講，我們是和蘇聯不同的。』

『政治方面，我們也和他們，在我們既不要求也不計劃無產階級專政一點上，是不同的。我們也不主張一個足以沮喪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我們是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的。並且在一個互利的協議之下，我們要准許並且歡迎在我們控制區域中的工商業的外國投資。我們自己能夠做的，我們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們不能做的事，我們將歡迎外國人及外國資本流進來，去做那些事。我們是落後的國家，因此對於外國投資十分需要。』

『講到政府——像你曉得的一樣——我們信仰與實行民主政治，採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黨專政的可能性，像今天國民黨所實行的那種情形。在這一方面，我們也和俄國的蘇維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裏面，我們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資本家、小市民，以及工農。在今天的蘇聯，却是沒有地主、沒有商人、沒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我要求着說明，『那末爲什麼叫你們自己爲共產黨呢？』

他的答覆是，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所說的話，」他說，「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俄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

「那末爲什麼，」我堅持着說，「你們不改名呢？」改爲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名稱——任何共產主義以外的名稱呢？」

他搖搖他的頭。「我們或別的人所稱呼我們的政黨的名稱，對於我們，或對於我們的天良上，並不關重要。如果我們是突然改了別的名稱，在今天的中國——以及外國也是一樣——就會有那些人利用牠來作資本，要指斥我們想隱蔽某些事實。不，我們不能，我們也不該改換名稱。我們也無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內容與實施，不是名稱！」

確然，在共產黨有着那些仍希望在未來中國，出現一個共產主義政制的人。其中一人是周恩來，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爲毛澤東以下的第一個有聲望與影響的人。

「我們的最終的理想，」周告訴我，「是共產主義的社會集體主義——不過這我不相信在中國能達到除開在久遠的未來時期。中國的發展不會沿蘇俄的同一方向進行。牠將有着各個階段。舉例來說，就個別生產的基礎來說，我們採取，助或努力交換的方法，而並不是一個集體主義的立即與嚴格的建立。第二，從私有的原則，我們希望走向大企業——如交通系統，銀行與軍事工業的國有化。第三，我們將要從減租減息進展，達到耕者有其田的階段，最後達到土地國有。第四，根據一切社會階級有同等選舉權，我們將使大多數人——勞動階級——獲得選舉權。其目的是在使少數人統治爲不可能。這就是包括於「三三制」中的精神。第五，在平等條件之下我們將努力爭取國際和平與合作。這

五點總括起來，就是我們所稱的新民主主義。牠們也包括於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綱領以內，如過去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民黨代表大會宣言中所加以解釋的一樣。」

## 第二十二章 國民黨對共產黨

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成立第三十三周年國慶日，周恩來代表他的黨發出一重要的聲明。這一聲明，特別值得重視，因為牠列舉共產黨對國民黨整個的態度，及他們兩者間根深蒂固的糾紛。牠也提到這兩黨的重行結合將是多麼困難的事。下面幾頁，包含着其中最重要的幾節，因此將於清楚了解兩黨間的爭執問題，有所幫助。

「今天，全世界在戰爭中（這一聲明這樣開始道），大的勝利，現已獲得；我們的盟國正在順利的進展中。但在我們國內，正式的戰爭前線和敵後方的戰爭前線是立於相反的地位；在正式的前線，有着一次接着一次的戰敗，而在敵後則有着一次接着一次的勝利。

「在河南戰役中，中國業已在四十四天中失去了四十五個城市。在湖南與廣西戰役中，好多大城如長沙衡陽業已陷落，而別的城市也在一個個陷落中。爲什麼會有這繼續不斷的戰敗出現於本年呢？爲什麼牠們在這一時期，當日本在中國以外的形勢已經日漸在不利中，會出現呢？這自然不是僅屬偶然的巧合。不是的——牠是由於國民黨的首鼠兩端作戰以及浮面抵抗的失敗政策，由於他的單獨依賴外援，而在另一方面準備內戰。牠是由於國民黨在牠的控制區域內的一黨專政政策，由於牠的實行排除異黨政策，而在另一方面，用法西斯帶的方法，來壓迫與剝削人民。

「軍事上，國民黨當局永遠只讓政府進行抗戰——不要人民參加鬥爭。因為這一點，我們的喚起民眾在敵後作抵抗，曾被污蔑地稱爲「武裝割據與不服從軍令」——而在重慶所轄的區域內，政府絕對拒絕動員或組織人民，不僅如此，並且用武力來招募新兵，而把他們用繩子綁起來像犯人一樣趕着走。同時，招募制度本身，是用來作爲榨取與貪污的收入來源。入伍的新兵，因此愈來愈少，陸軍作戰次數愈多，力量愈削弱。在同一期間，國民黨政府堅持其反常的政策，把對戰爭不熱烈來和積極反共聯合在一起。因此，當我們在敵後激烈作戰的時候，我們被污蔑稱爲「奸黨」與「叛軍」，遭遇到國民黨的怠工與不斷的進攻。他們在另一方面，在正式的前線他們的陣地上消極地坐觀着，不想進行任何反攻。如果敵人不來，他們和敵人做走私的買賣，劫奪人民的資產。當敵用人少數人來進攻，他們作虛張聲勢的戰爭以欺騙人民；當敵用人龐大兵力進攻，他們退却幾千里而不停止。

「更其壞的：一方面他們假裝繼續戰爭，以便欺騙人民，和從我們的盟國得到援助，希望由我們盟邦的犧牲，來獲得勝利的果實。他方面，他們和敵人與僞軍接觸，希望對他們自己的進攻展緩，而轉調敵兵進攻我們在敵後的勢力。

「英首相邱吉爾因此不得不認爲國民黨政府嚴重的鏖敗是「最可遺憾」「最失望與最惱人」的事——雖則有美國總統羅斯福宣佈同盟國對中國援助的數量從每月三千噸增加至二萬噸，認爲這是最大成就這一事實，亦於事無補。這樣駁倒了國民黨政府的藉口，說中國軍事上的失敗，是由於同盟國接濟的不充分。

「不獨如此，中國沒有外國接濟就不能獲勝的話，是不對的。在敵後的前線上，我們的八路軍和

新四軍每天獲得打勝仗，雖則他們既沒有受到我們的盟國，也沒有受到國民黨政府一些接濟。

『政治上，國民黨當局死抱着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他們對別的黨派及人民的民主政治一概加以禁止。我們在敵後恢復的八三七、〇〇〇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我們解放的九千萬人民，及由人民選舉出來包括各階級的地方政府——這些是被稱爲「奸偽區」與「奸偽政府」，拒絕加以承認。可是在重慶管轄的好多區域中，只有黨治，而無民衆選舉，各級人民參政會，從縣到省以及全國的，都是由政府指派。一切官吏，從小村的村長到國民政府的主席，也由國民黨指定。而這些委任，是絕對由國民黨中一小部分統治的黨團執行，國民黨員中的其他分子及民主領袖，對這却無權過問。因此稱這爲黨治，無寧稱之爲寡頭政治，更爲適合一些。

『再者，國民黨當局已決心成立他們的法西斯主義，拒絕實施三民主義。因此，當我們誠實地保持我們的諾言，當我們力求三民主義的實現，當我們堅持打日本人及其傀儡，當我們實行三三制，當我們在敵後及邊區的地方，發展生產，減租減息——當我們幹這些事的時候，國民黨當局誹謗牠們認爲是「共產化與不服從政府及其命令」。在重慶所控制區域內，他們剝奪人民的自由，官僚支配所謂自治政府，統制輿論，摧殘文化，獨佔工商業，徵收苛酷的租稅，放縱國民黨的特務蹂躪人權，允許官僚資本家損害民間工業的企業。由於這些設施，他們引起了極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他們禁止宣傳革命的三民主義，禁止主張統一與共產黨保持友好關係。這不是法西斯主義是什麼呢？如果這樣一個法西斯主義與失敗主義政策任其繼續的話，必然對中國全民族有更大的危機出現於前面！

『爲在這個危機中救援中國起見，爲和我們的盟國在戰爭中合作起見，爲有效地準備反攻起見，

我們共產黨主張國民政府召開一緊急國民會議，召集全國的代表。我們建議廢除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我們提議採取下列具體步驟，以實現這項建議：

『第一——這些代表應由各抗日黨派選出（其中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各抗日軍隊（包括國民黨的中央軍及共產黨領導的在日本戰線後方作戰的軍隊）選出；各地方政府（重慶所管轄的省政府，及日本戰線後方解放區的民選的民主政府）選出；以及各人民組織（那些在重慶管轄區的以及那些在日本戰線後方解放區的具有全國性及代表各階層的）中選出。代表的數目，應該根據所在各地的實力為比例。為應付形勢的迫切需要，以及便利他們的召集，代表的數目應該很多。

『第二——國民政府應該在最近的將來召集這個緊急國民會議，俾不致再延遲下去，使重慶所轄各區造成不可挽救的慘局。

『第三——這會議應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為牠的基礎，應通過一個適合當前形勢需要的綱領，挽救中國脫離牠的危機。這項綱領應該完全改變目前國民黨政府採取的錯誤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政策。

『第四——根據一共同綱領，緊急會議應該建立一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以代替現在的一黨專政。這一新的結合，應該吸收全國堅決擁護抗戰及採取民主統一的一切重要人士。失敗主義者及法西斯主義者應該排除，以便保障民主政府的實現。

『第五——這一聯合政府應有權改組最高軍事機構，邀請一切主要軍隊的代表，參加最高軍事機構，組成一聯合最高軍事機構，保障抗戰的勝利。

「第六」——在建立這個聯合政府以後，應立即採取步驟，準備召開一由所有人民選舉出來的國民大會。這一大會應儘速召開，以便憲政早日開始。

「只有這樣的一個國民緊急會議及聯合政府，才能供給一個全國性的民主政治的真正出發點。只有這樣一個聯合的最高軍事機構，如我們所建議的，才能服從政府的命令，和我們的盟邦順利合作，擊敗敵人的進攻，調整我們全國的力量和我們的盟軍在反攻中，獲得密切聯絡。」

周恩來隨後談到自一九四四年四月以後，就在進行而無進展的國共之間的解決糾紛的談判。共產黨曾提出十二個書面及八個口頭建議，由他們的代表林祖涵攜往重慶。經過了無數次的辯駁與延擱以後，他們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接到政府的對案。第一，第三及第七項對案（列於軍事問題的項目下）引起了共產黨激烈的抗議。國民政府提議只承認共軍編成四軍十師——總數近十萬人——與共產黨所號稱的有五十七萬人在軍隊中服務相距極遠。並且國民黨要求除開這十師以外，一切武裝力量，須立即解散，其中包括在抗日根據地的二千二百萬的人民自衛團。留存下來的十萬人，此後是從他們目前軍事活動的戰場上撤退，而「集中待命」。

「政治方面，國民政府對陝甘寧邊區政府特別地位的承認，作某項讓步——把他的行政機關，直屬於行政院——但要求由共黨在抗日根據地設立的許多政府，應由各省政府派遣的人員接受。」

對於國民政府的這些建議，周恩來諷刺地答覆道：「解散幾十萬的抗日軍，如國民政府所要求的，是出乎情理之外。如果我們接受這些要求，這就等於幫助了敵人——我們會實際上「摧毀了抗戰和危害國家」。即使這樣，敵後的日軍及民選的政府又怎能下命令取消他們呢？人人知道這是不

能做到的。在七年戰爭中，敵後的人民建立了五百九十一個地方的縣政府，代表着百分之八十二的國民政府所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個縣。這種優良的成績，業已變爲全中國人民行動的指導。甚至作取消的打算，就是威脅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這一威脅，無異指示出不惜犧牲全中國！

『要而言之：我們認爲把中國從她目前的危機中救出來的唯一適合需要的正準建議，是改組政府及最高軍事機構，成立聯合政府及由各黨各派參加的聯合最高軍事機構，停止失敗主義的「軍令」與「法西斯的政令」。

『我們繼續要求國民黨政府承認一切抗日軍隊，一切敵後民選政府，我們堅決反對敵後幾十萬的抗日軍及民選政府的解散。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提出的十二條書面建議，我們的代表，林祖涵同志所提出的八項口頭建議，仍應該當爲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談判基礎。』

## 第二十三章 到前線去

當我們騎上馬，跋涉千里，出發去觀察八路軍如何作戰的時候，天正下着大雨，現在只曠下我們三個人了，每人身邊帶一個繙譯，因為我們決定分道揚鑣，從不同的路線到前線去。

最年青的繙譯是李紹棠，一個三十二歲的結實傢伙，在南開大學專攻莎士比亞。他的英文相當不差，但還不夠流利，有些書本子氣，句子中間往往加上許多長的字眼和複雜的附屬句。他熱心幫助別人，很迫切地須要學習英語會話，對美國土話的反應特別迅速，學會了幾句，就生硬地拿來和莎士比亞式的英語混在一起說。

最有趣的是林重，一個古怪的，戴深度眼鏡的矮小傢伙，有向上翻的鼻子和微微掀起的嘴唇。他是福建人，他聽不懂國語，正像倫敦人之對於威爾斯話一樣。在三十五歲的一生中，他走過許多地方——到過俄國，菲列賓，走遍過整個馬來半島。他能說相當好的英語，可懂的俄語，過得去的西班牙語；而在激動的時候，他就把這些話摻和在一起。

郭培寧是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一同成長起來的一位老黨員。他老想說服我們，共產黨在「大後方」比國民黨做了多少好事情。他把國民黨恨入了骨，他的弟弟是在一九二七年清黨時被國民黨殺死的。

山道蜿蜒，一直通向延安飛機場，旁邊是點綴有窑洞的黃土岩，矗立的寶塔有一千年歷史。棉花田開着發亮的紅花和白花——這恐怕就是有人謬賴共產黨種棉花的原因了，因為盛開的棉花田，遠遠望去，正像是一片璀璨的罌粟花。

驢，騾，馬，難得也有鐵輪或皮輪的馬車，這些組成了輻輳的交通線却絕對看不見人力搬運，那在中國其他部分，是非常普遍的。從新開煤礦開發出來的品質優良的白煤，一大塊一大塊運着走，一副牲口措二天塊。進來的人，多半帶棉布，出去的人帶鹽。牲口用繩子串着，慢吞吞地走，你可以看到運輸合作是多麼有效果，一個騾夫可以管二隻或三隻牲口。

路上每個人，都啃着紅的熟蘋果或蜜一樣甜的西瓜，這在共產黨來了邊區之後才有的，他們介紹了許多水菓和蔬菜進來。過去幾天中，雨下得很多。有一次渡河馬蹶進流沙裏去了，一下子就浸到馬的頸子那兒；趕快跳下馬背，我的屁股都淹沒了。幸虧我還鎮定，我拚命向前爬，直到有人過來扶了我一把。這真是危機一髮的事。我害怕極了。

晚上打尖的地方，是在一個古廟裏，現在改變為小學校了。隔壁的天主教堂是在一九三一年造成的，一九三五年共產黨來了之後，就停辦了。長排的板凳，聖餐壇及其他傢俱，都搬走一空，紡織機搬了進去。這些紡織機是由退伍軍人開動的。第二天早晨重新上路，我們沿一條山道走入寬闊而豐饒的峽谷，旁邊是泥汗的急流，經過曲折迂迴的溝道，向泥板岩流下去。在田野裏，勞働隊和諧地工作着，一邊揮舞鋤頭，一邊不停地唱着歌。我們騎馬走過的時候，他們停下了工作，好奇地望着我們。我們知道，這是遠在基督降生之前，野蠻的游牧民族走過的侵略古道。這些野蠻人，來自戈壁沙漠或

更遠的地方，在陝北人民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路印。我們看見許多中國人有藍眼睛，棕色頭髮和高鼻子——他們是一八七零年大叛亂時來到陝北的回人的遺族。

我們走過許多荒無人煙的城市，有些應該在從前是非常繁華過的。歷次侵略者的入寇，使這些地方破壞得不像樣子，現在只成了一座荒城，斷垣殘壁，瘡痍滿目，說不定從前却是堂皇的建築呢。少數人家還在用磚頭砌成的簡陋的屋子裏。這些房子造得非常別緻——看來像石頭堆成的大立方體，底下有隧道穿過。這些隧道在前方和後方都用木框子擋住，算作窗和門。雖然是原始的房子，却造得十分堅固而實用——居民堆砌石頭，容一條隧道從中間通過，想像起來，一定是費了很大力量的。

在清澗——延安以北第一個大城——剛好碰到是農婦集會的最後一天，我們被邀去參加。第一個發言者說，她剛得到丈夫從前線捎來的口信。丈夫爲新的民主中國而奮鬥，她和她的孩子們可以享受一向所未有的自由，對於這一層，她覺得非常驕傲。她也要竭盡棉薄，貢獻一得之愚，所以決定至少得組織五班文盲訓練班，學習讀寫，以便適應新的自由中國的需要。另一個女人把解放時代和舊時代對照來看，訴說從前女人得服從長輩，服從丈夫，服從兒子，服從婆婆種種的不平。正在說話的當兒，她看見李紹棠走到廊下來給我們繙譯，嚇得了不得，從講壇上溜下來了。幾千年來服從男人的傳統觀念，一下子征服了她，使她拋棄了一切新的解放思想。使這些女人完全接受解放思想，恐怕還得經過不少時候呢。

清澗縣長帶我們到山頂上一個古廟裏去看他的難於處置的孩子——一個佛教尼姑。他曾煞費苦心，想使她參加生產運動，告訴她，這不是一個人的事，而且也是公民的責任，每個人都須從事某

種生產。雖然他想出種種理由，要說服她，改變她的意見，但她總是不肯聽。『你在這裏做了一個壞榜樣，』現在，當我們站在一旁的時候，他跟她說。她笑着不答。『你比一個懶惰傢伙好不了多少，』他繼續說，努力想找尋她的弱點。

後來，她說話了。『你要我做什麼呢？』

『你可以嫁人，幫助男人生產呀！』

『可是誰會娶我？』她笑着。『我是過了三十的人了。』

縣長很快地抓住這個機會。『我幫你找一個丈夫。』

『不，』她搖搖頭。『我是不嫁人的。我出家當尼姑，就爲了不願意嫁給小女孩的時候父母爲我選定的那個男人。』

他皺着眉。『可是假定我們使你回俗呢？』

『你不用這麼威嚇我，』她回答說。『我們都知道，在共產黨的新民主制度下面，各人有各人的自由，誰也不能勉強誰！』

聽了這話，縣長擺擺手，只好作罷。『您瞧……？』我們就離開了那裏。

那一天晚上，鎮上的露天劇場上演秧歌劇。劇名叫『懶人的改造』——講的是二流子勞動英雄劉生海的故事。他們喜歡不喜歡這個劇本？那你看一看那些觀眾才知道。他們每一句話都聽得出神。這是一個真實故事，在他們看來，尤其感到有切膚之痛。很容易了解；而且，台辭也是他們自己的方言。他們幾乎就活在那故事裏面，和台上的演員打成了一片——而演員呢，恰巧也不是職業演員，而

是屬於當地業餘劇團的。

綏德是北方第二個大城。二千多年前造成的綏德這城市，當年匈奴入寇，在這裏被阻遏住，今天却成了一座荒城，徒供後人憑弔而已。它的高大而美麗的城牆，幾世紀來抵禦了野蠻民族的入寇，却不能保護居民，使免於內部的叛亂。在著名的回教叛亂的時候，『第五縱隊』把城市獻給了猛鶩的回教徒，他們把五萬人口屠殺了百分之八十。在今天，只有約計四千人，住在翻造過的城區的北部。屋子建築得都很漂亮，商店貨物充足，人民顯然很富有。城裏山頂上有一座古廟，那裏有一個很完善的圖書館，還有一個大的近代化的禮堂，經常在那兒開會和演戲。

在邊區，綏德是以獨多大地主和閹紳聞名的。在一次招待宴會上，我們碰見了許多這樣的人物，我和有幾位詳細地談過。這些人裏面最受人敬重的，是七十歲的安文新，現任邊區人民政治協會的副主席。他是綏德區最大的大地主之一，祖先遠溯到宋朝——差不多一千多年以前。他生長在古舊的傳統裏面，——他是一個秀才，所謂秀才者，就是在滿清時代通過了第一次皇家考試之謂，——然而他現在，開口閉口只是對共產黨所實行的農業和民主改革推崇備至。『今天，甚至連最起碼的農民』，他說：『都有時間和機會學習讀寫，開拓眼界，從舊的奴隸制度下面解放自己。』

八十歲的王芬清依稀還記得回教徒大屠殺的情形，那時他纔六歲。他是那羣人裏面惟一穿長袍，手腕上戴玉鐲的人，他有長指甲，那曾經是貴族的標記。

靠近綏德，是共產黨軍事學校『抗大』的所在地。抗大大約有一萬名學生，分成四大隊——全是前線的老戰士，派到這裏來受一年積極的軍事與政治訓練。我們去參觀第一大隊，那是少校和上校階

級組成的，他們受的完全是小兵一樣的訓練，爲的是使他們更清楚地了解實際作戰時在他們領導之下的那些小兵的許多問題。像一切邊區的人民一樣，他們每天至少須做二小時生產勞動。他們討厭這件事——討厭株守在菜園裏，或者跟個女人似的紡織布。可是政治委員李進羣——他自己也是一個有傷痕的老戰士——聽了他們的抱怨，只是笑笑。『當然囉，正像他們說的，這是一件女人的工作。可是我們這樣做是有目的的，因爲舉例說，譬如在菜園裏工作，那就可以使他們多理會一點，軍隊走過田野，踐踏老百姓的莊稼時，老百姓的感覺是怎樣的。而紡線呢，可以教會他們忍耐——那是當我們進行游擊戰術時必須理會到的。』

米脂在綏德以北三十哩，從延安騎馬去，一星期可以到達，那是在中國周遊十四年所看到的最繁榮的小鎮之一。湊巧，米脂離邊區的北壩祇有一哩半。從附近一座山岡上，可以望見許多碉堡，那是北山上國民黨封鎖線的一部分。再遠處，便是萬里長城，北面展延着廣袤無垠的戈比沙漠。

是一個市集日的黃昏，當我們走進米脂的南門的時候。城市唯一的長街，擠滿了從四鄉各地來的老百姓。和別地方的人所穿的單調的藍短襖不同，這裏的人都穿白色土布，因爲這裏不容易得到顏料。雖然陝北的勁風吹來灰沙，大家却都出奇地潔淨。我看不見一片襤褸，看不見一個營養不良的老弱，看不見一個乞丐；連那些籬擁在我們背後的孩子也都穿着品質上等的鞋子。

米脂是一個比較新的城市，城牆還完整無缺地保持着原狀，巍峨的城門上聳立一個瞭望台，給人一種博大莊重的印象。商店裏存貨充足，店面剛剛刷新過，石板街道打掃得纖塵不染。在吃晚飯之前，我到大街上去，找一些店夥，商人，市場上的老百姓們陪談天。他們異口同聲都稱讚共產黨所做

的改良工作。姓朱的六個弟兄開的地毯公司，是最典型的。二年前，他們以六萬邊幣做開的頭。到今天，他們的資本值到好幾百萬邊幣了。邊區政府是大股東，有三分之一股票，但對商務沒有干涉之權。所有的夥計都是股東，每個人都有紅利可分。

天亮後一小時，我們離開了米脂，那是共產黨掌握中，從延安到華北及華中前線的狹長的交通線上最後一個大城市。這路路線從延安向北伸展開去，經過綏德和米脂，然後轉向東北，渡過黃河，打這裏起，分成許多叉路，通向各處抗日根據地。現在，我們走的路更顯得崎嶇不平了，經過了許多光禿的荒山。有些山村，深壘堅守，顯得防禦森嚴的樣子，雖然近年來土匪已經完全被共產黨肅清了。我們開始看見許多民兵，日夜在戰略要點和鄉村過路上守着崗。他們大部分配着古怪的有紅流蘇的長鎗，大刀，和自製的土鎗。他們的任務是喊住行人，檢查『路條』。這些北方農民，比生長在華中華南的人至少要高出半個頭——有些竟有昂藏六尺之軀。

有一夜，天黑了很久了，我們才到葭縣，黃河口岸的一個防禦據點。像一個中古時代的堡壘，葭縣矗立在糖棒一樣的山頂上，因此，必須氣吁喘喘地爬上陡峭而泥滑的山道，才能到達那裏。在有些地方，山上堅硬的石頭切成長的階段，肥胖的小馬在上面竄蹦着，就像山羊一樣。最後，巨大的城門隱現於暮色茫茫中，我們照着幽靈一樣的燈籠，穿過湫湫曲折的街道，來到警備隊的司令部，當晚就借宿在那兒。

雖然葭縣是一個美麗如畫的城市，但這對於一個堡壘，是毫無用處的。它沒有自己的水道，每一滴水都得到城牆下面二千呎黃河那兒去汲上來。這城也許在幾百年前由一些腐敗昏聩的官僚造成的，

雖然我找不到一個人能告訴我一點它的歷史，或它所以能存在的理由。有一個時期，日本人衝到了黃河對岸，砲轟這城市有好幾天；但要達到這山頂上的堡壘，必須經過不可靠的河流，爬上陡峭而裸露的山路，看到這一點，他們就畏難而退了。

從葭縣，我們沿黃河的北游，走了好幾天。當河流狹細了起來，兩旁都是峻峭的絕壁，我們不得不爬越波浪形的山巒，在二千呎高的無窮盡的山道上灣灣曲曲地繞行着；後來，河流改道的地方留下了一片沙灘，我們就在堆積得很堅實的黃沙上縱馬疾馳。一小羣一小羣的老百姓，從河沙裏篩出北方什麼地方煤礦上沖洗來的煤塊。另一些人，在污泥的河上輕輕撒網，打撈飄來的雜草，舖放在岸上，曬乾了當柴燒。

隱匿在深山中，有一長串的陸軍醫院，每家醫院都設立在一組密洞裏。陸子凱將軍在西安告訴我們說，共產黨不打日本人的唯一的證明，就因為我們看不見有受傷的八路軍。好了，我們現在看到了——而且，多得很；有些還剛在我們走過那裏的前幾天，在作戰時受了傷。

醫院的情形自然是非常簡陋的。一切還是老樣子：沒有藥品，沒有儀器，沒有訓練有素的醫學人員——雖然病人們都發得有特別的醫院衣服，還有雪白的被單。管理一連串七家醫院的醫生，是一位聰慧的，認真的青年，他在延安醫科大學只受了一年半訓練，可是已經擔任施行大手術了。有長期訓練的醫生，却少得很，需要是十分迫切。

在軍需倉庫裏，我們看到分散的小組在縫製制服，修理武器，製造軍火。轆轤和別的機器，都是用戴眼罩的驢子牽動的。在堆棧裏，我們看見一堆一堆木箱，裝着從日本的驢車上奪來的催淚彈和鎗

息霏霏。從我們看到的鹵獲來的降落傘加以推測，日本人一定非常缺乏絲；這些降落傘不是用絲做的，而是用劣質的棉織物做成。這些都是從一些死了的飛行員身旁檢來的，顯然在跳下飛機，一張開來時，就壞了。院子裏，放着一大堆鐵軌，也都是八路軍的勝利品；用這些材料，鎗礮匠製成堅固耐用的鎗桿。還有一大堆日本的子彈殼，鐵管子和破毀的坦克車的輪子，都拿來放在熔爐裏熔解，改鑄成零件，配在鹵獲來的機關鎗上面。

渡過黃河，到山西綏遠抗日根據地去的一段路，比我們原來到邊區的路還要耐人尋味得多。當走到急流中時，我們那條沉重寬闊的平底船震盪得一直是躁聒地響着。船夫使勁搖着巨大的四個人搖的槳，直到我們從急流的掌握中逃脫出來。最後到達對岸時，我們到了真正的戰區。再騎半天馬，就到了山西綏遠根據地的司令部——他們叫做晉綏根據地的。

## 第二十四章 華北的子弟兵

山西綏遠抗日根據地，是華北和華中一切根據地的樞紐。通過這裏，展開着各戰線和延安共產黨最高軍事統帥部之間的主要交通線。這個地區，西起黃河，東迄同蒲鐵路，和晉察冀毗鄰接壤。西北方，直通平綏路的末一站包頭，北方通大青山和內蒙多草的平原。南方，挨靠着汾陽到離石的公路。佔據面積大約有四萬平方哩，擁有三百萬居民，行政方面有一個人民自選的政府。

除了靠近黃河的一邊外，這根據地三面都被日本人堅強的封鎖線包圍着。再加上附加的封鎖線，在這根據地上交叉而過，企圖把它切成幾塊，隨時準備用「蠶食政策」加以吞併。這裏的司令官是××將軍，一位高大而有學者風度的東北人。戰爭開始時，他是駐北平區的中央軍的團長。日本人還沒有到，中央軍的主力向南撤退了，他就留在敵後，終於加入了聶榮臻將軍指揮下的開進來的八路軍。一九四三年十月，他被任命為晉綏根據地的司令長官。

×將軍的參謀長×××，為我們諄諄解釋根據地的軍事形勢。我們坐在一間小房間中，當日本人進行週期性的掃蕩工作時，這所房子曾兩次被他們縱火焚燬過。傢俱都簡單而輕便。有趣的是，房間裏其餘所有的東西，全是日本貨：茶杯啦，水菓盤啦，花瓶啦，鉛筆，墨水和紙啦，甚而至於香煙啦，——所有這一切，全是從敵人那裏鹵獲來的。頂靠近的日軍警備隊，只要一天工夫的行軍，就可

以到達。

陳將軍開頭把軍事形勢分成三個時期來說明：

(一) 戰爭爆發至一九四〇年年底。在這時期中，八路軍不但和日本人，而且爲對新軍隊的統率權發生爭執，和閻錫山的軍隊也曾作戰過。新軍隊是從太原一批左傾學生及其他志願軍的小集團逐漸發展起來的。自從閻錫山部隊潰敗撤退後，八路軍就在那邊成立了晉綏抗日根據地。

(二)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在這最艱苦的時期中，日本人顯得非常活躍。他們發動過好幾次掃蕩運動，據點和碉堡的數目陡增倍麗，企圖消滅一切抵抗的力量。在他們的『蠶食政策』中，有時也夾雜着『殺光，搶光，燒光』的所謂『三光政策』。

(三) 一九四三年至目前。八路軍遭遇，並且擊敗了日本人所能發動的最險惡的攻擊，現在是從守勢一變而爲攻勢了。諸君看到一九四四年七月爲止的記錄吧。在日本人環築於根據地四周的二百九十七個據點中，八路軍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已經攻破或者強迫撤空了一百二十八處。反攻仍然不斷地增加着威勢。在我們到那裏的一個月前，又減少了二十五處據點。就在陳將軍這樣告訴我們的時候，通訊員又來了報告，就在上一天，又攻破了二處據點。總反攻已經解放了二千六百八十五個村莊，包括三十六萬四千五百居民。陳將軍不肯預言未來的成就。『我們談事實，只在事實已經兌現的時候，』他說。

有一晚，吃過晚飯，我們走出一哩外，到一個高大而陰冷的大禮堂裏去看戲。禮堂建築在一條狹小的死胡同裏，四面都被高山遮沒，這樣來避免空襲。那天的戲，講的是上一年掃蕩運動中的一件故

事。有七百個日本兵被圍住了，困在離大禮堂有十里之遙的一座山頂上，最後只有差不多一百個日本兵倖倖逃生。戲演得非常精彩，成績斐然。演員少得可憐，但一種緊張的氛圍氣是被表現出來了。開幕時，是在一個農夫的家門口。母親和一個小女孩——民兵領袖的家屬——正在收拾一些東西，預備逃到山上去。日本人就快來了。他們是來搶穀的，而八路軍則幫助農夫們收割，搬走他們的穀物，另一隊派出去阻止敵人前進，等待八路軍的援兵來到。

這齣戲帶着濃厚的宣傳成分——或者稱之爲教育成分更爲適當吧，因爲這是專門演給兵看的，觀眾也多半是兵。八路軍上場，手裏帶着碗，斧頭和椅子——那些東西是他們借的，現在拿來歸還。有一個兵幫助那女人收拾東西，把必須留下的東西藏匿在妥密的地方。她給他一些吃的。他拒絕了——八路軍幫了老百姓的忙，是不取報酬的。另一個兵開始打掃房屋。一個沒有官級的小兵在和長官談話，長官正往煙筒裏加煙，小兵毫不在意地向他討一口煙抽，他也毫不在意地順手把煙袋遞了過去。這些舉動都表現得好極了。這些都說明了八路軍的主張，他們竭力鼓勵軍隊和人民之間保持一種密切的關係。

仗打起來了。八路軍的援兵一到，日本兵被趕到山頂上去，在那裏，遭了圍困。日本飛機拚命轟炸八路軍；但他們只是走得更近，這樣一來，飛機就不敢再轟炸，唯恐炸了他們自己人。聲響效果是原始的，却非常有效。鞭炮在幕後炸開，聽來就像真的來福鎗和機關鎗聲一樣。

日本人躲在山頂上負隅頑抗的一場戲，演得尤其逼真。他們沒有被譁畫化，沒有被描寫得像胆小如鼠的懦夫。（八路軍是把敵人當作殉道者一樣來敬重的，他們認爲日本兵只除了少數人，都要頑抗

到底）。扮演日人的那些演員，十足表現了日軍在中國的末路。一句話就說盡了一切，那是日本人常說的一句洋涇浜中國話：『八路軍大大的有！』——意思是『到處都是八路軍。』

劇本從頭至尾貫澈着軍民合作的顯明的主題。民兵加入正規軍作嚮導，作情報員，作戰鬥員。一個老頭兒給爬在掩護物後面的士兵遞茶送水。四個老百姓抬着擔架來救護傷兵。

宣傳意味最好的部分，是在最後落幕前的一刹那。日本鬼子作最後突圍的掙扎。當他們妄想突破八路軍的陣線時，開始了肉搏戰。最後殘存的兩個日本兵投降了。八路軍的長官手放在手鎗皮袋上面，劈面走過去，這時顯得非常緊張。你想想他要抽出手鎗來打死那兩個俘虜。相反，他却走上去和他們緊緊地握手。

散戲之後，士兵觀衆回到他們的營房去。以前我從來沒有注意過，現在看見他們都帶着心愛的武器——他們的日本來福鎗，日本機關鎗，日本手榴彈。他們排着單行縱隊，在鋪着圓滑石的峽谷間，從一塊石頭跳到另一塊石頭，近處河上的月亮的瑩潔的反光照出了他們的黑影。這些便是八路軍。這些便是連日本人也認爲可怕的戰士。他們被人懼怕，因爲他們是有主義的戰士，因爲他們是志願軍，而不是傭兵。他們被人懼怕，因爲他們有值得驕傲的地方，因爲他們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蹟——贏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我們應該記得，中國人一向是大兵看成最末等的社會階級的。

離開司令部不遠，有幾千個兵在那裏露營。這些都是從前線各戰區調來受特別訓練的。八路軍一方面似乎很能從日本源源不斷地取得武器，但軍火一層，却覺得十分不夠。所以軍隊必須進行積極的訓練，學習使用刺刀和手榴彈。他們也學習新的埋伏和急襲法。日軍據點的模型被仔細地研究過，

許多進攻和破壞的問題都研究得無微不至。

和正規軍一起露營的，還有一千個民兵，他們受訓的重心放在和正規軍的合作問題上。他們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混合地用着各色各種武器，包括紅流蘇的長槍，大刀，滑膛鎗，短鎗，燧發鎗，地雷，破舊的來福鎗，中國貨的湯米鎗，湯米鎗是戰前在閩錫山的太原兵工廠造的，後來閩部跑到日本人那邊去當傷軍，八路軍就從傷軍手裏奪了過來。因為鹵獲來的湯米鎗每枝只有不多幾顆子彈，所以八路軍又把它們分給了民兵。

他們用的武器，最古怪的要數木砲了。我看見一大隊民兵在肩上扛着土製的大礮。三寸口徑的大礮是用橡木做成的，大約有三呎長，十二吋直徑。作戰時，把礮鐵，石塊，一切可能拾到的東西，放到礮眼裏，然後拉動一根長繩索，火繩機就會把礮子打出去。

這二百二十萬民兵，可說是華北和華中抗日根據地上一切抗日戰爭的骨幹。他們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的民衆力量。在我看來，如果有人要問人民究竟對共產黨怎樣看法，那末，這就是最好的回答，因為武裝了的民衆決不會忍受一個不得民心的政府，或者一個不需要的軍隊在他們中間存在的。民兵是部分時間的戰士，只在他們的家鄉受到威脅或攻擊的時候才參加作戰。通常，他們的任務是在鄉村附近的作戰中供給正規軍以情報，擔任運輸和抬擔架的工作。必要時他們也擔任嚮導和傳信員，而他們主要的任務，則是在不作戰的時候，保護道路和山道。他們一天做二十四小時的守望工作。過路人得把「路條」給他們檢查，否則就不准通過。

民兵不能由軍隊或政府下令叫他們作戰；他們純粹是一種志願性的組織。可是，他們參加了作戰之後，受傷的人就和正規軍受同樣的待遇，死傷者的家屬可以獲得同樣的利益。特殊的勞働交換——有時以全村爲單位——紛紛組織起來，當大規模作戰時，子弟兵們長期出差有公事，民兵的莊稼和田地便有別人來照護。村子被襲擊時，假使碰巧沒有正規軍，民兵就自己組織起來，進行保護家鄉的工作。撤退不可避免時，他們就來指揮一切，盡力加以衛護。

游擊隊從民兵蛻化而成，却保持着完全獨立的系統。這些是全部時間的便衣的戰士，他們的活動範圍多少局限於他們自己的家鄉。他們的任務有三種：第一，保護當地的政府官員及幫助行政機關完成任務；第二，保護人民的利益，當敵人進入這地區時，和他們一同起來作戰；在當地的作戰中，和正規軍保持合作。

游擊隊所以異於正規軍的地方，在乎他們雖然也是全部時間的戰士，却純粹是一種地方軍隊。他們的組織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全視當地的情形和工作的需要而定。隊伍也小大由之，他們的武器並不一律——他們攜帶近代來福鎗，老式的短鎗，地雷，或者抓到手裏的任何一種武器。因爲他們都是本地人，所以他們比正規軍更富有流動性，更能變化自如。如果敵人追逐得非常緊急，他們很容易分散開來，藏到自己家裏去，和人民混在一起。

作爲個別的隊伍，游擊隊是直屬於區司令部的管轄之下的，爲切合實際計，授權於各分區的正規軍司令負統率指揮之責。指揮的統一性就是這樣造成的。游擊隊隊伍自然可以脫離正規軍而獨立地作戰；但如有比較大規模的戰鬥——如對據點的陣地進攻——他們必須先得到當地軍隊司令的同意。可

是，如果機會來了，對據點可以進行奇襲的時候，他們還是可以不得命令而發動攻擊的。

只要有可能的話，游擊隊就可受到充份的軍事訓練，預備將來改編爲正規軍。他們由軍隊供養伙食並發給餉銀，享受同樣的待遇。他們的軍事組織，雖然完全根據着軍隊，却不像軍隊那樣地嚴格。他們的首領是從他們自己裏面選舉出來，而由軍隊加以認可的。除非遇到緊急事件，通常在頒佈命令之前，這些首領總是把一切計劃和其他的人一起加以討論。

看見有幾尊中國製的史督克式迫擊砲和正規軍架在訓練場上的鎗，我問了一下這些傢伙的來源。據說是在一次和龐炳勳將軍部下的偽軍作戰時繳獲來的。（重慶方面否認這個國民黨將軍在幾個月前向日本人投降，官方只報告說他和日軍英勇作戰後被俘）。

『我們宣傳並不會從國民黨那裏分到武器，這句話也許是有點語病的，』一位八路軍的軍官譏刺地說道。『我們的確從他們那裏得到過武器——那是經過像龐炳勳那樣一度會爲國民黨軍的偽軍的手裏得來的。』

和龐部的作戰，爲期甚爲短暫。略爲開了幾下鎗，偽軍就抓住機會投降了，帶着鎗一起走了過來，有四個從前龐部的鎗手，住在營帳裏，我和他們作了一次長時期的談話。

『最初我們知道龐將軍投到敵人那邊去，』一個灰白頭髮的老兵說。『是在一羣日本人突然出現，把日本旗遞給我們的時候。這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老實說，我們是非常不高興。我們跟日本鬼子賣國賊們打了好幾年的仗；而現在，忽然我們自己也變了賣國賊，在打自己的同胞了。所以，後來我們奉命去打八路軍，一開頭我們就抓到機會倒了戈，加入了八路軍。』他是帶着全付配備和軍官

一同投降過來的一營兵士中的一個。其中有一些後來被送回家去了，但有許多像他那樣的老兵，都願意留下來加入八路軍打鬼子。

有一隊士兵，在學習期滿後，×××將軍召集他們作一次談話。他告訴他們，他們的成就也許比不上歐洲和太平洋的大戰，然而他們每一分的努力對於整個戰事的推進都是非常必要的。他們是大輪子上的一个輪齒，大輪子若要運行自如，還得靠每一個輪齒都堅固結實。

『你們在前線已經完成了許多工作，但在這次訓練結束之後，我還希望你們做更多的工作。你們應該把這裏學習到的東西，也拿去告訴人民。不久秋收就要到了，你們應該幫助他們去收割，如果敵人要搶人民的穀物，就去保護他們。同時，你們還沒有這樣做的時候，你們得學習紡紗，織布和縫紉。到了冬天，再到這兒來受訓。在春天，你們幫人民種田插秧。而在目前，你們仍在勇敢地跟敵人打着仗，在對包圍我們山西綏遠根據地的敵人總反攻中，貢獻出自己一部分的力量。這樣，是不是要求你們太高了？』

異口同聲地，他們喊道：『不！』

接着，當地的勞働英雄文襄雄起立對他們演講。他是一個民兵，子彈帶橫掛在他的胸前。他說着明白流暢的本地話。他說，他非常高興，自從八路軍來了之後，這一區的情形改善得多了。

『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我們人民簡直很少有東西吃。今天，雖然我們的田地是在戰爭的最前線，我們反而比從前吃得飽了。還有一點，在國民黨治下，我們沒有自由。今天，我們爲我們自己選出的政府感覺到驕傲。我們可以討論各種問題，在八路軍的協助，指導和保護下，想出種種方法去解決它

們。那末，我們自願地——是的，可以說是非常高興地——和那些獻出生命來保護我們的家屋，我們的父老妻子，我們的田地的八路軍精誠合作，難道有什麼可奇怪的嗎？我們也感謝這次受訓，使我們能和你們一起工作，從敵人的魔掌底下搶救收穫。』

接着說話的是森堅，一個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最忠誠的會員。他說：『是日本語，由一個中國政治工作人員繙譯成中文。』

『八路軍的士兵們』，他開始說道，『我不僅是代表日本人民的解放同盟，而且也代表日本人民。』他說着縮減的，簡短的句子。是一個品質優良，頭腦清楚的人，用他單純的率直態度使得聽的人信服。『人民和軍隊在這裏合作保衛自己，是非常對的，』他繼續着說。『在日本，我們的兵士也受訓去打仗；可是兵士們並不願意受這種訓練，因為他們知道這是要去侵略別的國家。他們因為有好的武器才能夠打勝。假使你們有那樣的武器，你們可以和他們打得一樣地好！也許更好些，因為你們是爲自己的家鄉而戰鬥。日本兵心裏明明知道這一點；而當時機到來時，日本人民會起來迎接解放他們的聯合國軍隊，正像被壓迫的法國人迎接美英自由軍隊的來到一樣。』

在這次集會的前排，榮譽座裏，坐着三個日本俘虜，剛在幾天前捉到的。他們靜聆森堅說話的時候，臉上毫無表情。我不知道他們對他印象如何，對他說話該有怎樣的想。我更不知道他們看了堆積如山的鹵獲來的日本武器，看了民兵預備用鎗啦大刀啦那樣的原始武器來打日本人的那種堅決性，又該怎樣想。也許，他們是根六非常看輕這一切的，因為他們還是捉來不久久的俘虜。但疑惑的種子該早已種下去了，因為他們非但沒有受刑，被殺，相反，倒被當作貴賓來招待了。

對日本俘虜的優待，當然不是單單做出來給我們看的。在後來幾星期中，我看見過更多的俘虜，有些是在我們到那裏的幾小時前，另外一些是幾星期以前，捉到的。一個也沒有例外，他們都被當作貴賓一樣地來招待；住得非常舒服，分到比八路軍士兵還要好得多的衣服和配給食品。參加集會的三個日本人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們上衣的胸袋裏，每個人都有一枝自來水筆。關於對待俘虜，有一條規則是：他們個人的所有物，都不在沒收之列。被敵人捉去的八路軍，可就得不到這樣的待遇。

在我們住在司令部第四天，就是最後的一天，來了兩個朝鮮人和一個日本憲兵。他們剛剛自戰跑過來不久，——至少，他們是這樣說的，而且這是我所聽到的一個最荒誕不經的故事。我可以斷言他們是訓練有素的間諜。我和他們談話時森堅也在場，他應該是同意我的意見的，因為——雖然他沒有說什麼——可是他聽他們說話時的那付神氣，已經告訴我很多了。

二個朝鮮人都能說中國話。白森琪自稱是一個買賣人，在日本軍隊裏當文書方面的雇員——一個情報部的抄寫員。李公和是一個攝影師，在汾陽設有一個小店。這二個朝鮮人，在一個下雨的晚上，在汾陽吃飯時，遇見了日本憲兵佐藤高雄，偈談之下，發見了三個人都想要參加八路軍。說得到做得到——他們吃完飯，便走出城去，後來就碰見了八路軍。

『你們爲什麼要到這兒來呢？』森堅問道。佐藤回答說：『這世上有許多窮苦的人。我是日本貧苦受壓迫的羣衆中的一個。我希望在這裏學習一點共產主義，把它帶給我國內的同胞知道。但首先我要到俄國去和史太林握手。』

一說開了頭，他的話就沒有個完；我簡直不能打斷他。我覺得他是在背誦預先安排了很久的一個

故事——他的悲慘的被壓迫的生活，他怎樣希望學習很多東西，使他可以爲他被壓迫的同胞做許多事情。他怎樣了解共產主義的呢？共產主義是苦人的救星，他毫不遲疑地回答着。他在什麼地方知道這一點的？據說那是在憲兵隊裏受訓練的時候，人們告訴他共產主義的初步原理，特別注重在如何去和它鬥爭；但是他的良心，告訴他這些原理的確是好的。所以他就決定叛變了。他既然在憲兵隊裏待過許多時候，我就問他，能不能告訴我日本兵被八路軍俘獲了又放回去時受到怎樣的對待。他回答時猶豫了一下，似乎很小心的樣子——他不大明白我的用意何在。他否認看見過有這樣的例子。後來，被逼得急了，他又承認放回去的俘虜先挨憲兵一頓打，然後執行軍法審問。沒有受傷而被放回去的，就被處以死刑。處刑並不公開，可是話總要傳開來。有些時候，據他說，放回去的俘虜不經過正式審問，被自己的同僚偷偷地弄死了就算了，免得隊伍受到名譽上的恥辱。

隨後，矢野珍，日本人民解放同盟裏面森堅的夥伴之一，說話了。他一直傾聽着談話，現在他來講他自己的經驗，他也曾被八路軍捉住而又放回去過；當他回到自己軍隊裏去時，他發覺自己要被鎗斃，所以他又逃到八路軍這邊來了。他是五個被中國伏兵捉住的人之一。其餘四個都受了傷。那四個人要求放回去，後來被允許了，他們來說服矢野跟他們一塊回去。他們是很有被赦免的藉口的，因爲他們可以拿傷痕來證明是在作戰中被俘。可是矢野一定會被認爲胆怯，開小差；所以他拒絕再回到軍隊裏去。當了三個月的八路，俘虜之後，他變得寂寞起來，最後也來請求釋放了。他想冒一冒險，或許可以倖免於一死。或者，他可以把三星期以來他在八路軍中看見和聽到的一切報告給上司知道，這樣或可求得寬赦。

他回去之後，被送到憲兵那裏去，足足拷打了三天三夜，打得他失去了知覺。他們再把他弄醒過來，於是再打。他們控告他，不僅替日本皇軍丟臉，而且是爲八路軍工作的一名奸細，一定要他承認這個罪名。第四天，人家告訴他，他要被送到司令部去受軍法審問。當他們把他帶走的時候，從前曾經對他非常好過的他的連長，遞給他一個信封。信封裏面沒有一句話——只有三十四錢銅幣。開頭他有些莫明其妙；後來他明白了：日文的三十四這個數目字意思就是死。『你要死了』，這便是那位連長想告訴他的話。他作了很快的決定，一把推開了壓送的人，奔向田野去。背後雖然有人開鎗追擊，他却很快地逃進了高粱叢中，最後逃到了八路軍這邊來。

敘述這些經過的時候，佐藤和二個朝鮮人一句話也不說；的確，他們似乎不大感覺到興趣。我特別奇怪佐藤的反應。他是一個憲兵——他一定知道這些事情的。可是，也許他知道我在注意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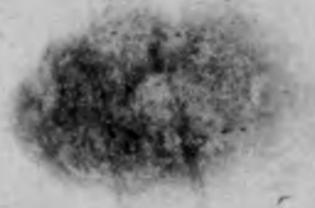
至於矢野這方面，他在這些『逃亡者』面前講這個故事，是不是別有什麼用意呢？他們幾個人之間，有沒有眉目傳情——說了一些不明說而別有含義的話呢？我相信矢野是可以被信任的。那末，也許他是警告佐藤和二個朝鮮人，說他們的供詞太令人懷疑嗎？

以後過了一些時候，我在延安碰見了岡野。他和佐藤以及那二個朝鮮人談過話，那時他們是被送到延安去進那邊的工農學校，我問他覺得他們的話怎樣，岡野笑了起來。『我一個字也不相信』，他說。『可是，我們依舊要讓他們以爲我們被蒙騙了——我們現在還是這樣做，因爲這樣我們才能了解派他們到這裏來的那些軍閥的心理。何況他們也不能做出什麼事情來——我們把他們看管得太嚴了。』

我不敢說我已經了解這一點。然而，至少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完全在日本人手裏，共產黨竭力要避免干涉。他們讓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代替他們來做這件事。這樣做時，也許他們是採取着最聰明的辦法。



垦 荒



## 第二十五章 在日軍陣線後方

我們要到一些什麼地方？我們要參觀那一處前線？我們要看些什麼東西？這些都是合理而率直的問題。我回答說，在我這方面，是沒有什麼一定的意見的。我只想著些東西，足以告訴我三件事：第一，軍隊在戰鬥。第二，人民在戰鬥。第三，軍隊和人民互相合作，互相扶助着。

立刻把地圖拿了出來，讓我們來仔細地研究。到山西綏遠根據地東南角的第八分區去怎樣呢？這是一個直徑大約一百哩的地區，四周被日軍據點團圍住，據點與據點之間相距都在鎗火射程以內。他們告訴我，我在那邊可以看見許多足以證明這三點的事情。並且答應我，那邊立刻就要打起仗來。『我們現在是在進攻着，你知道。』將軍這樣對我說道：『從裏面向外發動的進攻。目的是在打破敵人的封鎖圈，這樣可以解放那邊的五十萬民衆。』

這是一句很大胆的壯言，我以為，而且，也是一個迷惑人的故事——假使所說是真的話，能夠在敵人陣線後方——事實上是完全被敵人包圍着的——和人民以及軍隊一同生活，一同戰鬥，那樣的機會真是太好了。別的人也都表示同意。事情便這樣決定了。

和我們同行的是李××，派在×將軍司令部裏辦事的一個能操英語的政治秘書。李××秘書是一個有趣的人物。年紀還只有三十過頭一些，看來却像是一位大學教授，有一張聰明的臉孔，戴一付修

補過的眼鏡。他說話聲音很低，近乎有點女性化，他的身體是柔軟的，寧可說是近乎肥胖。可是，他騎那隻調皮的騾子的那付樣子，看來却是非常有趣的。騾子踢着，顛着，野蠻地咬嚼着。李祿書只是滿不在乎地把它騎在胯下。每小時有好幾次他幾乎要掉下來，騎在騾背上，就跟墮在一大堆棉絮被褥上面一樣。可是他說，他已經騎了那隻騾子七年了，他知道它的全部鬼技倆。

我們從司令部出發，一直走向戰場，幾個月前有七百個日本兵在那裏碰見過伏兵。我們看見他們最後負隅抵抗的地方，他們作最後掙扎，企圖衝出層層包圍的八路軍時，把死屍縱火焚燬的地方。參加這次戰役的八路軍司令，很生動地寫我們重述這個戰鬥故事。他的故事充滿着多彩的事件——譬方說，知道日本人不歡喜遺屍野地，利用這一點，他就在日本兵死屍下面埋放一個地雷。天黑之後，一隊日本兵由一個長官領導着，前來尋找屍體；地雷爆發開來，把軍官和其他五個日本兵一起都殺死了。

司令告訴我們，八路軍在作戰之前總是預先警告民衆的。民兵領導着正規軍，由小路翻過山頭，追到日本軍隊的前面去，對八路軍作了很多的貢獻。我們在一個村莊上停下來，和幾個民兵談了一些話。他們有八個人在勞働交換隊裏工作。這八個人裏面，只有一個人有一枝可用的來福鎗，另外一個人有一把手鎗。有來福鎗的那個人說，上次日本人來的時候，他身邊只有十二發子彈。

『我對敵人開放了四鎗，』他說。『我怎麼也抵抗不住那誘惑。』他不相信他曾用那四顆寶貴的子彈打中過任何一個日本人；可是，他笑了起來說，他間接地分到了紅利，因為他曾從一個死去的日本兵身上搜到一滿匣的子彈。

民兵守着山道的每一寸土地。崗位遙遙相望，距離很近，行人沒有『路條』，就不准通過。即使是和我們同行的軍隊，也非拿出『路條』來給查看不可。在一處地方，有一個十歲的孩子，擎着一柄和他一樣高的大刀，站在路中間，要查看我們的過路護照。走在我們軍隊前面的那位司令一本正經地拿出來給他查看，那孩子查看得很仔細，然後帶着非常尊嚴的神氣，揮手叫我們繼續前進。沒有一個人敢笑出聲來，直到走遠到他聽不見的地方為止，因為說到結底，這孩子是代表着農民的靜默的力量，沒有了農民，軍隊是沒有法子存在的。

有二連人——大約二百名光景——派給我們，做我們的護兵。他們剛在司令部修完了特別訓練班，要回到第八分區去。經過了好幾天平靜無事的旅行之後，我們接近了封鎖線——從離石到XXX的公路。按照計劃，我們須在夜間出發，從二個日軍據點中間突圍而出。我想像穿過封鎖線一定是一種秘密的偷偷摸摸的行動，一口氣跑過公路那邊去，只准帶少數幾個人——一個嚮導和一二個護兵。我們將在深夜潛行到路上去，派一個偵察兵先到前面去探聽，然後打個暗號給我們——比如說，學鳥一樣的打口哨——假如沿途沒有危險的話。然後，後面的人將同時碰觸我一下，低聲喊道『向前去，祝你好運氣』，我就肚皮貼地爬過去，任何時候都可能碰到從據點那邊發來一陣雹雨一樣的機關鎗彈。

事實相反，這次突出封鎖線，似乎發展成爲一次大規模的作戰了。在山洞的營帳裏，在一支洋臘的搖曳的火光下，我們開了一次軍事會議。我們的司令打開了地圖。『瞧，日本兵都集中在這兒……』他告訴我們，這地區裏還有八路軍二連人，給我們做成一條保護的走廊，好讓我通過。他們統

制着一切優越的陣地。偵察兵就在日軍據點的每一個入口守着崗，遇見有危險的徵象，隨時打暗號給我們知道。

「情形就是這樣的」，我們的司令把一切都講明白了。「現在，我們得稍爲睡幾個鐘頭覺，因爲今天晚上我們還得趕許多路呢。還有一件事」，他加添着說，「你還是穿着你的新制服吧。」

一件八路軍制服把我打扮得臃腫不堪。看上去好像是一套特別古怪的奇異服裝，上衣差不多蓋到我的膝部。我不高興穿它，但他們堅持非要我穿不可，「只爲了減少別人的猜疑」——一個六呎高二百磅重的外國人，尤其這裏的軍人都只有我一半重，一半高，我的遭人猜忌該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他們望着我都笑了。「大鼻子八路」，他們這樣稱呼我。（中國人管一切的外國人都叫大鼻子）。

可是我們沒有按照計劃在半夜裏出發。報告來了，說是前面不遠就有戰鬥。沒有人知道：生了些什麼事情。日本人離開據點，向我們撲過來了嗎？敵人得到我們來到的消息，企圖半路截劫嗎？

等到天亮，全部的報告遞來了。領導軍隊保護我們穿越封鎖線的那位軍官，毫不假借地執行了他的命令：在二個敵人據點之間保護我們的安全。他顯然覺得，最好的保護我們的方法便是消滅這二個據點。他的確這樣做了。他先下令進攻第一個據點，經過幾小時戰鬥之後，第一個碉堡裏面的五十個僞軍警備隊全部投降了。隨後，他把僞軍的隊長帶到第二個據點，強迫叫他去說服他們投降。

這樣，我們得到了一整夜安穩的睡眠，而在白天繼續前進，去穿越封鎖線。比較接近的一個據點名叫×××，這時候大火還在那裏延燒着哩。高踞在海岬上，從那裏可以望見二處重要的峽谷和離右到××的公路。湊巧，那條公路只是一排排電線桿，却沒有電話線。游擊隊和八路軍常常在夜間偷割

電線，使日本人不得不放棄了敷設電話線的念頭。甚至公路上連車輛都很少有，因為每一輛貨車都會碰到民兵們安放下的地雷。

日本軍隊，從一九四一年來開始建立據點的時候起至一九四四年春，曾在××駐紮。後來，覺得必須從華北抽調許多軍隊到別處去，分配更重要的任務，於是就把許多像××這樣的地方移交給了他們的傀儡。可是，他們並不信任這些傀儡，只要看據守××的那五十個兵只帶着少數舊式的廢棄不用的武器，幾乎一點軍火也沒有，就可以知道了。

八路軍關於真實的情形，隨時可接獲從內部得來的情報，司令於是決定，時機成熟，可以出動了。他的部下圍困了據點，而在戰火停歇的時候，他就向偽軍大聲呼喊，告訴他們他完全知道他們有多少實力，配備怎樣，有多少軍火接濟。他一個一個叫着他們，勸他們投降。假使不答應，那就要不客氣地攻城，殺得他們片甲不留。傀儡軍考慮一下，結果是投降了。八路軍於是放火燒了村莊。

×××是華北許多日軍據點最典型的一個。在它的核心，是一個圓周形的碉堡，大約有二十呎直徑，高二十呎，用石頭，泥和磚造成。上面密密匝匝全是些機關鎗放鎗的洞眼。毗鄰是警備隊的兵營，一半造在地底下。環繞着碉堡，有三圈來福鎗壕溝，每圈相距十呎光景。稍爲過去一點，是雙層的鐵絲網。山腳上，有三道很深的溝渠，大約十五呎深，十五呎闊，把海岬團團圍住；而在這些溝的上面，有一頂吊橋。八路軍曾在每一條溝渠上掙扎爬過，切斷懸縛吊橋的繩子，而另外一些人，則在自己的機關鎗火下面衝殺過去。

偽軍是一羣愁眉苦臉的傢伙，他們害怕得失神落魄，唯恐會受到責罰，因為他們這一隊是特別以

魚肉鄉民聞名的。他們諂媚地回答着我們的問題，像他們以爲我們要他們回答的那樣。他們說，日本人常常打他們，待他們很壞。那末，他們爲什麼要在那邊呢？爲什麼不叛變而到八路軍這邊來呢？關於這一點，他們的回答是：他們是窮苦的人，除了做日本人的傀儡之外，他們沒有法子生存。他們也會想過要叛變——常常這樣地想過；但他們沒有勇氣這樣做。他們不十分有把握。

僞軍的隊長，害怕日本人知道了這次事變，會把他住在X×附近村字上的妻兒老小殺光的。能不能帶他們一起來呢？司令答應了他的請求。得到一輛大車，僞軍隊長把日用傢俱都堆在上面。他的老婆和三個孩子坐在行李的頂上。他知道他不會被當作俘虜關多久的。八路軍沒有永久的俘虜營。他別的許多僞軍士兵將被召集去受訓，然後由他們自己決定，加入八路軍呢，還是回到老家去。

我們離開冒着煙的X×廢墟時，天已經暗沉下來了。老百姓帶着鶴嘴鏟和鏟子從四鄉集攏來，繼續夜間未完成的破壞據點的工作。當然，日本人是會回來的。他們會把這些老百姓再糾集攏來，重建那據點。老百姓知道這一點，——但他們也知道，事情不會這樣快，這些日子，日本正在走投無路呢。事實上，日本人第二天早晨的確又來了，人數有好幾百。他們巡視一下據點的廢墟，召集村子附近的人民，講了半天大日本光榮不朽和『大東亞新秩序』之類的話就走了——並沒有想重建據點。

我們現在到了第八分區裏面來了。強有力的日軍部隊夢想切斷一切可能的接濟來源，在這裏發動過許多次「殺光，燒光，搶光」運動。當我們從第八分區的一頭到另一頭去時，赤地千里，除了燒光一片的村子之外，我們什麼也沒有看見。開頭，村民遷重建他們的家屋；但自從狂怒暴戾的日軍一次又一次縱火燒燬以後，民衆就決定到山裏去，挖掘山洞居住了。甚至到了這地步，日本人還要追蹤而

至，把他們可憐的居室的木門木窗一起焚燬，他們簡直兇暴到了極點。現在，門窗做得可以拆卸，便於攜帶了，可以搬走，藏匿在深山的洞窟裏。

同時，這地方雖然名稱上是「淪陷區」，人民却維持着一個自己選舉的政府，一方面支持着千萬八路軍的正規軍。

××的村子是一個好例子，可以證明什麼是日本人所謂的「大東亞新秩序」。××一度是一個商業繁榮的村莊，有體面的，裝璜得非常講究的店面和住屋，現在却成了一個亂石堆。日本人把村子破壞得非常澈底，他們花了三天工夫，把整個村莊有計劃地鏟成了平地。民衆曾經勇敢地企圖重建他們的家園；可是，日本人一回來，第二次又把它們破壞了，於是村民只好斷了念頭，去住在村莊廢墟後面的山洞裏。

可是日本人沒有使這些村民懼怕，他們從八路軍那裏分到了更多的武器。除了大隊人馬以外，現在村民對一切日本軍隊都不讓通過。我看見他們在田裏走動，背上揹着來福鎗，手榴彈掛在屁股後面，預備隨時應付作戰。

附近一個富饒山谷裏的人民，很久以來想和日軍合作，希望這樣來保全他們的家鄉。可是在我們到來的幾個月之前，日軍事先沒有通知，就一下子攻進了這個山谷，把每一個村子都燒光，一千個居民被殺死了三百個。愁着苦臉的虎口餘生者，講述着日人殘暴的難以令人置信的故事。婦女衣服被剝光了，讓他們強姦，然後綁在樹上，做鎗靶子。嬰兒被拋向天堂，掉下來，戳穿在鎗刺上。把孩子的頭幾次塞在河面的冰洞裏，塞進去，又拉出來，慢慢地把他淹死。這些報告我不是間接聽來的，說話

的是死者的丈夫，母親，兄弟，姊妹，他們指給我這些罪行發生的地方。這樣看來，現在這些人民一心一意地支持八路軍，完全是無足怪的了。

## 第二十六章 爆竹的鄉村

第八分區是在華北最多山的區域的中心，那地方的海拔平均高出海平線七千呎至八千呎，有些山峯甚至高達一萬二千呎。

當一九四〇年成立第八分區的時候，八路軍差不多佔據了全部一萬平方哩的地區，只除了大城市如太原，汾陽等地方。一九四一年，日本人積極開展掃蕩運動，和『蠶食政策』混合在一起施行，到了一九四二年，他們把八路軍佔領的地區減少到極少數。可是當他們暫時息了怒，回到他們建築起來用以保持已得的成果的據點網裏去的時候，八路軍從隱藏的地方，和老百姓們一起，又悄悄地跑了出來，開始了他們的反攻。在不到一年的時期中，反攻開展得如此蓬勃，八路軍又收復了他們在一九四零年佔領的全部的地區。日本人在那些地區的據點網，被破壞了——一個接着一個地——只賸下了周界上一些碉堡還巍然孤立着。現在，八路軍正在有計劃地加緊破壞這些最後殘存的據地。在過去一年中，八路軍從包圍線的內部發動反攻，已經消滅了四分之一的據點。

日本人不時派遣重兵，決心要消滅隱約出沒，把捉不定的八路軍。八路軍却只是高飛遠走，不和他打，除非自己發動要打的話。日本人簡直拿他們沒辦法。再沒有東西可破壞的了；鄉村已賸得一片廢墟，而青苗是不可以燒燬的。在收割的時候，八路軍和人民想法子使日本人停留在據點上不出來。

直到收割已經完成，穀物都藏匿一空。

使日本人不出來的頂頂常用的一個方法，是在一切據點的附近安放好千百個地雷。我記得有一個鄉村，那邊的地雷戰術進行得如此成功，甚至使他們決定要根本把附近的據點的威脅一掃而空。據點四周是一片地雷陣地，民兵日夜守着哨，防止日本人突圍出來。他們運出來取水都辦不到，當我們在圍城的第三天中趕到時，顯然他們最後的水源已經非常缺少了。我們問村民要不要我們的軍隊停下來，幫助他們攻城。『不，不，我們自己會幹的』，回答是這樣。十天之後，我們聽見了他們自己幹的消息：他們進攻了被圍的據點，脆弱不堪一擊的警備隊簡直就沒有作什麼抵抗。他們的人一半被殺死，還有一半投降了。

那個村子是我所見的抗戰氣氛最濃的一個。每一條過路，每一條山道，都密密匝匝地安下了地雷；地雷不僅安放在道路上，還安放在田野裏，那裏恐怕細心的日本人會繞道經過的。這寫的是防止日本人的救兵來到。每一處安放地雷的地方，土裏都插着警戒牌，敵人一逼近，很快地就可以拿掉。這使你擔心得要起雞皮疙瘩，你的馬必須彎彎曲曲地穿過那些豎着警戒牌的地雷——你希望不要遺漏了才好！

連鄉村的街道也埋下了地雷。村民毫不在乎地走來走去，似乎已經忘記了腳下埋伏着的死神。每人身邊都帶着一種武器——背上攜着來福鎗，或在屁股後面掛一隻搗杵一樣的手榴彈。這裏的人都習慣帶傢伙，連男女孩子們腰間也掛着手榴彈玩具。

在戰前，這村子在當地是以製造爆炸聞名的，現在居民却把製造爆竹的技巧用來製造地雷了。在

一個院子裏，我看見男人女人，孩子們都在製造黑色的炸藥，熔鑄地雷的模型，把裝好炸藥的地雷有次序地堆起來。因為缺乏金屬做地雷的外殼，有些人挖空了石頭來做成石頭地雷；還有人滿裝瓶子，水壺，甚至茶壺；有一個人自出心裁，做成一個木製大砲。

這一切現象值得人注意之處，不在這些原始武器的效率優良；而在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人民的戰鬥精神。一個人須有莫大的勇氣，才能對敵人的可怕的近代武器想出這些微末不足道的抵制方法來。

日本人對這些事怎樣想法呢，我們從幾天前攻破他們的據點時捉到的五個俘虜嘴裏，聽到了一些消息。他們還是胆戰兢兢，還是以為就要受到刑罰的。他們裏面有四個人過了三十歲，加入軍隊還不到三個月。他們好像我們軍隊裏身體頂不健全得四個下的人，他們在就職時奉調出來的。第五個是一個二十四歲的漂亮小夥子，已經在軍隊裏幹了四年了。

他們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打仗嗎？他們國內的人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打嗎？假使聯合國打勝了，他們以為聯合國怎樣對待日本人？

至少這四個年長的人是剛從日本出來的，假使他們是誠實地回答的話，他們一定可以表現出不但是在華的日軍，而且也是在國內的一般的國民的意見。這裏是他們的回答。

慢吞吞地說話的松下，第一個發言：『假使我們吃了敗仗，日本男人會被運到外國去當奴隸，我們的女人就被聯合國分配去做小老婆。』

松原的妻兒和他的家屬一塊住在名古屋的田莊上，他說：『我們的男人都要被聯合國殺死，只留下女人和孩子奄奄餓斃。』

谷村有四個孩子，現在都靠他的親戚照料養活着，他回答道：「我相信只有兵士會被處死，留下老年人，孩子和女人在日本國內。」

濱田同意谷村的話；可是田中，五個人裏面最年輕的那一個，以爲老年人和最年青的人都要被殺死，兵士階級則遭監禁奴役。這五個人——假使的確相信他們告訴我們的話——是有理由成爲狂熱的兵士的。他們的回答告訴我們，今天寧可說是吃敗仗的恐懼心理，而不是什麼希望僥倖獲勝的心理，使日本鬼子支持着還想繼續打下去，他們騎虎難下，有些欲罷不能。這對於在中國的日本人說，是尤其難切的。在這裏，他們打了不少的勝仗，但仍然不能征服中國人民。中國人恨他——他也明白。他只能坐在他的碉堡裏，愁眉苦臉，等候着不可避免的死亡。『死啦死啦的有！』他用洋涇浜中國話絕望地喊着——『到處都是死！』

第八分區軍隊的司令官，是矮胖的河北人王××將軍，王將軍從很久以前起就是一位職業軍人。一九二一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從那時候以來，他差不多在每一個重要的軍人，如吳佩孚，馮玉祥，閻錫山等人的手下都打過仗。當一九三一年日軍進軍東北時，他曾指揮作戰，直到下令撤退時爲止——那時候，撤退是蔣介石及其政府一貫的方針，一方面拍日本人馬屁，另一方面則等待外國援助。一九三二年和日本人簽訂了停戰協定以後，他被派到南京去，從德籍及意大利籍的教官那兒受特殊的軍事訓練。在南京，有幾輛坦克和幾尊大砲給學生作實地學習，可是他們沒有學到什麼。他們全是一些特別選拔出來的軍官，在他們看來，那些教官是太豈有此理了，一心一意只指望將來到德國和

意圖去定購他們的軍火。『告訴你這學校媽虎偷懶的情形吧，』王將軍笑着說，『學生老是坐洋車到訓練場去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時，王將軍是中央軍駐華北二團人的司令。上司下令叫他們去打新開到的八路軍，他抗拒不進，終於領了部屬叛變，都加入了×××部下的八路軍。×××將軍離開河北，新任山西綏遠根據地司令時，王將軍也跟了過來。在我們來到的六個月前，王將軍新任第八分區的司令。『我的命令是單純而清楚的，』他說。『那就是：戰鬥，生產，教育！』

王將軍到這裏來時，正是日本人在年初發動的掃蕩戰打得頂起勁的時候。他們在試驗一種新的戰術——其名曰『梳』。他們派大軍出動，然後很快地分成許多小組；每組大約有二十人，這二十人往前推進，像一隻木梳的梳齒一樣；假使碰見了八路軍，這些梳齒就會集中起來，形成一個包圍運動。

『最初，遇到這種新戰術，我們不免手足失措了，』王將軍說。『可是我們很快地就恢復過來，我們把兵力分散成更小的小組——只有五六人——採取一種『麻雀戰術』，作為抵制。這些小組熟悉當地的地理，先來恐嚇一下敵人，在這裏放幾鎗，在那裏放一個地雷，在山頂的優越地勢擲幾個手榴彈下來——然後，在敵人還來不及透一口氣時，他們已逃到不為人知的小路上去了。日本人終於不得不回到據點上去，他們的『梳髮戰術』完全失敗了。』

王將軍是八路軍最好的戰略家之一，他特別注重縮減據點。因為沒有必須的武器——大砲和高度爆炸物——是供正面攻擊敵人之用，就不得不想出別的法子，把日本人從據點上趕出去。首先，須把敵人從碉堡引誘到適當的地點上來，可以用比較平等的立場和他對打；然而即便這樣，除非八路軍的

軍官覺得一定有打勝的把握，否則仗還是不輕易打起來的。八路軍是這樣地吝嗇，他們簡直不容許打敗仗。

假使誘敵的工作不成，據點就會受到不斷的襲擊。可能在夜裏進攻，剝奪敵人的平靜和休息。可能每天開鎗狙擊，使警備隊應接不暇。也可能用地雷把他們包圍起來，使他們成爲精神上的俘虜——救兵倘不是絕對雄厚的兵力，難免中了埋伏。

同時，各方面都派兵出去探聽弱點，當時機成熟了的時候，就撲過去給他一擊——永遠不會錯失目標的一擊。曹莊的據點，是顯着的一個例子。這據點上的駐軍，時常到下面村莊上去強姦婦女。在據點上住着一個漢奸，這漢奸的老婆也被日本人強姦了。老是留心着一切的八路軍，聽到這個消息，就和漢奸發生了接觸。有一天晚上，他在守夜的時候，放下了吊橋，八路軍衝進去，把手榴彈擲在日本兵營裏，殺死了二十五個日本兵，俘虜了十五個。戰利品有迫擊砲一尊，重機關鎗一架，輕機關鎗三架，手榴彈扔擲器一隻，無線電播音機一隻，來福鎗三十五枝，子彈二萬發。代價是：二個八路軍士兵被殺死，一人受傷；只用掉了五十發來福鎗鎗彈，四十枚手榴彈。

曹莊是重要據點之一，擁有四十七個村子。這些村子都被解放了，連同它的一萬人口。

另外一個標準的例子，是×××據點。我在上文寫過的和我談話的那五個日本俘虜，都是從×××來的。有一個苦力每天早晨給他們挑水，濱田有一次開玩笑地指他爲八路軍密探，把他嚇得了不得。他並不是的——但是八路軍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去說服他。叫他和八路軍合作。到了晚上，八路軍爬了過去，躲在吊橋的附近。天濛濛亮的時候，苦力又到下面河岸邊提水去了。等挑到第四趟，他打暗

語給聚藏着的八路軍，告訴他們日本鬼子正在吃早飯。吊橋放下來，八路軍衝過去，用刺刀指著日本人，有一個八路軍用日本話喊道，『別害怕——八路軍不殺俘虜！』凡有抵抗的，都被殺死；那五個投降的日本兵都被放過了；據點就這樣被消滅了。

## 第二十七章 高山上

「您提打仗？讓我來看一下。」將軍研究着牆上的地圖。「我們就該要進攻婁煩了。這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可是我以為現在還不是時候——我們的炸藥還造得不够多。您先到南部邊界汾陽附近走一趟如何呢？那邊老是有些東西可以看看的。那地區有我們的第六分遣隊，我想您一定會看見很多戰鬥的。」

這樣，在彤雲密佈的一天，我們就出發到南方去，爬過至少有四處九千到一萬呎高的山路，最後才到達目的地。我們據高臨下，望見下面一片闊大豐饒的平原，附近一個小山就是日軍佔領下的汾陽城。仍舊和我們同行的那二連正規軍，現在不只是護兵了——他們是作戰的軍隊。我們可能在任何時候遇到戰鬥，因為我們永遠沒有跑出離附近日本據點一天以外的路程。

領導我們分遣隊的，是一位穿便服的偵察兵。我管叫他「卡遜(註)王」，因為他騎着一匹黑斑小馬，長柄的日本來福鎗不在乎地扛在肩上，子彈帶橫掛在胸口的那付漂亮的樣子。這是「卡遜王」的責任，他得趕到前面去，向老百姓打聽有日本人在什麼地方集中沒有。

(註) (Kit Carson) 是美國革命前到西部去拓荒的勇士之一。

八路軍的正規軍也許算不得是我在中國看見的配備最好的軍隊，但他們無疑地是訓練最好，最有

紀律的軍隊。別的任何軍隊的士兵，在行軍時總是任意地搨着鎗；這些士兵却像閱兵一樣地規矩，鎗插在肩上，形成正確的角度，整天就那樣地行着，精神一點也不鬆弛。每隔幾分鐘，軍官要吹一次哨，那時大家把鎗從一邊肩上移到另一邊去，動作完全是一致的。當下令休息時，士兵並不任意地散開——他們仍舊排成隊伍，軍官喊了一聲，他們就整整齊齊，一排一排地蹲下。然後，完全不像一般的中國兵，他們總要拿出布塊來，在他們心愛的來福鎗上小心地擦着微小的斑點。我一枝一枝拿過來，察看來福鎗的鎗柄；沒有一枝鎗不是一塵不染的——光是這一點，就教會我懂得了這些人的許多事情。

他們是一羣你所看到的最快樂的青年。他們具有充沛的精力和精神。他們不停地唱着歌，歌聲中間插着歡呼和喊聲，甚至在上上下下攀登多石泥滑的山道時也是如此，有些路筆直地陡峭，害得我一隻大而帶紅色的騾子不斷地喘息着，像一隻蒸氣機一樣地噴着氣。一跑到陡峭的地方，他們就大聲地喊道：「加油！」「加油！」

不久，開始下起雨來，可是我們仍舊繼續行進，因為在一個地方住宿一夜以上是不大妥當的事。在這第一天，我們在傾盆的大雨裏，整整走了九個鐘頭，在凸凹不平的山路上一高一低地滑行着，得不到一分鐘的休息，以便果腹。那一夜，我們生起了火，烤乾了衣服，第二天又一停也不停地在大雨裏走了六個鐘頭。士兵們這樣走着，身上還帶着很沉的行李，包括來福鎗，機關鎗，手榴彈扔擲器，軍火及其他配備。

在一個隱蔽的小山谷裏，我們停下來參觀了實際等於是前線機構的一個野戰病院。一切設備是在

戰時體制下，這醫院和它的病人在一小時內就可以撤退完畢。和鄉人之間實行一種勞働交換，鄉人擔任抬擔架的工作，作為交換條件，醫院職員幫助他們在田裏工作。三個穿制服的護士，把被單及其他什物包紮好，假使不用這些東西的話。每個人有一圈手榴彈和一枝來福鎗，和他們的背囊放在一起。時機緊急時，他們的責任得保護傷兵，讓村民把擔架抬到附近的隱蔽山洞裏去。

主持這個醫院的大夫只受過六個月醫學訓練，雖然他在軍隊裏已經做了差不多十幾年的救護工作，自認力不勝任——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缺乏藥品的原故：他們利用很多開水和日光來醫療。手術用具，如開刀用的刀和鋸，是在附近兵工廠裏做的。羊腸做的腸線用以代替貓腸，鹽溶液則用作消毒劑。鈣質是從磨碎的蛋壳裏取得的，柳枝放在醋裏煮過，用以代替阿斯匹靈。燒過的麥皮用布包起來，就算是熱水壺的代用物。他們甚至還養一些蠶，想得到絲線以供縫合之用。

附近的兵工廠實在比一個修理舖大不了多少。雖然可用的原料是這樣稀少，他們每月還出產了大約一千個地雷，二千個手榴彈。假使有足夠的原料，產量可以加倍。

天在黑下來了，當我們來到最後一個山道交叉點，走進焚燬的小村子，打算在那裏過夜的時候。村長走來迎接我們，用一種奇怪地平靜的，事務底的聲音報告說道，二小時前他曾接到西方六哩的村上打來的電話，後來被切斷了，據稱二百個日本兵和一百個偽軍突然在那邊出現。（電話用具和幾十百哩長的電線全是從日本人那裏奪來的。這些電線大部分都敷設在地下，或者很技巧地隱藏在林叢中，給像我們那樣伺隙以動的八路軍小組造成極有效率的情報網。）

敵人在前天曾經出來過，顯然要爲上星期在那地區連續被攻破的二個據點復仇。或者，也許他們聽見了我們到來的消息，想殺死或俘擄我們。他們知道我們在那第八分區，因爲他們曾在據點附近的村子裏散發傳單，捏詞誣謗我們，並且懸賞徵收情報。

村長告訴我們，當電線被切斷時，他的情報員正在報告敵人的配備——二尊野地重砲，五架重機噐，好幾尊迫擊砲。顯然情報員繼續報告到最後一瞬，才把電話線切斷，高飛遠走，逃掉性命。

我們的司令官沉思地聽取着村長的報告。我們那天足足走了十小時路程，高高低低在整得腳疼的山道上掙扎前進。而他又負有保護外賓的責任。假使他決定撤退的話，我一點也不會怪他。可是，他選定要留下來，參加戰鬥，他靜靜地吩咐一隊到這邊山上去，另一隊到那間屋裏去，第三隊又到另一地點去。村中的民兵頭兒跑進來聽令，民兵被派出去，在所有引向這兒山谷裏來的山路上安設下地雷。偵察兵被派出去搜索敵軍的行蹤。做完了這些事之後，司令捲起他的地圖，我們就坐下來，吃我們粗陋乏味的晚餐，很爲那些只蓋一張單薄的日本毛毯抵禦山中夜寒的疲憊而飢餓的守夜的軍隊抱屈。

我們的司令恰巧是第八分區的政治指導員××××，他這只有三十過頭一點年紀，從孩童時代起就是一位革命家。他在十五歲時加入了國民黨，成爲他那一區的宣傳科科長。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之後，他加入了共產黨下鄉；那時他才只有十六歲。他組織了游擊隊，和國民黨正規軍打了很多次仗，每次都創了記錄，使他在二十一歲時，被派爲擁有五千人的軍事單位的副指揮官。他還在二十多歲，就成了江西紅軍軍事學院的副院長。當一九三四年開始長征時，他被派爲高級幹部分隊的指揮官。開

初，這小組純以政治工作人員組成，但隨着長征繼續下去，政工作人員也須要受軍事訓練了，因為每個人都得和追擊而來的國民黨軍隊拚命。他們來到陝北後不久，抗日戰爭開始了，陸就加入了賀龍的軍隊，擔任著名的第一百二十師的政治委員。後來，他被派到第八分區，他在那邊又是政治委員，又是小部分兵力的司令官，直到一九四四年初王將軍帶着他的馬來到時爲止。從那時候起，陸委員便專一致力於政治工作，擊刺圍攻的日軍的積極反攻。

那天晚上，我們和衣睡了。可是日本人沒有敢露面。後來，天亮之後，我們接獲報告說，幾哩之外另一組八路軍打埋伏，在路上截擊了一股日軍，但顯然他們沒有做得很好。或者，至少我們彙集了太多的損害報告——小組的政治委員和二個支隊隊長都被殺死了，受傷的也有許多；敵人所受的損害，則一點報告也沒有得到。這一次截擊，有能夠阻止敵人前進，只是把他們移向了南邊一些。陸委員覺得非常遺憾，在夜間沒有能和另一小組取得聯絡，否則聯合起來，或許可以給日本人嚴重的打擊的。『可是別着急，』他說。『我們今天向東移動，明天我們就和別的部隊匯合起來進攻汾陽。那將是一場好廝殺；你以爲如何？』他笑着說。

汾陽城擁有二萬人口，是一個相當大的目標。這是除了太原省城以外這一區裏最重要的軍根據地，也是發動大規模掃蕩運動的一個集中地點。

## 第二十八章 汾陽之戰

我們留下坐騎和鋪蓋捲在後面，加入了軍隊作夜行軍，翻過山嶺，到一個小村莊上去，那裏離汾陽只有五哩路。在菜油燈昏暗的燈光下，陸委員打開他的作戰計劃。進攻將於清晨三時開始。汾陽飛機場的軍事設施將被燒燬。附近的電力廠將遭襲擊。東門外的自來水廠和公共汽車站將遭破壞。日本兵如果出城，他們將遭迎頭痛擊，而城裏也要被衝入。除了這些規定的命令外，指揮作戰的司令官還得隨時抓住一切可能襲擊的機會。

一隊日本兵——人數約在四百左右——在城裏擔任警備，還有三百人，駐紮在城外附近的一些據點。此外，還有七百個傷軍。所以，這就不僅是一種游擊戰了。劉飛機場，電力廠，自來水廠和公共汽車站進行襲擊，無非是要引動日軍大批地出城，然後八路軍在城外，可以用差不多同等的地位，和他們一決勝負。

在漆黑一片中，從泥濘多石的山路爬上山頂的觀望台，真爬得我們苦了。據說祇有一哩不到的路程，但我恐他們是說垂直的一哩，平行恐怕還有足足三哩呢。山頂上是出奇的寒冷，從遠處高山吹來砭骨的夜風。當我們走到時，一小隊衛兵早已在那裏坐着，在單薄的日本絨毯中凍得打哆嗦。然而這只是初秋天氣，在酷寒的華北的冬天，這些地方還要下很厚的雪呢。

差不多三點半鐘時，我們聽到了鎗聲，看見從三處發出火光。作戰顯然進行得很好。天慢慢地亮起來，我們看見煙霧迷漫在長方形的城牆的上空。但再也聽不見鎗聲，也看不見城市附近有什麼作戰的樣子。

中午過了不久，報告來了。祇完成了計劃的一部分：他們焚燬了飛機場的設施，在過路上安放了地雷，防止日本人出來討救兵；他們襲擊了電力廠，破壞了公共汽車站。可是在自來水廠遇到了比以前更堅強的抵抗，再加上這時天也亮了，他們不得不暫時告一段落。到了白天，他們就會聽命於日本人從城裏發出來的機關鎗和大砲的砲火，一點遮掩都沒法憑藉。

但這還沒有完呢！軍隊聚在城外一二哩的小村莊上，等待日軍出城。如果日本鬼子不出來打，他們就下令晚上繼續攻城。快近傍晚的時候，我們去參觀村中的作戰隧道。這差不多有一哩長，大小可容納村莊附近所有的婦女和孩子。在日本人前來突擊時，人們就逃到四周的山上去，躲起來放冷鎗。剛好這隧道在一星期前應用過。這次進攻汾陽，一部分可以說是對過去二星期中日人發動的小規模掃蕩運動的報復。這掃蕩運動，在我們來到前的三四天，剛剛結束。

我們爬過迂迴的山路，到山邊的農場去。隧道的入口在一個遺棄的洞窟裏，那樣的山洞，在這裏何止有千萬個。隧道是用一組直立和倒立的U字組成的，中間用許多藏身的穴洞聯結起來，在這樣的情形下，防禦工作很容易做得好，大有一夫當關，千軍莫入之概。嚮導人仔細給我們說明它的結構，它的歷史，和一切它的防禦的特色。我看見他胸口掛的徽章。「這個嗎？這是汾陽日軍司令發的良民證。」他笑着說。

這樣看來，八路軍對每一次日軍發動的攻勢都有恃無恐，的確是不足為奇的。這時，我才懂得八路軍爲什麼能在像第八分區那樣被包圍的區域裏生存以及作戰的道理了。

我們睡了幾個鐘頭；後來，在將近子夜的時候，又出發到汾陽附近另一個村莊去，我們想像在那邊可以把夜戰情形看得更真切一些。民兵大舉出動了。這些八路軍的眼睛和耳朵，他們散佈在山路兩旁的山頂上，我們不斷地碰到有人來盤問。過路人必須回答了夜間的口令，才准許通過——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連長」。到達目的地時，已經過了午夜好久了。這兒曾經是一個日軍據點，警備隊剛在幾星期之前被撵走。當地的民衆，和游擊隊以及正規軍取得密切的合作，封鎖警備隊的食糧，直到警備隊被迫撤退爲止。

我們坐在城牆上，擁裹在毛毯中，就像一羣待殺的老鷹一樣。戰爭的壯烈光景完全展示在我的眼前。我們可以很清晰地聽到鎗聲大作，看見城裏的一片火光。隨後，忽然一下子，大火竄了上來——那是自來火廠。火礮發出藍，青，橘紅各種顏色，因爲化學品燃燒的原故。

戰爭一直繼續到天亮前不久，停止時就開始時一樣地突然。八路軍住了手，按照命令撤退了。天一亮時，我們也立起身來，往回走三哩路，到山頂上一個村莊上去。我們在那邊一座古廟裏設立了司令部，廟裏有的是面貌兇狠的塑金的戰神。廟和村子房屋的牆上，都漆着粗大的白字——全是些口號，諸如「打倒日本法西斯！」「慶祝聯合國勝利！」等等。村民對我們的歡迎，也是值得一提的。兵士用不着強徵民屋——人民自動地請他們到家裏去住。

我們現在只等着日本鬼子幹些什麼了。他們肯出城來打仗嗎？也許，疑心有埋伏，他們到太原請

救兵去了，而救兵已經出發在路上。陸委員決定我們不能再在那兒多耽擱。我們已經打了一次驚人的精神上的勝仗——使日本人失了不下面子，受到相當的損失。我們要等候戰士們從城裏回來，然後就離開。

中午過後，我們步行到一處海岬上去，可以望見一長串的日軍據點，伸展到那邊山腳下，相距不過幾哩路光景。我們坐在那裏，和敵人遙遙相對地望着。不久，我們一隊人從後面來了，悄悄地在我們四周散開。他們在右首麥田裏架上機關鎗，在左首高粱地裏架起了臼砲。

立刻，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喊了起來。一隊村民正在下面山路上走近來。他叫他們停住，派一個代表說明他們的來意。一位年老的老百姓笑着走過來。他帶着一籃雞蛋——送給八路軍英雄的禮物。聽到過去幾天打仗的消息，快活得不得了，每個人都帶了禮物來。他們雖然住在直接受日人統制的村子，他們却要證明他們是多麼歡迎戰鬥的八路軍。

其餘的人也都走上來了。他們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帶着一籃籃的水菓，大捆的蔬菜，南瓜，胡桃和雞。有一個人拖着一隻蹣跚不前的山羊。幾個老太婆運動束縛過的小腳，一步一挨地走着。大家都笑着，開着玩笑，高興得像出外來野餐一樣。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場面，十足說明了生活在日本侵略下的人們對八路軍抱怎樣的看法。

有誰喊了一聲：『瞧，那邊來了！』是戰士們從城裏回來。一長隊的人在曲折的山徑上蜿蜒而行。多偉大的場面啊！他們身上掛滿了各種各樣的戰利品——來福鎗，機關鎗，劍，帽盔，電話，戰旗，毛毯，大衣，一包包的鹽，一袋袋的米，一匣匣的香烟和火柴，甚至還有幾輛腳踏車。有幾個兵

還帶了幾瓶蘇打水和日本酒。一個人戴了一付死了的日本兵的眼鏡。他們似乎完成了遠比命令多得多的工作。在離去之前，他們決定要攻入東門外一哩半的一處據點。這據點保護得十分嚴密，內防線四周圍着深而闊的壕溝。可是八路軍知道那裏的弱點；幾天以前，一位八路軍長官假扮了苦力，混了進去，從內部來了個包抄。

他們把日本人只殺贖了兩個。這兩個日本兵受了傷，被他們帶回來了，還有大約五十名僞軍俘虜。在後者中間，有三十八個人是附近僞政府的人員，那僞政府是在進攻城市時逃往日軍據點去避難的。八路軍方面的損失是死三人，傷九人。傷兵立刻被送回來，由當地的民兵抬着擔架。

他們雖然疲乏得要死，精神却依然很好。當他們排隊蹲下來時，女人們開始到他們中間來分發禮物。隨後，他們加入了其餘的老百姓，在一旁坐下，眼睛裏閃爍着驕傲和激動的光。

一刻之後，陸委員向他們訓話。他對他們的成就非常感覺到驕傲。他們給了敵人嚴重的打擊，這他是不会很快就忘記的。他們又給民衆帶來了很多的希望和勇氣。可是要做的事還有許多呢，應該仔細分析一下全部的作戰經驗，使這些缺點和錯誤在下一一次作戰中可以盡量避免。隨後，他發起要靜默幾分鐘，紀念那些倒下去的勇士。大家立起來，低頭站着；很多人眼裏噙着眼淚。

他們是一羣最最慷慨多情的人——他們送給我們無數戰爭的紀念品：戰旗啦，勳章啦，軍盔啦，還有一本照相黏貼簿。他們自己大嚼了一頓，吃那些鹵獲來的米和麵粉。他們有幾百紙箱的整腳日本香煙，他們拿來分給那些和我們一起從司令部來，因為沒有參加作戰而覺得非常失望的兩連人。

這樣我們就向他們告別了，因為我們還要一直前進，到北半部要煩戰區去，那邊戰事正要開始。

## 第二十九章 進攻婁煩

這兩個人，在這裏已經幹了三個晚上了。海田和大谷，都是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會員。每天晚上，他們爬到離婁煩據點三十碼之處，向裏面他們的同胞大聲呼喊，叫他們到八路軍這邊來。

「他們聽嗎？」我問道。

「他們聽的，」大谷回答說。「可是，就止於這一點。他們並不向我們開鎗，這就是鼓勵的表示。他們甚至還呼嘯着，叫狗靜默不要作聲。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聽到他們的聲音。」

「第三天晚上，一個名叫佐藤的小兵回答我們了，」海田插進來說。「他說：『進來吧，進來吧。我們不和你。』我們謝謝他，可是回答說，還是留在外面談話好些。我們告訴他們，我們以前也當過日本兵。長官告訴我們，如果被八路軍抓到了，我們要遭受種種毒刑拷打。事實相反，我們在這裏受很好的待遇，後來就加入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接着，我們告訴他們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內容，還對最近歐洲及太平洋上的軍事發展作了總結的分析。」

假定小兵佐藤和他在婁煩的同伴們是受了這二人的喊聲的影響的話，那末，他們的決心是下得太遲了，當我們二天後的晚上攻入婁煩時，他們是被殺死了。海田和大谷知道我們要攻打那地方，他們覺得非常難受；但他們已經盡了心力，去救護另外一些誤入歧途的同胞。

當我們在黑暗中，出發到橫過山脊大約五哩之遙汾水沿岸的婁煩戰區時，天正下着霏霏的細雨。軍官要我們在據點後方的幾哩的山頂上觀望，但我們堅持要和軍隊一同走。他很勉強地答應把我們帶到一座古廟裏去，離據點的外圍防線大約有三百碼。

當我們離去時，來了兩個報告。一個說，有三百個日本兵從東方到我們這邊來了；他們離開這兒只有大約十哩光景。第二個報告說，有一千個日本兵來到了東北方約二十五哩之處。後一股兵力，大家相信是在第八分區集中兵力進行掃蕩運動的先鋒部隊。這時正是秋收時期，日本鬼子是爲搶穀而來的。

軍官把這些報告考慮了一下，然後決定仍照原來的計劃行事。『日本鬼子是不敢在夜間出動的』，他說。

一開始行軍，我們就懂得他們意思了。那地方的山路，纏繞在千尺高山的狹長的岩礁上面，一失足，準保沒有性命。而且，這假使還不夠挫折夜行的勇氣的話，那末，每條山路上還都安放有地雷。民兵在黃昏時候很早就去把路上的地雷撥開，因爲我們要打那兒走過，這時還臆着許多埋地雷的洞，這是一些不吉祥的記號，使我們可以想像這條路保護得有多麼周密。在有些地方，許多地雷洞擠在一條狹路上；在另一些地方，它們分散開有十碼或十五碼之遙。但普通總把它們安放在唯一的道路上，晚上要走過這些置有地雷的山道，那簡直等於是自取滅亡。

在一片漆黑中，我們排成一列側面縱隊向前行進，步子踏下去非常小心，把話留給後面的人：『地雷洞』——『踏下去』——『向左轉』。我們祇是低聲說着話，這樣就更增加了不安的氣氛，雖

然實際上是無須乎這樣謹慎小心的，除非真的接近了敵人。

當我們接近據點的時候，微雨中隱約地看見鬼影一樣的東西。這些是我們的軍隊，他們在走完最後一哩路去參加作戰之前，在這裏略事休息。和他們在一起的，有游擊隊，當地的民兵，一大隊帶着一箱箱一包包火藥的老百姓。另外一些人帶着鶴嘴鍬和鏟子，預備挖掘隧道，在壕溝上架上梯子。抬担架的那些人蹲在路旁，沉靜地抽着旱煙。

將軍看見他們在那裏，顯然非常不安；他們應該在二小時前就在那裏挖掘隧道了。但是顯然他們也聽見了日本人潰散的消息，現在要輪到這位將軍來決定，他們要不要繼續進行預定的晚間的工作。二小時的延遲，現在成了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預計是至少得有八小時才能把隧道掘成。他們原定天一黑就開始動手——大約在晚上八點鐘——希望能夠在早晨四點鐘時完成全部的工作，準備好進攻，那時離天亮還有一個半鐘頭；這已經是一再延遲，非常岌岌可危的了。但是新的二小時的延遲，使事情更爲棘手，那要拖延到天亮，等到號砲一響，總攻擊令下，就沒有黑暗的天幕可供軍隊作爲掩護了。王將軍立刻召集了一次臨時會議，和他的部屬以及出發去挖掘隧道的老百姓們聚集商量。他們決定再多用一些人力，再多靠一分好運氣，他們可能把挖掘隧道的工作減縮爲六小時——那末正好趕在天亮之前，事情還容易辦；於是命令發出去了，叫他們趕快動手。

我們走到古廟的觀察台那邊去，那裏很容易受到據點上打來的來福鎗火。一走進大殿，我們被一種驚人的氛圍捉住了，那是和這種奇妙的事業配合得非常調和的。這些是『天神天將』——古代的戰士，臉上刻着可怕的表情，他們在塑台上顯得是如此龐大而森嚴。這種引人恐怖的神氣，因爲背後有

一盞微火，給增添上濃重的，漆黑的，搖曳的影子，而益發加重起來。和這些對照着，四面牆上排列着——肩並着肩——許多等身一樣的聖賢的人像。他們帶着嚴肅而仁慈的表情，一個個都像哲學家或裁判官，穿着飄然長垂的袍子（摺縐得很好，雖然是用爛泥做的），使他們看來有一種無比的莊嚴。在這些古人當中，一個人會覺得默然無話可說，敬畏之念油然而起。

我們剛剛坐定下來，仗就打起來了——逼近得令人覺得不穩，我們已經發覺有好幾顆流彈打在古廟的厚牆上。日本人一定在剛開始挖掘隧道時就發現了那些人。八路軍這邊開鎗回擊——目的在使日本人停留在據點上——這樣一來，日本人就使出了他們所有的招數。他們開放來福鎗，開放機關鎗，開放白砲，還有一種大砲開出的砲彈就跟『七十五型』砲一樣。有些砲開得這樣近，連我們的古廟都震動了。自然他們是盲目地開砲，因為在微雨茫茫的黑暗中，他們什麼都不能夠看見。而當他們的砲火沉寂下去時，知道非常珍惜寶貴的軍火的八路軍，又開起火來了，使他們又不得不應戰。

這樣打了一整夜的仗。我們希望他們沒有能打電報去討救兵——有一隊兵被派遣出去，破壞他們的電線。還有一組包括十一個民兵，出動去施行突擊。他們被發覺了，挨了一陣手榴彈。十一個人裏面有十個人受了傷，雖然每一個人都平安地回來了。

在戰火停歇期間，我們可以清楚地聽到海田和大谷向對方的日本警備隊高呼勸降。他們走得非常近，在日本人和八路軍的火線當中。他們一定是工作得非常認真的。

天亮後不久，王將軍下令叫我們撤退到離後方大約二哩光景的一個山村上。似乎情勢不大好。天亮後，來了報告，說是挖掘隧道的人突然陷於意料不到的阻障中，使他們工作很難再繼續進行；再加

1. 2. 7. 20

11. 12. 13. 14. 17. 18

上天已經大亮，他們不得不忍痛停止工作。

既然有大股日軍向我們這邊過來，也許還是放棄整個預定的計劃而忍痛撤退的好。將軍和他的僚屬開了一次會議。正在開會的當中，戰場電話機的鈴聲響了——報告日軍大隊已經到了東方和東方：他們並沒有到我們這方面來；顯然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兵力，也不知道進攻斐煩的這件事。

『這樣，問題就解決了，』將軍宣佈說。『我們今天趕快做好隧道，按照預定計劃，給他們來個全軍覆滅。』

結果，我們的確把他們打了個落花流水。

## 附 錄

###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綱領草案

(一九四四年一月，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華北分會常務委員會在延安開會議決)

#### 結束戰爭

發動「滿洲事變」中日戰爭，及『大東亞戰爭』的結果，日本的軍閥和大軍火商發了大財，而日本人和亞洲人民則受到莫大的犧牲。戰爭拖延愈久，我們國家所遭遇的困難也愈大，愈嚴重。所以我們要求：

(甲)立刻結束戰爭。

(乙)日本軍隊及艦隊立刻自佔領地帶及領海撤退。

(丙)與交戰國簽訂公平的停戰協定。

以上的步驟目的在幫助我國人民獲得和平生活。

#### 持久和平

正像大家所知道，過去五十年中亞洲一切的戰爭都是我們的軍閥開頭打起來的，所以我們要求：

(甲) 嚴懲『滿洲事變』，中日戰爭，及『大東亞戰爭』的禍首。

(乙) 軍閥與聞日本政治，應予阻止。

(丙) 應以志願軍制代替徵兵制，目前的軍備應減少至祇夠保護日本本國領土為止的數量。

(丁) 對外關係上，應採取絕對的和平政策。

(戊) 戰後日本應參加新的和平組織(一種新的國際聯盟)。

以上的要求在避免另一次戰爭，並在真正互惠的基礎上，促進與外國密切的友好關係。

### 繁榮經濟政策

作為殘酷而長期的戰爭的結果，我國的經濟情況已陷於深刻的不景氣中。所以我們要求：

(甲) 軍事用費應減少至最低限度，大部分國家預算用於復興工作及人民的經濟發展與繁榮。

(乙) 積極發展機械工具工業，藉為重工業的基礎。

(丙) 施行有效的農業生產制度，並推行農業之機械化。

(丁) 和外交關係應和着，應積極發展對外貿易。

以上的要求在保證我國的獨立與繁榮。

### 摧毀軍事獨裁

因爲軍閥是日本政界最專制，名聲最臭的一種力量，我們要求：

- (甲) 軍閥的一切特權應予廢除。
  - (乙) 軍閥不得干涉政治，經濟，教育及文化事業。
  - (丙) 軍閥支配下的團體應一律予以解散。
- 以上目的在澄清日本政治。

### 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很久以來，日本人民的自由與權利一直是蹂躪在軍閥的鐵蹄底下的，我們必須要求：

- (甲) 諸如財產徵發令，總動員令，維持治安令，一切這樣的無理的法令，都應取消。
  - (乙) 舉凡因反戰，反軍閥，反對一切種種的社會不平等而遭逮捕判刑的政治犯，都應立即釋放。
  - (丙) 住宿與參加政黨的限止應予取消。
  - (丁) 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及組織團體之絕對自由。
  - (戊) 二十歲以上的男女，都有選舉權。
  - (己) 成立民主政府。
  - (庚) 爲要成立民主政府，必先召集國民大會，改革憲法。
- 以上目的在建立一個自由而民主的新日本。

## 改良人民生活條件

歷年以來爲軍閥所剝削的我國人民，窮困已極，淪於第三流的非人生活。絕望的戰爭更使他們投入飢餓與貧困的鐵掌，轉輾死於溝壑。所以我們要求：

(甲) 物價及工人納稅的數目應予減低，無理而強迫的經濟與勞働負擔應予廢除。

(乙) 職工的工資限止應予撤除，而代以合理公平的工資制度；工作時間減少，工人住宅區設備改善；建立工會制度。

(丙) 強迫收買農人穀物，及其他不合理的農業法令，都應廢止，農民協會應任其存在。

(丁) 對學生強迫施行的勞働訓練及軍事訓練應予廢止，進步的學生會應予合法化，並保證研究學問之自由。

(戊) 對中等商人階級，應給予有效的救濟。

(己) 利用一切方法，改進並提高日本人民的生活條件與文化。

### 保障兵士海員及其家屬的生活

目前不拘在役及退伍軍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窮苦的，所以我們要求：

(甲) 保障在役軍人家屬的生活水準。

(乙) 在戰爭中受傷致成殘廢者，其生活應予保障。

(丙)在役軍人及海員的生活水準應予改進，並使有讀書，集會及選舉的權利。  
以上目的在改進戰爭中受苦最深的人的生活條件。

# 北行漫記

原著者 福爾曼

譯者 陶 岱

出版者 燕趙社

北平察花胡同三十二號

經售者 全國各書店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出版

#6  
312616  
↓